

新闻传播学新锐丛书

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 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研究

胡菡菡 著

社会冲突中的舆论和司法关系
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成因的认知
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主体的认知和评价
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社会功能的评价
法官应对敏感案件舆论的行为意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新闻传播学新锐丛书

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
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研究

上架建议：新闻传播

ISBN 978-7-313-1



9 787313 107251 >

定价：32.00元

新闻传播学新锐丛书

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 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研究

胡菡菡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在干群关系、贫富差距等导致社会冲突问题日渐严峻的语境下,作者着力研究了中国各级人民法院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基于对 300 多位法官的调查,作者认为可以用“信任之困”来概括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态度的特征:法官既缺少对舆论主体传播素养、法律知识素养的信任,也缺少对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信任。尽管当前司法公开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但“信任之困”的客观存在,仍然会使未来的舆论和司法关系面临一个个具体案例带来的挑战。在社会冲突语境下,司法独立、舆论理性、社会公平的达成,其关键不在于消除舆论对司法的关注,而在于重建公众和公权力之间的相互信任。

本书可作为新闻传播学、法学、社会学等方面专业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研究 / 胡嵩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新闻传播学新锐丛书)

ISBN 978-7-313-10725-1

I. ①社… II. ①胡… III. ①社会冲突论—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9074 号

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研究

著 者: 胡嵩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韩建民

印 制: 上海颀犀印刷厂

开 本: 787 mm×960 mm 1/16

字 数: 16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0725-1/C

定 价: 32.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0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57602918

新闻传播学新锐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丁柏铨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和根	丁柏铨	王 雄
邓利平	祁 林	陈堂发
林 伟	郑 欣	胡蕊蕊
胡翼青		

PREFACE

总序

本世纪初,我和我的同仁曾依托新华出版社,推出过一套8本的“新闻传播学前沿丛书”。作者们秉持思考本学科领域中的前沿问题的宗旨,力图在著作中体现前沿性和前瞻性,付出了艰辛和努力,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尚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

近十年过去了。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崭新的内容,新闻传播业界进行了诸多新的实践,研究者面临众多亟待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理应与与时俱进,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在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进程中,人民的知情权得到尊重,重要的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的公开得到应有重视,但在一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政府、大众传媒、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有待长期关注并投入精力进行研究的重大课题。改革进入到了深化期,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在改革的推动下获得了更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是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并交互作用,群体性事件频发。在此情势下,大众传媒如何发挥自己应有的积极作用,成为新闻业界和学界人士共同面对的问题。由于新兴媒体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虚拟环境中的网络舆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现实作用。大众传媒之间,在竞争加剧的同时,合作也在不断地扩大,媒介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新闻传播业界,新事物不断涌现,不断地为研究者们提供着丰富鲜活的研究对象,提供着富于意味的典型案例。所有这一切,都值得学界人士予以密切关注,并经过较为深入的思考作出学理性的回答。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锐”丛书是应运而生的。但对于本人而言,继“新闻传播学前沿丛书”之后,再推出一套由本院同仁撰写的新的丛书,以集中展示其研究成果,可谓有志于此久矣。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使我的夙愿

得以实现。“新锐”丛书和“前沿”丛书,当可以成为姐妹丛书,一以贯之的精气神是: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对学术创新的追求、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此套丛书,旨在思考和回答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诸多新的现实问题。取名为“新锐”,并非已然和实然,而意在彰显一种取向和确立一个目标。这里所说的“新锐”,基本的义项是“勇敢提出新的看法”,以此命名,是希望体现出我和同仁们的执著追求。这是丛书名的第一层意思。除本人以外,作者均为中青年学者。近年来,他们在学术领域中相当活跃,成果颇丰。“新锐”是对他们的希冀;本人虽已年过花甲,但乐于以此自勉。这是丛书名的第二层意思。在每个人的著作中,都要有自己的见地,从中表现出一定的学术锐气。或许谈不上完美,但一定要有“属于我”的新见,始终以“新锐”为标杆。这是丛书名的第三层意思。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确立较高目标并为目标而作出不懈努力,但愿结果不是“仅得乎下”。

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 丁柏铨

PREFACE

序

凝聚与深化

——《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研究》

胡茵茵的博士学位论文《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研究》，经较大修改和多次打磨，即将出版，可喜可贺。

茵茵从安徽师范大学本科毕业以后进入南京大学，先是由我指导攻读新闻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后，又由我指导攻读传播社会学方向的博士学位。其间，她曾先后到日本和美国访学。两度访学的经历，使她的学术视野有所扩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的学术熏陶，使她的学养进一步提升，为她的学位论文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些时候，我发现茵茵对用法学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领域的现实问题兴趣甚浓、钻研渐深，陆续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关学科“结合部”的课题，运用多种学科的视角进行观照、研究，往往比采用单一学科的视角观照、研究，更能获得新意，也更能将问题说透。因此，当茵茵向我报告她的选题意向并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是持赞同意见的。

如果要为该著的书名列关键词，可列出好几个：社会冲突、敏感案件、舆论、法官、态度等。但她全力研究的问题，似可凝聚到一点上，即：“信任之困”。在紧紧抓住这一关键点之后，作者力图实现深化。

读茵茵的著作，有一种一气呵成之感。指导她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我在如下三点感触颇深：

其一，关于论文选题。据我所知，博士生们在完成学位论文的过程中，选题

是让他们纠结的一大难题，往往出现数次被自己否定，在获得自我肯定后又连遭导师否决的情况，以致深陷于选不到合适之题的困境且久久难以自拔。茵茵在选题方面也郁闷过，但好在她现有的选题切入角度好，很能体现新意，且在最后确定选题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认真做了相应“功课”。故开题报告能较顺利地获得通过。

说茵茵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较好，我给出的理由有：

一是体现了学科的交叉。以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为学科背景的博士生，却以法官为研究对象，体现了上述学科与法学、心理学交叉和交融研究的特点。社会冲突是社会学领域中的重要研究命题。但茵茵的选题既与此有关，又避开了一般社会学研究的内容。敏感事件引发的舆论，既与传播学有关，又与新闻学有关。舆论已然成为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研究的持续的热点话题。然茵茵又未与此前的研究重复，而是另辟了蹊径。关注法官对相关舆论的态度及其相应行为，以法官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在敏感案件舆论面前的心理反应和实际作为，无疑涉及法学乃至心理学方面的问题。论文选题涉及了复杂的现象和问题。一般而言，研究复杂的问题有赖于多学科的交叉。

二是此前研究成果尚少。从新闻学、传播学抑或社会学的角度对法官群体进行研究，这不是研究者趋之若鹜的一个选题，各学科的学者们还很少涉及这一问题。由此，只要在深思熟虑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且能言之成理，就可望出新。相反，此前涉足者及其研究成果越多，超越的难度就越大。如果不存在超越前人的可能，而只是简单重复别人的观点，论文就会了无价值、不被同行认可。

三是选题容量大小适中。茵茵所选之题，合宜、适中。一般而言，题目太大，难以驾驭、难以深入，结果很可能是大而无当。题目太小，则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固然可在某个方面做得颇有深度，但很可能达不到博士学位论文所必须具备的分量、体量。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反对将博士学位论文写成很大气的皇皇巨著，但这毕竟超出了对于博士学位论文的通常要求；我也并不反对选题较小但写得极有深度的论文，倘若能做成这样的论文，当属受褒奖之列。

其二，关于研究难度。茵茵所选题目，做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这是可以预见的。正因为如此，我并不是没有一点担忧。按照她的设想，将对各级法院的法官们进行问卷调查（发放三四百份问卷），其难度可想而知。联想到自己主持一项国家课题，在一个副省级城市对局级及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做媒介素养方面的问卷调查，得到了市委宣传部的支持并握有“尚方宝剑”，然而问卷的回收率仍然偏低，一些调查对象并不配合。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国家课题的问卷调查情况尚

且如此,茵茵个人对法官进行问卷调查,能成吗?我的担心不无道理。法官们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和习惯,一般是不大愿意接受这类问卷调查的,何况其中涉及一些颇为敏感的话题,更何况调查问卷的对象还涉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们。

但茵茵相当执著,没有视之为畏途。正如她自己所言:这项研究“正是期望通过对被监督者的调查研究,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舆论与司法关系可能的发展方向,期待能较为准确地描述目前舆论和司法在互动时所处的现实语境,尽可能地靠近中国舆论与司法关系的真相”。后来的结果表明,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她最后在问卷调查方面获得了成功。对于个中艰辛,她并未多言;待我问及时,她也只是莞尔一笑。但我自身的经历告诉我,其间的辛劳当是不难想象的。

由此我想到,做学术研究,就难易程度而言,可有不同路径的选择。一种是走相对容易走的路,所需材料易得,学理阐述方便,然而学术价值不高;另一种是走相对不易走的路,所需材料难得,学理阐述偏难,然而学术价值很高。两相比较,我更倾向于自己指导的博士生们走后一条路,在学术研究的征途中遇到再大的艰难也在所不辞。事实上,学术研究无捷径可走。走容易走的路,最终是成果乏善可陈,难言学术价值。在世間,收获与投入总是呈正相关关系。农民耕耘是如此,学术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以说,做得扎实的论文,都是下足工夫方才写成的。拿在手上,给人以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抱有走捷径心态的论文作者,其作不可能厚重。

其三,关于研究本身。选题再好,如果研究乏力,那也还是枉然。茵茵的学位论文,就研究本身而言,有着若干亮点:一是聚焦于敏感案件的舆论及法官对此的反应。事实告诉我们:越是敏感案件,受公众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关注的程度就越高,法官对舆论的态度也就越是谨慎和越有研究价值。对此展开研究,既避免了耗费极大精力最终得到一个不得要领和泛泛而论的结果,又可以显现出某种智慧和谋略。

二是话题和论述比较集中。茵茵在论著中,层层开掘,逐层递进,论述充分且透彻。在这方面,茵茵预设了目标,我对她也有所期待。从论文的终极版来看,她是达到了自己的预设目标的。文中没有枝枝蔓蔓的东西,沿着清晰的逻辑线索,不断向前推进。具体而论,先对核心概念加以界定,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对研究方法作出说明,从而做好了必要的铺垫工作。之后切入正题:先探讨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成因的认知,涉及法官心理认知的层面;再论析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社会功能的评价,试图用法官的眼光进行考量并对其心理进行更深入的探究;进而研讨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行为意向,这就进入到了法官与舆论相关

联的行为层次；结语部分，研究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及应对，既呼应了论题，深化了前面的论述，又顺理成章地给出了对策。

三是有很多新意并得到了有说服力的数据的支撑。著作中提出的基本观点“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其本身就是颇有新意的，而应对之策则既有新见，也不乏现实启迪意义。诸多章节提出的见解，我们还很少在其他著述中看到类似的表述。可贵的是：这些见解，均是建立在数据和对数据进行解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当然，该著并非没有瑕疵。如果能实行两种结合，成果质量当能进一步提高。一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我总觉得，此类研究对定量研究的依赖有点过。所好的是：茵茵对数据的利用和解读工作做得不错，没有像有的研究那样列完数据就完事。数据在她手中发挥了应有作用，特别是对有关数据所做的交叉分析更是必要。但数据和单纯对数据的分析解读，也有力所不逮之处。对一些社会现象深层次原因的探究，需要将解读统计数据与分析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做。因此，适当增加定性研究并使之与定量研究良性互补，这是进一步提升论文质量的有效途径。二为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的结合。就现有的论题进行研究，似有必要进行纵向的考察，使之成为对横向考察的重要补充。事实上，在不同的时段，比如近几年与早些年，相应的情况可能就有所不同。有必要探索其间的发展轨迹，就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纵向考察，并加入自己的分析、思考。这样做，有利于增强成果的纵深感和厚重感。

瑕不掩瑜。我认为，这是体现出作者思考深度的相当不错的一项研究成果。是为序。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丁柏铨

2013年9月18日

CONTENTS

目 录

■ 绪论	001
一、社会冲突语境中的法官研究	001
二、社会冲突、敏感案件、舆论和法官的舆论态度	007
三、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研究：路径与方法	012
■ 第一章 社会冲突中的舆论和司法关系研究	017
第一节 有关舆论和司法关系的“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	017
一、研究的初始阶段	017
二、“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的形成阶段	020
三、“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的成熟更新阶段	022
第二节 将社会冲突理论引入“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的 可能	024
一、西方的社会冲突理论	024
二、中国对现实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	028
三、一种共有的价值取向	030
四、作为新解释框架的社会冲突理论	032
本章小结	033
■ 第二章 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成因的认知	035
第一节 法官的媒体使用行为	035
一、法官有使用媒体关注舆论的行为习惯	035

二、法官有“爱关注、不爱发言”的网络使用习惯	037
三、如何理解法官对舆论“多关注、少参与”的行为习惯	037
第二节 法官对网民讨论敏感案件原因的认知	039
一、法官眼中的社会冲突、敏感案件和网民	039
二、法官对网民讨论敏感案件心理动因的认知	042
第三节 法官对媒体报道敏感案件原因的认知	046
一、法官眼中的社会冲突、敏感案件和媒体	047
二、法官对媒体报道敏感案件具体动机的认知	049
本章小结	053
■ 第三章 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主体的认知和评价	055
第一节 法官对舆论主体立场的认知	055
一、法官对网民立场的认知	055
二、法官对媒体立场的认知	057
第二节 法官对舆论主体综合素养的评价	058
一、法官对网民综合素养的评价	058
二、法官对媒体综合素养的评价	061
第三节 法官对舆论主体影响力的评价	066
一、法官对既有案件审判中网民影响力的评价	066
二、法官对既有案件审判中媒体影响力的评价	070
本章小结	073
■ 第四章 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社会功能的评价	074
第一节 法官对舆论监督司法功能的评价	074
一、法官对网民舆论监督司法功能的评价	074
二、法官对媒体舆论监督司法功能的评价	078
第二节 法官对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评价	080
一、法官对网民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评价	080
二、法官对媒体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评价	085
第三节 法官对舆论“联系社会”功能的评价	088
一、法官对网民舆论“联系社会”功能的评价	088
二、法官对媒体舆论“联系社会”功能的评价	089

本章小结	092
■ 第五章 法官应对敏感案件舆论的行为意向	093
第一节 法官重视敏感案件审判的社会效果	093
一、法官重视敏感案件审判的社会效果	093
二、法官重视司法审判社会效果的原因	095
第二节 法官应对敏感案件舆论的行为意向	098
一、法官应对网民舆论的行为意向	099
二、法官应对媒体舆论的行为意向	103
第三节 法官对舆论管理的建议	106
一、法官对舆论管理的建议	106
二、法官提出舆论管理建议的原因探析	107
本章小结	109
■ 结语 法官在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及应对	110
一、法官在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	110
二、走出“信任之困”的舆论应对路径	114
■ 参考文献	123
■ 人名和关键词索引	128
■ 附录 法官对网络民意的态度调查问卷	131
■ 后记	142

绪 论

当一个司法案件的审理备受舆论关注,而这一案件备受舆论关注的深层原因是它涉及干群关系、贫富差距等社会冲突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法官会如何评价舆论对司法的影响,会如何应对舆论,会提出怎样的舆论管理建议,为什么?这就是本书试图重点回答的问题。

通过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希望强调法官在舆论和司法互动中的重要作用,考察法官对敏感案件的舆论持何种态度,并最终向法官提供要如何应对舆论才有助于促进舆论和司法良性互动的建议。

基于对 300 多位法官的问卷调查,我们认为可以用“信任之困”来概括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特征:法官既缺少对舆论主体传播素养、法律知识素养的信任,也缺少对舆论能够缓解社会冲突的信任。“信任之困”使法官只能被动响应舆论要求,难以主动进行司法公开。

一、社会冲突语境中的法官研究

这是一个从司法角度,探索中国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研究。与以往的舆论和司法关系研究相比,它在以下几方面开展了新的尝试:第一,以法官为研究对象;第二,以社会冲突为研究语境;第三,以向法官提供有助于舆论和司法良性互动的建议为研究目的。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几方面开展新的尝试?以下即为研究缘起。

(一) 为何以法官为研究对象

法官是中国舆论和司法关系研究中少见的研究对象。但事实上,舆论和司法关系是由多个主体共同塑造的,其中包括作为舆论主体的媒体和公众,同样也包括掌握司法公权力的法官。法官在舆论和司法关系中的作用多年来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这导致人们无法全面了解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生成和发展规律,只能片面地考虑如何通过改善舆论来改善舆论和司法间的关系。

因此,在理论层面上,我们希望以法官为研究对象,为人们全面了解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生成和发展规律提供依据;在现实层面上,我们希望以法官为研究对象,从新的角度来寻找塑造舆论和司法间良性互动的路径,为司法应当如何应对

舆论提供相应建议。

1. 法官是塑造舆论和司法关系的重要角色

从微观上分析舆论和司法关系,会发现它经由社会互动形成,互动主体既包括舆论一方的公众、媒体从业人员,也包括司法一方的法官,甚至还包括行政一方的主管官员。法官不是那个仅仅只会被动接受舆论影响或行政命令的木头人。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法官是能动的法律适用者,也是案件定罪量刑的最终决定者。司法审判是否应该考虑舆论要求?在多大程度上考虑舆论要求?这些都由每一个具体案件的主审法官决定。因此,法官和公众、媒体从业人员以及行政官员一样,是塑造舆论和司法关系的重要角色。我们在考察舆论和司法关系时,不应忽略法官这一重要的研究对象。

(1) 法官应对舆论的能动性

在西方,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在中国,司法审判中陪审团的作用微乎其微,法官是定罪量刑的决定者,他们在适用法律方面具有极大的能动性。仅仅以引起舆论和司法高度互动的交通肇事案为例,从1997年的“张金柱案”^①到2003年的“宝马撞人案”^②,从2009年的“杭州飙车案”^③到2010年的“我爸是李刚案”^④,舆论的要求都是严惩肇事者,但司法审判的结果却各不相同。与早期的张金柱案相比,近年来的交通肇事案判决结果已基本不再面对“量刑过重”这样的质疑。这样的—个发展历程,固然与舆论不再动辄要求“死刑”相关,也与法官在具体案件审判中能动地应对舆论要求相关。因此,我们不能忽略法官能动性对舆论和

① 张金柱案 1997年8月21日晚,河南郑州市公安局七分局局长张金柱酒后驾车,在撞倒市民苏东海(苏磊之子)后逃逸,其驾驶的汽车将受害人苏东海拖行了1500米,被害人苏磊死亡,苏东海重伤。经过《人民报》《南方周末》,以及央视台焦点访谈等媒体的报道,张金柱案引发了全国舆论的关注。张金柱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即执行。张金柱是否被“舆论审判”,并“罪不至死”,是多年来各界的争论焦点。

② 宝马撞人案 2003年10月16日,哈尔滨市市民苏秀文驾驶的宝马车与农式农具驾驶的拖拉机发生刮蹭,随后宝马车冲上道路,连续撞人,导致1人死亡,10人受伤。此案由于涉及贫富矛盾而备受舆论关注。2003年12月21日,苏秀文因驾驶操作失误,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执行。

③ 杭州飙车案 2009年1月10日,肇事人胡斌超速驾驶一辆改装 豪跑车在杭文二路撞倒骑自行车上学的中学生,并导致该中当场死亡。公安机关在鉴定事故现场之后发布信息称肇事车当时胡斌的车速只有70码。这数字受到了网民的强烈质疑。杭州飙车案因此获得了“贩卖马”事件的网络,网民对胡斌及其家人的身份进行了“人肉搜索”,指出其家境富裕为典型的“富二代”。此案受到杭州市长的关注,指示对案件从快严肃处理。最后胡斌赔付受害人家属100万元,并被判处交通肇事罪,入狱服刑6年。

④ 我爸是李刚案 2010年10月16日晚,在河北大学新区超市前,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某分局局长李刚之子李启铭驾车将两名女生撞出数米远,被撞 陈姓女生于17日晚抢救无效死亡。李启铭在事后曾说出“我爸是李刚”这句话。随着舆论对这一案件的持续关注,“我爸是李刚”成为网友们嘲谑跟帖“一代”的流行语。2011年1月30日,李启铭因交通肇事,被判有期徒刑6年。

司法关系的影响。

(2) 法官应对舆论的前瞻性

我国大量的法规政策为法官如何应对舆论提供了行为依据。但是由于社会的变化发展和舆论形态的日新月异,很多法规政策已显得陈旧。法官站在舆论和司法互动的第一线,在很多突发的舆论事件中,他们往往需要根据自身经验以及对现实情况的即时判断,来分析舆论,应对舆论。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可能产生对当前法规政策的新的理解,也可能产生新的舆论管理建议。这些都可能在未来影响到舆论和司法关系的走向。

(3) 法官应对舆论的复杂性

不同的社会语境下,会有不同的舆论和司法关系。法官在应对舆论时,会考虑到除法律之外的社会因素。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行政因素对于法官应对舆论的具体做法有着明显的影响。事实上,除了行政因素之外,法官还要考虑社会语境中的其他因素,来综合判断应该如何应对舆论。我国司法审判在重“法律效果”的同时重“社会效果”,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语境中的非法律因素对司法审判的影响。从了解法官应对舆论的复杂性入手,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有多重因素在影响着法官对舆论的态度。

2. 舆论和司法关系研究中法官研究不足

中国有关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研究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法官的研究尚比较少见。这种情况,使我们较少从司法的角度来检讨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生成和发展规律。

(1) 舆论和司法关系研究中法官研究不足

多年来,学者们结合“言论自由”、“权力制衡”等理论工具来研究中国现实中的舆论和司法关系。相关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理想的舆论和司法关系?权力制衡理论、言论自由理论是学者们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工具。让舆论和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以舆论监督司法,以政策规约舆论,从而同时保障公众的言论自由和司法公正,从而最终使舆论和司法达成“权利-权力制衡”的良性互动,以上正是学者们对理想的舆论和司法关系的描述。

第二,当前舆论对司法有没有产生积极影响?正是因为有了对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理想描述,学者们开始探讨当前的舆论和司法关系是否符合理想中的“应然”状态。但这种探讨主要以舆论为研究对象,分析舆论是否监督了司法,探讨舆论对司法的影响究竟是促进了司法公正还是造成了司法不公。

相对而言,学者们更关心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忽视了司法是如何应对舆论,为什么要这样应对舆论,以及这样应对舆论是否有利于生成理想的舆论和司法关系的问题。

(2) 法官研究不足带来的影响

对法官研究的缺乏,使我们一来无法得知法官如何评价舆论带给司法的影响;二来无法得知法官对于舆论管理有什么样的建议;三来无法得知法官是否乐意推动实现学者们有关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理想。

可能人们会认为,无论法官是否愿意接受舆论监督,无论法官是否认同学者们有关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理想,舆论都会对司法产生影响,但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如果法官确实否认舆论监督的积极意义,而且不能认同学者们有关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理想,他们对于舆论管理的建议就可能是减少司法对舆论的公开、加强政策法规对舆论的管制,从长远看来,这样的建议就可能越来越紧张的舆论和司法关系。

因此,对法官研究的不足,将使我们无法全面研究与判断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生成规律及发展方向,只是片面地考虑如何通过改善舆论来改善舆论和司法关系。

(二) 为何以社会冲突为研究语境

以社会冲突为研究语境,是指需要考虑到社会冲突因素对舆论和司法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对法官的影响。以社会冲突为研究语境,可以帮助我们关注到中国舆论和司法互动的特殊性。

舆论和司法的互动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不同的社会语境成就不同的舆论和司法关系。在当代中国,日益凸显的社会冲突对舆论和司法关系的影响,从早年的“张金柱案”到近年的“邓玉娇案”^①、“我爸是李刚案”中都有表现。以“张金柱案”为例,肇事逃逸者众,为何独张金柱引发民愤,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事实上,张金柱之死与其犯罪行为相关,也与其身份是“公安局局长”相关。对于“为官者不仁”的社会愤怒,集聚成公众和媒体针对张金柱肇事逃逸的谴责,并影响到了司法判决。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今天,整体社会状况的改善毋庸置疑,但

^① 邓玉娇,湖北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龙凤梦幻城的女工。2009年5月10日,邓玉娇遭受邓贵入等一名乡镇干部提出的异性洗浴要求,面对无理纠缠、拉扯推搡、言辞侮辱等不法侵害,邓玉娇持水果刀杀一人伤一人。案发后,邓向公安机关自首。一个月零6天之后,巴东县人民法院判决宣称,邓玉娇实施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超过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被告人邓玉娇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案发后,邓玉娇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经法医鉴定,邓玉娇为心境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据此,依法判决对邓玉娇免于刑事处罚。

权力腐败、贫富差距等带来的社会冲突问题却越发突出。在未来,舆论和司法间的互动,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冲突的影响。

1. 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面对舆论特殊的关注点

社会冲突的客观存在,特别是干群冲突、贫富冲突的客观存在,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下,舆论对司法案件产生了一个特殊关注点,那就是司法案件是否存在干部对群众、富人对穷人以及其他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司法不公。回顾“张金柱案”、“邓玉娇案”、“我爸是李刚案”、“杭州飙车案”、“宝马撞人案”等舆论热点案件,无一不涉及社会冲突问题。在这些案件中,舆论一般对涉案的弱势群体一方持同情态度,对涉案的强势群体一方持质疑态度。

因此在和一般语境下相比,法官在社会冲突语境下对当事人的法律适用,将面对舆论更多的拷问。对法官的研究需要关注在这种情形下,法官是否会考虑到舆论特殊的关注点,并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考虑舆论的主张。

2 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面对舆论强烈的不信任

社会冲突语境下,舆论对司法的不信任表现突出,作为公权力的司法部门极易受到舆论的质疑。以“杭州飙车案”为例,撞人者、公众眼中的“富二代”胡斌已赴监狱服刑,但舆论仍然怀疑胡斌使用了替身服刑,同时怀疑司法机构纵容包庇了胡斌使用替身的行为。在类似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舆论对司法的不信任主要表现在怀疑司法部门可能受到强势一方的影响,催生对弱势一方的司法不公。

社会冲突语境下舆论对司法强烈的不信任,对法官的舆论沟通能力提出了挑战。对法官的研究,需要关注到法官是否具有和舆论沟通的意愿和能力,是否具有通过各种途径树立司法公信力的行为意向。

3. 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面对舆论强烈的干预司法意愿

在社会冲突语境下,舆论关注司法案件的目的性往往比较明确,即最大可能地消除司法腐败的可能性,断绝强势人群透过寻租获得司法特权的路径。在司法审判尚未开始之时,舆论对当事人进行罪与非罪的判断极为常见。不少学者称这一现象为舆论审判,我们不去讨论舆论审判一词的褒贬,但社会冲突语境下舆论影响司法的意愿确实强烈。

社会冲突语境下,舆论干预司法的意愿强烈。各种有关罪与非罪、罚或不罚的观点,会给法官最终的审理造成压力。对法官的研究,需要关注到法官如何将评价所谓的“舆论审判”,并将如何应对。

4 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面对舆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

社会冲突语境下,弱势人群的身份认同感,使舆论的社会动员力量显得尤为强大。“邓玉娇案”中,网友组成过声援团前往邓玉娇的家乡;“杭州飙车案”中,浙江大学师生齐聚车祸发生地悼念受害人谭卓。参与这些社会行动的网友和师生,与邓玉娇或者谭卓并没有直接的亲属、朋友关系,但他们愿意采取实际行动为邓玉娇或谭卓争取法庭上的主动。这与这些网友、师生担心自己的朋友、亲戚甚至自己也成为下一个邓玉娇、谭卓的身份认同感相关。舆论的作用,就在于激活了这些行动者的身份认同,扮演了社会动员的角色。

面对舆论所具有的社会动员力量,法官如果处理得当,就能有效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而如果法官不知如何处理或者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不满,难以阻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法官是否具有有良好的舆论沟通力量,来化解舆论的社会动员力量。

(三) 为何以向法官提供有助于舆论和司法良性互动的建议为研究目的

艾尔·巴比在谈到社会研究的必要性时提出:“几乎所有人,甚至其他一些动物,都想要预知他们的环境”^①。社会研究之所以必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能够通过因果关系和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来为人们在将来应如何行动提供建议。因此,我们探索法官对敏感案件的舆论态度,其目的是为法官将来应对舆论的行动提供建议。

1. 向法官提供建议的必要性

所谓“舆论审判”等现象的存在,使一些学者担心舆论和司法之间的关系会趋于紧张。对此,他们多从改善舆论的角度来提出改善舆论和司法关系的建议。但是,舆论和司法关系是由包括法官在内的多个主体共同塑造的。当网络迅速发展,相关法规政策已无法完全限制敏感案件舆论的形成时,仅仅依靠改善舆论的单一思路来改善舆论和司法关系就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即可以考虑通过改善司法对舆论的应对情况来改善舆论和司法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学术研究为法官提供如何才能促进舆论和司法良性互动的建议就显得尤为必要。

2. 向法官提供建议的可能性

前文已经提及,对于什么才是理想的舆论和司法关系,大多数学者已经能够

①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7。

达成共识,那就是让舆论和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以舆论监督司法,以政策规约舆论,从而同时保障公众的言论自由和司法公正,最终使舆论和司法达成一种“权利-权力制衡”的良性互动。这样的理想,正可以成为向法官提供建议的基础。因为这样的理想,使我们更为明了法官应对舆论时所应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并为我们建议法官需要如何应对舆论提供了思路。

二、社会冲突、敏感案件、舆论和法官的舆论态度

核心概念界定是进行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进行的基础工作,我们所关注的几个核心概念包括:社会冲突、敏感案件、舆论和法官的舆论态度。

(一) 何为社会冲突?

“社会冲突”本身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冲突,主要是一种由客观身份差异和主观认同差异共同导致的利益群体间的冲突。

1. 社会冲突是一种利益群体间的冲突

我们站在社会学角度对社会冲突进行界定,认为社会冲突是群体间的冲突,而不是个人间的冲突。同时,中国的社会冲突,也不能定义为阶级冲突,中国具有多重利益格局,也因此产生了复杂的利益冲突关系,我们无法将中国社会划分为泾渭分明的绝对对立的几个阶级。

2. 中国的社会冲突由客观身份差异和主观认同差异共同导致

在西方,萨瓦吉、普赛特等学者,在国内,孙立平、李路路、李培林等学者都发现客观的身份差异并不是导致社会冲突的唯一原因。由于行为方式上的“个体主义”,政治思潮上的“碎片化”等原因,人们的客观身份归属和主观身份认同发生了“断裂”。而主观身份认同正成为导致社会冲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借鉴这些研究成果认为,在当代中国引发社会冲突的不仅有客观上的身份差异,也有主观上的身份认同差异。

3. 社会冲突有多种表现形式

我们认为社会冲突既可以是行为上的对抗,也可以是情绪上的对抗。在现实世界中,潜在的情绪对抗和实际的行为对抗很多时候是同时发生的,由情绪对抗转向行为对抗也较为频繁地发生,因此我们不将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局限在行为对抗上。

(二) 何为敏感案件?

敏感案件首先是未决案件,所谓未决案件,指的是尚在审判过程未经法院审判结案的案件和已在公安部门立案但尚未移交法院的案件。所谓“敏感案件”指

的是当事双方关系涉及干群冲突、贫富冲突等社会冲突问题的未决案件，这类案件多为刑事案件并涉及暴力伤害。

1 我国有关敏感案件舆论管理的法律规制

一直以来，中国相关政策法规都不鼓励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敏感案件。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制定过规制刑事案件报道和评论的政策性规定；公安部、司法部制定过规制刑事案件报道和评论的规范性文件，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制定过规制刑事案件报道和评论的道德准则，我们将之统称为“既有规制”。既有规制中比较典型的有：1997年第二次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条强调，“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1999年司法部《司法行政系统新闻单位采编案件的规定（试行）》第五条规定：“案件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对司法机关正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前作定罪、定性或偏袒报道，不准利用新闻报道干预公、检、法机关办案。”2005年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案件报道的通知》第八条规定：“不得超越司法程序，不得违反事实和法律，不得擅自对案件定性。”综观上述既有规制的内涵，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一般刑事案件“不结案不报道，不结案不评论”；重大案件“不批准不报道，不批准不评论”。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法院接受媒体舆论监督的规定》，也保留了上述既有规制的相关内容，其中第四条明确提出：“对于正在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自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对于已经审结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新闻宣传部门协调决定由有关人员接受采访。对于不适宜接受采访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不接受采访并说明理由。”

2. 研究敏感案件的目的

敏感案件，是涉及社会冲突问题的司法案件。考察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是在社会冲突语境下进行法官研究，其目的是分析社会冲突对法官舆论态度的影响。

尽管相关法律规制对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有严格的限制，但在网络时代，由于网民可以率先发起对敏感案件的讨论，媒体也会打破相关限制开展对敏感案件的报道。因此，在敏感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事实上面临着如何应对舆论的极大考验。社会冲突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法官应对舆论的策略？对敏感案件的研究，正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一问题。

（三）何为舆论？

“舆论”，是指社会生活中一部分群众或一定集团对某种事态发展所持的大

体一致的意见,是一种社会思潮,具有支配人们行为道德的一定的权威性和无形的约束力。我们这里强调,舆论是一种被表达出来的公共意见,它涉及公众的言论自由权。

1. 舆论概念的演化

舆论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根据目前学者们的考证,舆论一词最早见于《晋书·王沉传》:“自古圣贤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舆人”即众人,“舆人之论”,指众人的看法。^①在英文中“舆论”对应的词汇是 public opinion,这个词直译为“公共意见”,有时也被翻译为民意,比如“public opinion survey”就被翻译成众所周知的“民意调查”。中国较早研究舆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国当代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舆论”,是指社会生活中一部分群众或一定集团对某种事态发展所持的大体一致的意见,是一种社会思潮,具有支配人们行为道德的一定的权威性和无形的约束力^②。

我们认为,舆论是经过公开表达出来的公共意见。舆论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在于前者是后者的表达,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权利其最基础的法理来源也就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意见不被表达,就不可能形成所谓的“无形约束力”。

舆论的发出者或者说意见的表达者是公众,公众是舆论的主体。但是因为媒介条件的限制,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公众的意见是透过媒体代为表达的。在中国对舆论的研究过程中,媒体对公共事件的报道、评论往往也被视为舆论。如原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甘惜分就认为:“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是社会舆论的载体,所以人们习惯地把新闻界又称为舆论界。其重要使命是表达、反映舆论,使人们通过它了解‘未知之世界、未晓之政令、未识之人士’,从而形成更大范围内的舆论。”^③

国内外研究者的表述中,媒体报道之所以能被称为舆论,是因为媒体是舆论的载体,媒体的“新闻自由权”,根源于公民权利中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但是,由于媒体所有制和社会结构的原因,新闻报道事实上只能反映部分的公众意见。李普曼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舆论学》里就有这样一段对新闻的描述:“报道环境的新闻传给我们有时快,有时慢,但是,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当作现实环境本身。”^④李普曼的思想,在把关论者、议程设置论者和媒介建

① 严石. 舆论——名词解释[J]. 新闻大学, 1982(4).

② 严石. 舆论——名词解释[J]. 新闻大学, 1982(4).

③ 甘惜分. 新闻舆论与社会控制[J]. 中国图书评论, 1989(3).

④ 李普曼. 舆论学[M]. 林珊,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2.

论论者那里得到了更为深入的阐述。可以这样说,很多研究者观察的民意,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个民意,它是在经过层层把关之后,经由媒体建构起的民意也即所谓的“公共意见”。

2. 如何理解网络时代的“舆论”

我们关注的网络时代的舆论,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第一是以“网民舆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公众舆论;第二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媒体组织通过报道评论等形式发布的媒体舆论。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媒体不再是舆论唯一的载体,公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机会。以“用户创造内容”为特点的Web2.0技术,更颠覆了人们对传播方式的理解。通过BBS、微博等社交媒体,每个人都能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听到其他人的声音。“公民新闻”、“公民记者”的概念则早在2000年左右就广为传播。但是,迄今为止,传统媒体形式并未消失,它们作为一种组织形态相对单个公众来说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媒体报道仍然是表达公共意见、影响公共意见的重要力量。

举例而言,电台、电视台、门户网站等以组织名义发布的消息、通信、调查性报道、评论、分析等都属于媒体舆论。而公众自发地通过网络发表的有关敏感案件的意见,则是公众舆论。而一些媒体组织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如果特别标明只代表本人观点,则也属于公众舆论而不属于媒体舆论。公众舆论和媒体舆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公民个人的意见表达,而后者是媒体组织的意见表达。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两点是:

首先,我们关注的公众舆论是网民舆论。没有在网络上传播而只在现实世界人际传播的言论,我们难以作出考察,而法官接触舆论的途径主要是媒体组织和网络,他们透过人际传播接触到的舆论也极为有限,因此我们对公众舆论的考察主要是对网民舆论的考察。

其次,围绕敏感案件形成的舆论并不穷尽于我们以上所提到的两种类型,但由于法官对其的接触极为有限,因此也不是我们所要考察的舆论。

(四) 何为法官的舆论态度?

法官的舆论态度是指法官对舆论的认知、评价和行为意向的综合表现。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是指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认知、评价和行为意向的综合表现。

1. 态度的组成

心理学家J. F. 弗里曼将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看做是态度的组成部分。他

认为:“态度对任何对象都有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种成分,它们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整体,是个体内部的较持续的系统。”^①弗里曼的这一定义,得到了社会心理学界的普遍认可。

2. 法官舆论态度的组成

根据弗里曼的定义,我们认为法官的舆论态度由法官对舆论的认知、评价和行为意向综合而成。这里将弗里曼态度组成中的“情感”微调为“评价”,是因为法官对舆论的态度无法用喜欢或不喜欢来描述,而应该用评价积极或消极来描述。

法官对舆论的认知,是法官对舆论客观存在的觉察和知晓,包括法官对舆论成因的认知、法官对舆论主体的认知两个方面。

法官对舆论的评价,是法官对舆论主体综合素养以及舆论带来社会影响的积极或消极的心理倾向,包括法官对舆论主体传播素养、法律知识素养的评价和法官对舆论监督司法、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评价。

法官对舆论的行为意向,是法官对舆论行将采取行为的心理倾向,包括法官应对舆论监督的行为意向,法官进行舆论管理的行为意向两个方面。

3. 研究法官舆论态度对预判法官应对舆论行为的意义

一方面,根据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对于事物或情境的态度、其他相关的态度以及特定行为的益处和危害,都是在行动前会被考虑的信息。当然有些行为可能是自动化的,不需要意志的参与,但是法官审判恰恰是一个理性行为。为了避免个人情绪对法官审案的影响,我国除了使用简易程序的民事案件或刑事自诉案件,其他案件都采取合议庭审判制度。这就意味着,大多数案件的审判结果都不是由某个法官单一做出,而是合议庭经过反复的讨论和磋商,并且在有特定法规限制以及法官特有培训的前提下做出。更进一步,如果法官参与的是终审审判,其对事实的审查以及下级法院的法律适用问题,则会更为谨慎和理性。因此,法官的舆论态度,会是决定其最终应对舆论行为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只有少部分法官亲审过引起网民热议和媒体报道的案件。他们的行为可以直接从判案结果中加以分析和考察,而那些没有亲审舆论热点案件的法官,他们在未来会如何面对舆论,如何定位舆论与司法审判之间的关系,寻求答案的最好方式仍然是对其进行态度调查。例如,对已有案件的公正评价,将很可能使该案件成为法官参照的判例;而非公正评价,将很可能促使法官寻求更

^① 弗里曼,等. 社会心理学[M]. 高地,等,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321.

为恰切的定罪量刑的司法解释、一个案件能否成为网民讨论的热点和媒体报道的焦点,并不受时间地点、法官学历的限制,发生在偏远地区的案件一样能引发热议,这正是网络时代不同于传统时代的特点。一个基层法官,完全可能面对如邓玉娇案一样复杂的社会冲突环境。对他们态度的考察,也因此显得重要。

三、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研究：路径与方法

我们根据弗里曼对态度的定义来设计内容架构,将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分解为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认知、评价和行为意向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这一研究会同时将社会冲突问题作为影响因素,考察它对法官舆论态度的影响。研究的最后,是基于学者们有关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理想,为法官应该如何看待舆论、应对舆论、应对社会冲突带来的影响提出建议。

(一) 本书的主要内容

通过调查研究方法,我们对法官如何认知、评价敏感案件舆论,以及未来将如何应对敏感案件舆论进行了考察。在考察过程中,我们重点分析了社会冲突对法官态度的影响。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文献综述,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总结和分析。

第二章,考察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成因的认知,主要分析法官对社会冲突语境下舆论关注敏感案件的原因是否有明确的觉察。

第三章,考察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主体的认知和评价,主要分析法官对社会冲突语境下舆论主体立场的认知和对舆论主体综合素养以及影响力的评价。

第四章,考察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所发挥社会功能的评价,主要分析法官对社会冲突语境下敏感案件舆论所发挥监督司法功能、缓解社会冲突功能以及联系社会功能的评价。

第五章,考察法官应对敏感案件舆论的行为意向,主要分析社会冲突因素是否影响了法官应对舆论的行为意向。

结语,为法官应如何看待舆论、应对舆论、应对社会冲突带来的影响提供建议。

(二) 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量化的调查研究方法,通过这一方法获得有关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态度的一手资料。

我们采用的辅助研究方法是质化的个案分析方法,通过这一方法获得有关法官应对敏感案件行为的相关资料。

1. 以法官为对象的调查研究方法

调查研究指的是采用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量化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①。在舆论监督司法这一问题的研究中,调查研究使用较少。分析原因可能两个方面,首先对舆论监督本身样态的研究可以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来完成,舆论是公众的意见表达,它透过各种媒介得以呈现,研究者无需经过对公众的调查研究来了解舆论的形态和发展规律;第二对司法从业人员尤其是法官的调查研究难度较高,学术界特别是传播学界与司法工作系统尚未建立起长期互动的学术合作关系。众多学者在探讨舆论对司法审判影响的时候,往往被挡在司法审判的门外,只能就事论事站在个案的角度作出分析。

(1) 法官态度调查的可信度

在调查过程中,可以发现法官对于接受学术调查持谨慎态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某一接受调查的法院回收的问卷答案完全一致。所幸,这一问题发生在调查的实验阶段,为了避免问题敏感度对法院领导层以及个体法官的影响,调查在全面开始之前不再使用实验阶段的普通调查员,而是选择了多位资深法官作为调查员向他们详细解释和说明了本次调查的单纯学术目的。

法官对接收学术调查持谨慎态度可以在《法官行为规范》中找到一定的原因。该规范第八十一条规定,法官对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中介机构等的邀请应当谢绝;对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党、政、军机关,学术团体、群众组织的邀请,经向单位请示获准后方可参加。本次调查是经法院组织路径进行的,获得了所有被调查法官所在法院领导的批准。

根据调查员的建议,本次调查对于法院名称和法官个人进行双重匿名,基层和中层法院的随机抽样也由调查员按照调查制订的抽样计划代为进行,因此基层和中层法院的所属地也是匿名的。可以说,此次被调查法官的个人信息有三重匿名。从调查结果来看,法官对一些敏感问题的回答并不避讳,比如多数法官都认为司法腐败现象客观存在,一些强势人群确实会利用非正常手段干预司法等,这可以反证在三重匿名的情况下,法官的回答是具有较高可信度的。

(2) 调查问卷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和指标体系

我们主要采用李克特量表测量法官的态度。该量表是社会心理学家李克特

①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72。

于1932年构建的,它是由一组对某事物的态度或看法的陈述组成,而回答者对这些陈述的回答会被分成“非常同意、同意、不知道、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等表述方式不同的五类形式。李克特量表能够较为清楚地显示人们对某一观点、问题的态度差异,是社会研究中用得最多的一种量表^①。

我们结合探索性研究的结论,将学术界、业界有关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相关论述和观点进行提炼、总结,创造了一套测量法官舆论态度的指标体系。根据这一指标体系,我们设计了问卷,并按照李克特量表法按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太同意、非常不同意五个层次对法官的态度进行调查,并以5、4、3、2、1从高到低赋予其分值。

2. 辅助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地描述和分析现实中舆论监督司法的情况,我们还采用了个案研究的方法,即对一些典型司法案件做定性分析,来对定量研究方法进行补充。

我们选取的案例,都是典型的敏感案件。包括“张金柱案”、“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我爸是李刚案”、“钱云会案”^②、“躲猫猫案”^③等,这些案件的当事双方都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涉及公众与“官二代”、“富二代”、乡镇腐败干部等群体的矛盾关系。

同时,这些案件都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除了张金柱案外,其他案件都是网络热点案件,网民的热议催生了来自这些案件的流行语如“欺安马”、“躲猫猫”、“我爸是李刚”等。这些流行语充分表现了网民对强势阶层违法行为的不满,也表现了公众对司法的极度不信任。我们研究的案例,都受到了媒体的重视,并进而导致行政权直接干预司法审判,有些案件甚至是在省委书记的关注下审理定案的。对这些案件的个案分析,有利于对被调查法官的态度做验证。

(三) 所抽样法官的基本人口特征

目前我国法官人数约为19万多人,其中高级法院法官0.7万人,中级人民

①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96。

② 钱云会案:钱云会是浙江温州乐清蒲岐镇象山村村长,2010年12月25日,钱云会被发现1故于超载1程汽车轮下。案件一开始,就有村民怀疑钱云会死于谋杀。钱云会于2011年当选村主任,曾因土地纠纷问题带领村民上访,并在上访过程中,先后5次被投入看守所。公众怀疑钱云会之死与土地纠纷有关。2011年1月30日,温州警方媒体公布了手表等证物,宣布钱云会的死因是交通事故。

③ 躲猫猫案:2009年2月12日,青年李林明被发现于云南晋宁县看守所内。李林明是于2009年1月28日因涉嫌盗伐林木,被云南晋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羁押于晋宁县看守所内。2月12日,案件调查组称李林明是在看守所内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头部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一说法遭到了公众的强烈质疑,“躲猫猫”一词也迅速在网络走红。在舆论压力下,相关部门作了进一步调查。最后的调查结果是李林明死于同监室人员的暴力殴打。

法院法官 3.6 万人,基层人民法院法官 14.6 万人^①,法官人数呈明显的金字塔形分布。为了建立抽样的有效性,我们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抽取法官作为调查对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调查者自身能力所限,本次调查抽样未能覆盖少数民族地区、港澳台地区的法院以及专门人民法院(如海事法院)和军事法院。

我们首先在最高人民法院随机抽取法官样本,最高人民法院是独立存在的我国最高法院机关,最高法院法官具有解释司法、发布法律规定的权力,因此需要做单独的抽样调查。在最高法院的抽样,由调查员按简单随机的方法进行。

其次根据我国法院分布情况,在全国的大区层面进行抽样,并随机抽中东北、西南、华东(除上海)、华北(除北京)四个地区为抽样地区。在这一分层抽样中,北京和上海被直接定义为抽样地区,这是因为北京与上海两个直辖市的特殊性。北京为中国首都,最高院所在地,同时也是法律人才的高地。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并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同样也是法律人才聚集之所。

再次,我们在法院层面进行抽样。从两个直辖市和四个地区中随机抽取高级人民法院 3 个,中级人民法院 8 个,各类基层人民法院 30 个。

最后,我们在各法院按简单随机的方法抽取法官 10 到 15 人。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 430 份。调查收回问卷 412 份,其中有效问卷 381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5%。作为有效样本的被试法官人数分布情况基本符合中国法官人数总体比例,如图 1 所示(另有 0.3% 的法官没有表示他所在法院的级别)。

被调查法官中填写年龄的样本数量为 364 人,其中年龄最小的 29 岁,最大的 59 岁,平均年龄 39.1 岁。有 370 名被调查法官填写了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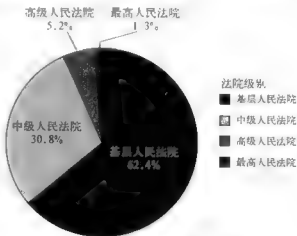


图 1 所抽样法官所在法院级别百分比

^①《人民法院简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 <http://www.court.gov.cn/jrsz/rmfyz/>。

包括助理审判员 127 位、审判员 137 位、庭长或副庭长 77 人、审委会委员 29 人。需要说明的是,29 名审委会委员都为庭长或副庭长,但是由于是单选题且审委会委员的资历要求高于庭长、副庭长,因此他们不再归入庭长或副庭长这一职务。一线工作的助理审判员和审判员占被试法官的大多数。我们看到,法官的整体学历水平较高,有 371 位被调查法官提供了自己的学历信息,本科及以上学历者为 359 位,占有效比例的 96.8%,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者有 119 位,占填答该问题法官总数的 32.3%。同时法院级别越高,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被调查法官人数也越多。

社会冲突中的舆论和司法关系研究

经过多年探索,中国的舆论和司法关系研究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在言论自由、权力制衡等理论的基础上,共同创造出一种“权利-权力制衡”的研究范式。但这一研究范式忽视了舆论和司法互动的社会冲突语境,我们认为可以将社会冲突理论引入“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为探讨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解释框架。

第一节 有关舆论和司法关系的“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

对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微观研究领域,而“舆论”一词,又常常被替代或分化为媒体、民意、新闻等概念得到讨论。在CNKI数据库中,能够看到最早谈及舆论和司法关系的文章发表于1980年,它的研究观点是“司法审判要走群众路线”。林威肃在《公开审判和群众路线》一文中写道:“公开审判时还要组织群众旁听,体现了群众对审判工作的监督。”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开始多维度发展,“权力制衡”理论被广泛介绍到中国。司法作为一种重要的公权力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司法需要得到监督的思想也在学界逐渐传播。20世纪80年代后期,“群众路线”这样的语汇逐渐从学术研究中淡出,“舆论监督”则作为一个概念被众多学者接纳。

一、研究的初始阶段

学者们在探讨舆论和司法关系的初始阶段,论证重点是“舆论监督公权力的重要性”。以“舆论监督”为篇名检索词在CNKI数据库中发现,1987年是“舆论监督”研究的重要节点。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首次在党的报告中提出“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在会议召开之前和召开过程中,《社会主义研究》、《中国记者》和《新闻与写作》杂志就已经分别刊发了陈谋亮的《论社会主义舆论监督》、徐心华的《加强舆论监督,发展民主政治》、童兵的《新闻批评是有利的舆论监督——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战斗性》。这三位作者分别来自社科院、新华社和中国人民大学,代表着中国研究机构、新闻媒体和高校对“舆论监督”的研究全面展开。这三篇文章对舆论监督的主体、客体、方法、内容、功能等方面做出了最基

础的学术探讨。十二大召开后,曾在1984年负责新闻立法工作的胡绩伟在《略论舆论监督》一文中特别提到了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关于法律方面的监督。就是通过舆论工具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一方面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依照立法程序,参与研究和讨论;另一方面要监督各级机关、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遵守法律;还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使每个公民都自觉地遵守法律,并懂得用法律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舆论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坚持贯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支持和监督司法机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严肃处理一切违法事件。”^①到1988年,CNKI中含有“舆论监督”篇名的学术论文猛增至80篇,学术论争也随之出现。1988年至1990年代初,围绕舆论监督的学术研究规模持续扩大,学者们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和发现新的问题,对司法的舆论监督研究也随之发展而来。这一时期对司法的舆论监督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媒体监督被看成舆论监督司法的关键

1987年,陈谋亮提出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但监督本身必须通过“舆论媒介和正常渠道”才能实现。^②媒体(或称媒介、传媒,都对应于英文media一词),是人民群众监督司法的主要方法。在1980年代末期,广大人民群众有效监督司法的手段和方法主要局限在信访、投书,而这些行为也难以被学者观察和研究。可以说,直到互联网出现之前,舆论监督司法的研究事实上囿于媒体监督司法的研究。1988年魏永征写道:“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是各种舆论监督手段中最常用也是最有力的一种手段”;虽然“舆论监督的权利主体是人民群众,新闻媒介只是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利的代言人”,但相对而言,人民群众“向党和国家信访”是间接民主性质,而“向新闻媒介”信访则具有直接民主的性质。^③该文研究的舆论监督客体并没有局限在司法这一种公权力,但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为以后司法的舆论监督研究形成“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这在后文中将有重点阐述)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源泉。从概念使用上看来,媒体监督有时也被表述为新闻监督,新闻报道是媒体监督的主要表现形式。童兵发表于1987年的文章《新闻批评是有力的舆论监督》^④,其标题就明确表现出学界对媒

① 胡绩伟. 略论舆论监督[J]. 新闻知识, 1987(12).

② 陈谋亮. 论社会主义舆论监督[J]. 社会主义研究, 1987(4).

③ 魏永征. 舆论监督应当制度化、法律化[J]. 新闻记者, 1988(2).

④ 童兵. 新闻批评是有力的舆论监督——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战斗性[J]. 新闻采访与写作, 1987(11).

体监督手段的学术理解——媒体监督主要通过新闻报道来实现。在后继者的研究中,“媒体监督”和“新闻监督”有着相似的内涵。

2. 围绕舆论监督会否干扰司法独立的学术论争开始出现

1989年,一篇名为《是干扰司法独立,还是阻碍舆论监督》的本刊评论员文章在《法学》杂志上刊发,这是首次期刊界向司法机关“舆论干扰司法”的观点发出强烈质疑,文章阐述道:“既然依法在公开审理的基础上,需要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那么,就应该允许对已经公开的案件(特别是法律适用)提出各种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如果舆论一律,哪里还有监督可言?”该文的发表,表明针对舆论监督司法的论争已经开始出现。该文发表的背景是:《法学》杂志在1988年9月组织了一期针对“戴振祥投机倒把案的罪与非罪”的法学讨论文章,对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判定戴振祥罪名成立提出质疑。天津高院随即做出反应,由其副院长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点名批评:“《法学》杂志在法院一、二审审理时间,连续发表文章,并在津举行座谈,称戴振祥经营商品房,系改革和为民造福之举,应宣告无罪,纯属对法院审判工作的严重干扰,严重违反了国家关于‘不得利用新闻报道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规定,是非常错误的。”可以说,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两者如何达成平衡,在舆论监督司法研究伊始就成为学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3. 对司法的舆论监督研究呈现跨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我们对CNKI数据库的研究发现,对司法的舆论监督研究主要源于两个学科领域。一为新闻传播学界,学者们的研究选题从舆论监督公权力逐渐细化到舆论监督司法,是一种舆论监督客体的研究演化过程;二为法学界尤其是法社会学界,学者们的研究选题从司法应受到监督,逐渐细化到司法应受到舆论监督,是一种监督司法主体的研究演化过程所致。而这两个学科领域共同认可的理论基础则都与西方政治学、社会学中的“公平”、“正义”和“权力制衡”思想密切相关。如果说1980年林威肃的文章《群众路线和公开审判》依然在沿用“文革”前的学术语汇^①;那么,1981年《试论我国的公开审判制度》一文,对“保障人权”、“三权分立”等语汇就已经不再避讳。该文发表于刚刚复刊的《法学》杂志上,其中提到“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打破封建束缚,扫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提出了‘保障人权’、‘三权分立’等原则”,“这和封建社会的法律比较,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②。

① 林威肃,群众路线和公开审判[J],人民司法,1980(1)。

② 陈宝树,试论我国的公开审判制度[J],法学,1981(4)。

4. “权力-权利制衡”研究范式显现雏形

在西方,媒体被称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是得到学者认同的可以制衡其他三权的力量。在中国,媒体之所以有监督司法的合法性,是因为其代表民众的声音,在替代民众行使监督的权利。因此在中国,舆论对司法的监督,不是权力对权力的制衡,而是私权利对公权力的制衡。这是学者们研究舆论监督司法时普遍采用的逻辑起点。舆论监督司法,被看成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要素之一。徐心华在1987年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加强社会民主监督。而要实现社会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则是一条重要的渠道。”^①到1990年代后期,“权力-权利制衡”范式在贺卫方、李尚公等学者和媒体从业者的推动下渐成气象,并对后来者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的形成阶段^②

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者们不再单纯地用监督和被监督来描述舆论和司法间的关系,在学术语言上采用更客观的“舆论与司法关系”的表述来替代“舆论监督司法”的表述。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具体表现在“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的逐步形成。

“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以“舆论监督司法具有合法性”为理论前提,以“权利-权力制衡”为解释框架,以改善舆论与司法紧张关系为学术理想,与传播学人本主义范式呈现出相互对应的一种微观领域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强调公民的监督权利,带有价值理性的色彩,其内在判断是舆论虽然需要受到适当限制以维护司法独立,但舆论监督对于限制公权力的扩张却是必不可少的。

1. 研究范式中基础理论的确立

1998年,贺卫方于《法学研究》第6期发表《传媒与司法关系三题》,这是较早系统讨论媒体与司法关系的文章,并广为后来的研究者引用。文章尽管有一部分专门谈到传媒监督司法的界限,但其核心论点仍然是传媒监督有利于司法公正,并强调司法有保护新闻自由的必要。这种观点的形成,建立于公权力需要得到公民监督的论证,也就是说公民有监督司法这一公权力的权利,而媒体报道恰恰维护了公民的这一权利。贺卫方提出“任何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都离不开一定的监督机制;没有了监督,握有权柄者必然会运用自己的权力牟取私利从而

① 徐心华,加强民主监督,发展民主政治[J],中国记者,1987(9)。

② 胡茜茜,权利-权力制衡理论范式的形成[J],国际新闻界,2009(11)。

导致腐败。”而传媒“对传统三权的制约在许多方面一点也不亚于三权之间的制约。因此,如果我们要研究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规范的话,对传媒与立法权、行政权以及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不给予关注。”

贺卫方作为法学学者,其强调的重点是公权力需要得到制约;另一位新闻从业者李尚公则更强调公民言论自由的必要性。他认为“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言论都不具有杀伤力,只有‘惟一’的声音才是可怕的”,“真正独立的司法根本不担心传媒的干扰,正像它不担心社会势力的干扰一样;真正自由的传媒也不会损害司法独立,因为总会有几种不同的声音的。”^①媒体可以帮助公民实现言论自由权的判断,为媒体监督司法的合法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

正是这些 90 年代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为后来者搭建起了一种“权利-权力制衡”的解释框架,其核心是舆论监督司法的合法性,其基础是分权制衡的宪法学理论和自由主义的传播学理论;其内在逻辑是,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和监督公权力的权利,媒体作为实现公民权利的载体,也具备通过传播活动对司法这一公权力进行监督的权利。

2. 研究范式的影响逐步形成

陈力丹发现,2004 年就有学者明确提出,在舆论和司法这一对关系中,需要同时保障司法独立和舆论自由^②。更早一年,孙旭培、刘洁撰文写道“舆论监督的权利来自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传媒作为公民实现上述三项权利的载体,客观上具有了监督司法的效能。”^③这些都体现了“权利-权力制衡”理论分析框架的影响。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明确表示应当将“分权制衡理论”作为分析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理论框架,如宋旭明在发表的《论分权制衡理论视野中的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之关系》一文

“权利-权力制衡”理论分析框架,将舆论特别是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置于广阔的社会结构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使得采纳这一框架的学者能够拥有高屋建瓴的研究视野。一个明显的表现是,众多学者关注导致舆论与司法呈现紧张关系的社会结构原因,行政权作为同时影响司法和媒体的因素得到了普遍重视。

学者们的理论追问不是简单的舆论监督是否干预了司法独立,而是“权利-权力制衡”结构为什么在现实社会的诸多案例中难以成型。寻钊提出无论是司法还是传媒的权力(利),都依附于更高的权力。更高的权力既可以从整体的社

① 李尚公,“司法与传媒”学术研讨会讨论摘要[J],中国社会科学,1999(5)

② 陈力丹 2004 年新闻传播研究的 12 个新鲜话题[J],新闻界,2005(1).

③ 孙旭培,刘洁,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J],国际新闻界,2003(2).

会效果出发或它所认为的“公共利益”指示传媒对司法进行干预以限制司法权力,又可以同样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制止媒体发言以限制其表达自由^①。陈敏则认为在中国现有的行政体制下,行政权力干预司法独立并不少见。相关司法案件经过媒体曝光,引起了行政权力的关注,这种“关注”往往防止司法进程中产生腐败,促进了案件的公正公开审理。从这个角度看,媒体报道司法案件是一种正当的监督,但是却不能以监督权对司法权进行制衡,而只能以引起行政权力“关注”进而解决司法腐败,这从某种程度上也昭示了法制建设的不健全^②。众多学者都认为司法没有独立于行政权之外,舆论与司法的紧张关系,多由社会的权力结构失衡造成,单纯批评舆论干扰司法独立有失科学性。

“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的影响还体现在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其他国家对舆论和司法关系的认知和定位。比如,宋素红、罗斌对两大西方法系中的媒体和司法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他们提出:“就传媒与司法关系而言,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前者有对新闻报道进行限制乃至处罚的措施或制度,后者则没有,其关键因素在于前者实行陪审制。而在当代司法实践和学术思潮中,两大法系在此问题上均表现出对新闻自由保护的倾向。”^③高一飞则总结目前世界各国有三种处理媒体和司法关系的模式,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自我约束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司法限制媒体模式”和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司法向媒体开放模式”。高一飞认为:“未来的媒体与司法关系将走向相互开放,整体上将朝着接近大陆法系国家的模式发展,即司法对媒体并不进行限制,司法尽量向媒体开放,对司法与媒体的关系采取‘放任主义’的态度。”^④

三、“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的成熟更新阶段

“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解决了有关什么才是理想的舆论和司法关系问题,即“应然”的问题。但法官研究的缺乏,使这一研究范式并没有完全解决“实然”的问题,即当下的舆论和司法关系究竟是何种状态的问题,以及有哪些因素影响到了目前的舆论和司法关系的问题。

① 杨红:“两界冲突”还是“权力失衡”——传媒与司法关系的表现和实质[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② 陈敏:《媒体审判新探》[D],上海:复旦大学,2008:26。

③ 宋素红、罗斌:《两大法系媒体与司法关系比较》[J],国际新闻界,2005(5)。

④ 高一飞:《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的三种模式》[J],时代法学,2010(2)14。

1. 需要更新的理论基础

绪言中已经阐述了法官研究的缺乏给舆论和司法关系研究带来的影响。发展到今天,“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如果想要在法官研究等新的领域内发展,就必须更新其原有的理论基础。

这里的更新不是指扬弃现有的权力制衡理论和言论自由理论,而是指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对新的研究对象、新的研究问题进行探索。如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当前的舆论和司法关系为什么会在某些时候呈现出紧张状态,也需要新的理论来帮助我们寻找建立良性舆论和司法关系的方法和路径。

对新理论而言,它需要在价值取向上与现有理论保持相对一致,但又能提供新的解释框架拓展现有解释框架的适用范围。我们认为社会冲突理论是一种可以引入“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的理论,这在下文中会有详细的阐述。

2. 需要更新的研究方法

就目前而言,“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没有尽善尽美,其在研究方法上的欠缺表现得尤为明显。理论演绎和个案归纳是目前舆论和司法关系研究中的主流方法,甚至可以说是垄断的方法。当然,研究方法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但是在舆论和司法关系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单一化并不是学者优化选择的结果,而是研究局限所在。学者们在集中精力论证舆论监督司法的合法性以及为平衡舆论与司法关系提供建议的时候,忽视了对现实世界的准确描述。

首先,使用理论演绎法是因为学者们需要论证舆论监督司法的合法性,以及描述舆论与司法在社会结构中的理想位置。但是,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结构各有不同,仅依靠纯粹的理论推演,容易导致研究结论与现实脱节。外来引进成果始终处于水土不服状态就与此有关。尽管权利-权力制衡体系是中国和欧美各国共同具有的,但从社会整体结构到司法制度,中国仍然与美、英各国有明显的差异。学者们引进的美、英各国制衡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经验,难以直接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采用。

其次,使用个案归纳法是因为学者要了解现实社会中舆论与司法关系到底呈现出怎样的状态。但是个案本身千差万别的特性,会导致研究者只关心舆论与司法之间的即时关系,使研究结论失于偏颇。比如,仍有小部分研究在强调媒体介入案件报道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但其论证基础多为“张金柱案”、“赵湘杰案”等极端案例,有“就事论事”的特点,其视野局限在个案中,未能从整体社会结构的角度把握舆论与司法的关系。

从目前来看,舆论和司法关系研究对现实的系统关注仍然缺乏。量化研究方法以及质化研究方法中的田野调查、文本分析等方法,亟待引入研究范式当中。这一方面,已经有学者开始了研究工作。比如汪明亮在法官定罪量刑的社会模式研究中就使用了调查研究的方法,类似的研究工作仍然需要更多的学者共同参与。

科学研究并非一定要产生即时的现实反应,但是舆论与司法关系这一命题却深深植根于现实世界。因此,对于现实世界的系统反思,仍然是舆论与司法关系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而这可能也是这一领域中不断产生创新观点的源头所在。

我们正是期望通过对被监督者的调查研究,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舆论与司法关系可能的发展方向,期待能较为准确地描述目前舆论和司法在互动时所处的现实语境,尽可能地靠近中国舆论与司法关系的真相。

第二节 将社会冲突理论引入“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的可能

社会冲突问题是影响当前舆论和司法关系的重要因素,它对法官舆论态度的影响也因此不能被忽视。那么社会冲突理论能否帮助“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进行理论上的自我更新呢?我们认为可以的,这是因为社会冲突理论与“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在价值取向上有共通之处,同时社会冲突理论又能够为解释当前的舆论和司法关系提供新的工具。

一、西方的社会冲突理论

重新重视社会冲突研究,是西方世界在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后的反思。从米尔斯、科塞到达伦多大,学者们的研究打破了结构功能主义塑造的西方社会的和谐景象,提出社会本身是一个在各种利益矛盾推动下始终充满冲突的过程。

1. 社会冲突论的奠基者

马克思学说是社会冲突研究绕不过去的巨大山峰,无论是否赞同其观点,学者们都必须站在马克思对社会冲突的理解上开始自己的冲突论学术征程。达伦多夫用闲散的学术随笔来《论社会冲突》时,也不免要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一番“文献综述”。正如周晓虹所说:“阶级及阶级分析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向,它也直接影响到现代社会学有关社会分层领域的研

究,更是‘社会冲突论’公认的理论滥觞之一。”^①马克思认为阶级冲突是社会冲突的基本形式,也是导致社会变迁的原因。经济因素是划分阶级的最主要标准,而阶级意识则会点燃社会冲突的导火索。当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自在”转向“自为”的时候,阶级斗争就将出现并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韦伯和齐美尔关于社会冲突的论述也深刻影响了后来者对社会冲突的理解。韦伯对阶级的划分标准不局限于经济因素,他认为宗教、教育、政治党派也会影响社会的组织结构,“地位”作为一种非经济要素,同样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韦伯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财富和声望的高度相关性;报酬分配的垄断化程度以及低水平的社会流动率。同韦伯一样,齐美尔认为冲突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社会互动的常见形式,而齐美尔对社会冲突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社会冲突正功能的评价,他认为社会冲突同样也是取得“某种统一”的方法,这一思想可以说是科塞“安全阀”理论最重要的基石。齐美尔认为当冲突是经常性的、低烈度的和低暴力性的,冲突中的人能够释放出敌意的时候,冲突将对整个社会产生整合效果;同时,如果冲突是工具性的,并被视为实现冲突群体清晰明确目标的手段,冲突的暴力性水平将会下降^②。

从经济学转而研究社会学的帕累托是另一位对社会冲突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尽管他的论述在雷蒙·阿隆那里遭到了极大的嘲讽,但他的“精英循环理论”却为后来者提供了思考的线索。他认为权力一旦持久存在且不受制约,就会使统治者变得贪婪、腐化,同时变得软弱无力,而社会不满情绪会日渐增加,社会冲突由此必然产生。而政府如果过多地依赖暴力统治,尽管可以收到暂时的效果,但最终却会招来反抗和斗争。因此,在帕累托看来,“合理的精英循环机制必须使政治精英层始终保持吐故纳新的状态,只有达到一个‘能上能下,能屈能伸’的流动状态,才能最终完善精英循环流动机制,实现政治的稳定和有效运转。”^③

2. 社会冲突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社会冲突客观存在,社会冲突并非洪水猛兽,相反它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

① 周晓虹. 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07.

② 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169.

③ 李彦超. 精英循环理论视野下我国精英循环的现实分析[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8): 8.

“正功能”，这是马克思和齐美尔之后西方冲突论学者们重点论述的内容。

(1) 科塞有关社会冲突正功能的论述

科塞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延续齐美尔有关社会冲突正功能的研究，与齐美尔不同的是，科塞关注社会冲突在宏观层面的影响。他认为，强调社会冲突的“正功能并不意味着否认某些冲突的确会破坏群体的团结合作，也不否认它会导致特定社会结构的解体。但是，对于已偏向其他方向的分析来说，这种强调可以起一种校正的作用。”科塞提出了安全阀制度以缓解社会冲突。关于安全阀，他的主要观点如下：①通过释放被封闭的敌对情绪，冲突可以起维护关系的作用。②社会系统往往为人们提供排泄敌对情绪和进攻性情绪的制度，即安全阀制度。③社会结构越僵化，安全阀就越重要。④安全阀可以发泄敌对情绪，转移目标，但是它不能解决问题，只能缓和矛盾，并不能解决矛盾。⑤安全阀制度提供敌对情绪的替代目标以及发泄的手段。⑥当相互对立的利益或相互敌对的情绪受到压制的时候，产生的结果之一是把敌对情绪从真正的根源中转移出来，从其他渠道发泄。压制冲突的结果之二，是导致相互关系的终结。⑦没有安全阀制度或安全阀制度不完备的社会结构都是僵化的社会结构，因而也是潜伏危机的社会结构^①。

如果将这样的论述引入舆论与司法关系研究领域，就可以看到社会冲突并不总是意味着危机，权利-权力博弈也可看做社会互动的常态。对舆论与司法关系的准确描述，似乎可以让我们看到缓解社会冲突的新的路径。司法本来就是调节社会冲突的手段，因此司法机关对具体案件的审判完全有可能成为缓解社会冲突的安全阀。另一方面，舆论对司法的监督除了能够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表达权之外，更可以成为社会各阶层以对话取代冲突的有效方法。

(2) 达伦多夫有关社会冲突发生机制的论述

达伦多夫有关社会冲突发生机制的论述较多地受到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即从权力结构的角度去看待社会冲突何以发生。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的直接起因是由居于统治地位者的权威地位失落导致的既成权威结构解体^②。达伦多夫强调社会流动对社会冲突的影响作用，他认为社会地位间的流动越大，冲突就越缓和，因为人们不大可能倾向于去攻击一个他们的子女有朝一日也可能去加入的阶级。另一方面，如果流动很少或没有

① 徐玮，论科塞功能冲突论及其安全阀理论在我国的应用[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7(4)：17

② 转引自于建嵘，抗争性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5。

流动,斗争就会更加激烈。因此,达伦多夫论证道,政治群体被置身于权力之外的时间越长,就变得越趋向于激进^①。

为什么舆论和司法的关系有时会陷入紧张状态,达伦多夫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的视角。同时,达伦多夫的理论也能帮助我们从源头上找到消除导致舆论和司法陷入紧张关系的方法,使我们在为司法提供舆论应对意见时有据可循。

(3) 米尔斯有关社会冲突实质的论述

米尔斯对中产阶级和权力精英的研究,使他深入考虑到了现代社会冲突发生的必然性。和达伦多夫类似,米尔斯也强调冲突研究需要重视社会的权力结构。他强调,任何可靠的宏观社会学分析,都必须建立在对权力斗争的研究之上——彼此冲突的阶级之间的斗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强权者与大众之间的斗争^②。

米尔斯认为,现代社会冲突的实质是权力精英和大众社会之间的冲突,以及权力精英内部的冲突。他发现权力精英会通过垄断权力、控制政治信息和操纵传媒等方式对大众社会进行强权统治,而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则需要唤醒社会对理性和自由的尊重^③。

米尔斯的思想,有助于我们从大众社会的视角来思考司法腐败对舆论和关系的影响,并考虑在社会冲突语境下如何将理性和自由引入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理想模式。

西方社会冲突研究源远流长,大家众多,观点各异,即便是公认的社会冲突研究代表人物米尔斯、达伦多夫和科塞也都有各自的理论渊源和背景。社会冲突理论是一种范式,它重要的特点是研究视角和价值取向,社会冲突理论从冲突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并辩证地看待冲突对于社会的功能。从根本上来说,任何一个社会学家都不可能忽视社会冲突的存在,即便是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也在通过使用“病态”、“紧张”、“压力”等概念来描述社会冲突。我们认为处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需要正视社会冲突的存在,并辩证对待社会冲突对当前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将冲突论引入舆论与司法关系研究不仅具有可行性,也具有现实意义。

① 沃尔夫.达伦多夫及其冲突论[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3(11).

② 叶克林,蒋影明.现代社会冲突论[J].江苏社会科学,1998(2).

③ 张明成.米尔斯政治社会学思想述评[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5) 9.

二、中国对现实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 GDP 的增长毋庸置疑,但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分层现象凸显,社会矛盾冲突日渐增多。

1. 社会学角度的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现实社会发生巨大转型,学界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针对社会阶层意识的定量研究和针对冲突事件的个案研究都在不断增加。“风险社会”理论的引进,使学者们的现实关怀更为强烈。社会学和法学领域中都有学者用各种方法描述中国面临的社会冲突风险,并尝试提出解决之道。

福赛尔的 *Class* 直译为《阶级》,20 世纪 90 年代末被介绍到中国并取得名为《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位》,译者石涛在序言中写道:“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等级分层的新十字路口。几十年的平等社会神话已经打破,人们的社会等级观念正在急速地更新。”^①这一现象在李培林的《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研究中得到了定量的描述。该书使用客观阶层归属和主观阶层意识两个层面的指标,对中国当代社会冲突可能发生发展逻辑进行了分析:“利益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平感和对现状的不满才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大对各种非法收入的打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维护社会公平,可能是保持社会稳定更为重要的政策举措。”^②与社会冲突相关联的研究是社会分层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的阶层化客观存在。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学者们较为关注社会的稳定器中产阶层的研究,如周晓虹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到 2010 年前后,学者们注意到中国社会较低阶层的活动已经对政治稳定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针对农民、城市流动人口等的研究大大增多,有关社会分层与社会冲突关系的论证也开始出现。

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社会冲突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论文中多见特定地区特定群体的冲突研究。如农村地区的社会冲突、城市群体间的社会冲突、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冲突等。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学术目标

D 转引自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62.

① 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62.

下,对当前社会冲突进行解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很多学者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目前许多社会冲突的发生,是因为一些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寻找到合适的表达途径,比如失地农民和下岗再就业的工人。学者们建议放弃对中国社会冲突研究的“精英化”视角,以“底层”的目光来观察来自底层的“生存性冲突”和“抗争性冲突”。如于建嵘提出“底层社会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价值观,还是一种研究方法。”^①

针对中国面对的社会冲突风险,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社会需要相应的改革。比如邓伟志提出,中国当前社会差距过大,导致社会冲突加剧,声声警钟提醒人们开展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需要开展阳光文化,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特权阶层的疯长,一些人“闷声发大财”,在暗箱里把公权力异化为私权力,针对暗箱操作的黑暗,就要让阳光射进暗箱里^②。孙立平则认为,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来准确判断中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在这个前提下,一方面形成柔性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形成体制对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容纳能力,形成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手段。另一方面,适时地推动一些关键环节的改革,而不是用旧的思维来延误改革时机^③。

2. 传播学角度的研究

传播学者已逐渐加入对社会冲突的研究队伍,近年来在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这一情况表现得尤为明显。群体性事件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冲突较为常见的表现形式,传播学者们指出,很多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和发展都与舆论的社会动员深刻相关。秦志希、杨华认为:“在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着鲜明的‘潜舆论—显舆论—行为舆论’这样的演化过程。首先,虽然群体性事件往往由偶然事件引发,但其背后是某一社会问题或社会矛盾的长期积淀,这些问题或矛盾成为舆论的诱因,使得民众的信念和情绪以潜舆论形态存在着,尽管不清晰,不完整,却非常真切。”^④事实上我们所提到的敏感案件,其中有很多都与群体性事件相关。比如贵州瓮安事件,最初也只是作为一个敏感案件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从这一分析出发,无论是司法审判还是舆论动员,最终都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对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研究完全可以从社会冲突论的角度出发,这与业已形成的

① 于建嵘. 抗争性政治[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3.

② 邓伟志. 声声警钟呼唤社会改革[J]. 人民论坛, 2013(4).

③ 转引自于建嵘. 抗争性政治[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49.

④ 秦志希, 杨华. 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特征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0(9).

“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并不矛盾。

新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动员作用,也是传播学者近年来关注的焦点。韦路是近年来关注微博社会动员作用的学者,在他指导的硕士论文中,可以发现这样的结论:“动员主体接触并理解事件信息,并将所理解的事件信息及所形成和态度与原有的认知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知识修养)和态度观念比较,然后通过分析,选择自己认为能引起受众关注的形式发布在微博上。动员主体通过微博这一载体所发布动员信息引起微博用户(动员客体)注意。这些动员客体理解所接受的动员信息,与自己原有思维相结合,形成自己观点与想法,发生态度转变。”^①

不少学者的共识是,要想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几率,其根本解决办法是相关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使普通公众不必通过舆论压力来“求真相”。谭和平认为信息传播失真引发集群行为,信息不对称导致零和博弈,信息不公开诱发“自立救济”行为,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诱因。基于此,加快信息公开制度化建设、建设回应性政府,加强舆论性载体的引导和利用、有效实现社会控制,增加沟通信息的“透气孔”、建立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是防止、减缓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冲击的重要举措^②。丁柏铃认为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相比于现实环境中的舆论所显现的特点,对政府应对公众舆论提出了新的相应要求。及时、主动、充分地公开政府信息,成为关系处理中的重要前提;进一步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成为必然之举;真诚地接受网络舆论监督,成为政府得到公众理解和信任的一条捷径。政府和公众宜共同努力,形成和凝聚舆论正能量。^③

三、一种共有的价值取向

社会学家帕森斯指出科学研究一定是在价值关联的情况下进行的。首先,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必然会根据他的价值观设定对科学意义的承诺——这必须是他的天职;其次,科学仅仅在有限的情况下,才是纯粹个人孤立的活动——它一定具有经由社会化组织的特点^④。

无论是基于言论自由和权力制衡理论形成的“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还是具有长期历史积淀的社会冲突论,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这就是公

① 乔羽佳.微博动员与集体行动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2:38.

② 谭和平.群体性事件诱因及其消解[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1).

③ 丁柏铃.新媒体语境中舆论特点及政府与之关系论析[J].中国出版,2013(10).

④ 转引自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58.

民权利需要得到保护,而权力则需要制约。

1. “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中的价值取向

“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的理论基础是言论自由理论和权力制衡理论。这两个基础理论都强调公民权利的重要性,认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将导致腐败,并侵害到个人权利的实现。

中国学者在使用“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时,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舆论监督对于司法公正来说是必要的。这一观点事实上就包含了两种基本的价值取向,其一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其二是对需要制约国家公权力的认同。孙旭培、贺卫方、李尚公等学者的相关论述都体现出了上述的价值取向。前文对此已有详细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2. 社会冲突论的价值取向

防止权力滥用,强调公民私权利的重要性,是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的价值取向。而在西方社会冲突论当中,公民的私权利同样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达伦多夫反对马克思所提出的一切冲突都是阶级冲突的观点,但他同样认为社会意味着统治,统治就意味着不平等。社会冲突的来源正是不平等,公民争取应得权利和供给权利的行动导致了社会的变革。公民的基本权力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可靠的适用法律裁定程序。他提出:“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人人都服从法律。法限制着权力及其载体,法同时为所有暂时或长久处于少数地位的人提供保护。”^①在对国际冲突问题的论述中,达伦多夫还批评了美国在里根时代所持的外交政策,认为其选择了霍布斯哲学放弃了康德哲学,“权力意识”而非“公民意识”主宰了当时美国的外交心理。

在米尔斯和科塞的著作中,同样能够看到对公民权利的关照和对权力体系需要得到制衡的论述。米尔斯的代表性观点来自他对美国白领阶层和权力精英阶层的分析,他认为所谓的白领阶层在美国不仅缺少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也缺少参加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力,而精英阶层即由公司巨头、政治管理者和军阀组成的权力集团,已经改变了美国在杰斐逊时代权力制衡的理想局面。科塞对社会冲突的研究重点在于其对社会发展的功能,相对米尔斯他并没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但是科塞却十分重视社会中的权力制衡问题。他认为冲突可以发挥重新分配和调节权力资源的社会功能。科塞对一些结构功能主义学者不无嘲讽,认为他们的听众早已不再是社会的改革家,而是维护稳定的权力拥有者。科塞

^① 达伦多夫(又译达伦多夫). 现代社会冲突[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53.

还引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可以通过阶级斗争获得合法权利的观点来论证社会冲突的正功能。

四、作为新解释框架的社会冲突理论

“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为我们确立什么才是理想的舆论和司法关系提供了理论工具,但是它不能完全解释中国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生成和发展规律,而在这一点上,社会冲突理论可以作为补充性的解释工具。

1. 社会冲突理论提供观察舆论和司法关系的新视角

重新重视社会冲突研究,是西方世界在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之后的反思,这决定了社会冲突理论对社会的关注视角和关注重点都与其他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冲突理论希望从冲突的角度来认知社会、解释社会,强调社会冲突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避免的社会现象。

因此,将社会冲突理论引入“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借鉴社会冲突理论认知社会、解释社会的视角,将社会冲突作为研究舆论和司法关系的重要语境,不忽略社会冲突对舆论和司法关系的影响。

从社会冲突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站在新的视角,看到除行政因素之外的冲突因素对当前舆论和司法关系的影响,从而使相关研究更为丰富和立体。

2 社会冲突理论对理想的舆论和司法关系的解释作用

社会冲突理论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强调了社会冲突对于社会进步的正功能。比如科塞就认为,冲突“创立和修改了那些对于重新调节相互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公共规范”;同时,“它使相对权力的再估价成为可能,这样它作为一个平衡机制而服务于社会,有助于社会的维持和巩固。”^①国内学者在进行社会冲突问题研究时,也认为中国需要重新认识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比如于建嵘在《抗争性政治》一书中写到“因为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主流的话语体系往往将社会冲突视为社会的‘病态’,并在‘注意政治影响’的名义下将中国社会经常发生的各种抗争活动掩盖起来,将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和表现。这种做法忽视了社会冲突的积极功能。”^②

社会冲突理论的这一观点,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理想的舆论和司法关系是一种“权利-权力制衡”的关系。从社会冲突论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辨

① 科塞. 社会冲突的功能[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123.

② 于建嵘. 抗争性政治[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35.

证地看待舆论和司法间的冲突,不把舆论对司法的干预意愿看做对社会稳定的危害,而是看做舆论和司法关系需要修复和完善的提示音。在辩证看待舆论和司法存在冲突的基础上,我们就能进一步了解“权利-权力制衡”对于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性。

3 社会冲突理论对于法官舆论态度的解释作用

社会冲突理论为我们在社会冲突语境下探讨法官的舆论态度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首先,社会冲突理论为我们寻找有哪些因素影响到了法官的舆论态度提供了思路,比如社会冲突的客观存在是否影响到了法官应对舆论的思路。

其次,社会冲突理论为我们向法官提供相关建议提供了思路。比如,法官应持何种舆论态度才有助于社会冲突发挥出正功能?回答了这一问题,也就能够为法官如何应对舆论提供相应的建议了。

社会冲突理论站在冲突的角度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我们在社会冲突语境下分析法官舆论态度的有力工具。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学界有关舆论和司法关系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较为成熟的“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在这一范式基础上引入社会冲突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生成发展规律,为探讨法官对敏感案件的态度提供新的理论工具。

1.1 本章小结

舆论和司法关系研究经过了多年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在言论自由、权力制衡等理论的基础上,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权利-权力制衡”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以“舆论监督司法具有合法性”为理论前提,以改善舆论与司法的紧张关系为学术理想,它强调公民的监督权利,带有价值理性的色彩,其内在判断是舆论虽然需要适当限制以维护司法独立,但舆论监督对于限制公权力的扩张却是必不可少的。

“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将舆论与司法的关系置于广阔的社会结构背景下进行考查,这使得采纳这一研究范式的学者能够拥有高层建筑的研究视野。学者们的追问不再是简单的舆论监督是否敢于了司法独立,而是“权利-权力制衡”结构为什么在现实社会的诸多案例中难以成型。

“权利-权力制衡”研究范式解决了有关什么才是理想的舆论和司法关系问题,即“应然”的问题。但法官研究的缺乏,使这一研究范式并没有完全解决“实

然”的问题,即当下的舆论和司法关系究竟是何种状态的问题,以及有哪些因素影响到了目前的舆论和司法关系问题。

舆论和司法关系研究想要走向深入,想要在法官研究等新的领域内发展,就必须引入新的理论基础。社会冲突理论,是一个能够帮助“权利 权力制衡”研究范式进行自我更新的理论。这一理论与“权利 权力制衡”研究范式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时还能够为解释当前的舆论和司法关系提供新的工具。

社会冲突理论从冲突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并辩证地看待冲突对于社会的功能。这一理论强调社会冲突并非洪水猛兽,相反它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正功能。这样的观点提示我们舆论和司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一定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相反可能是促进社会寻找改革方向的动力,将社会冲突理论引入舆论与司法关系研究不仅具有可行性,也具有现实意义。



法官对敏感案件 舆论成因的认知

这一章希望回答的现实问题是法官能否觉察到当前严峻的社会冲突问题是导致舆论关注敏感案件的重要原因。回答这一现实问题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分析社会冲突的客观存在是否已经影响到了法官对舆论成因的认知,亦即社会冲突是否成为了影响舆论和司法关系的因素。

敏感案件的特殊性不在于它是疑案或难案,而在于当事双方分属不同的社会群体。敏感案件的当事人,如张金柱案中的张金柱、杭州飙车案中的胡斌在公众看来一个是“官”,一个是“富”。为官者的张金柱肇事逃逸,为富者的胡斌超速行驶,这在公众看来都是对“草根”群体生命权的漠视行为。干部群体占有权力,富裕群体占有资本,在公众看来他们完全有可能利用权力或金钱来寻租并逃避法律责任,导致司法对“草根”群体的不公。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法官对以上现象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多数法官觉察到社会冲突对舆论关注敏感案件的影响。多数法官认为舆论关注敏感案件其显在目的是监督司法防止司法不公,而潜在目的则是支持弱势群体的权利诉求,表达对强势群体侵害弱势群体权利这一社会现象的强烈不满。

第一节 法官的媒体使用行为

要测量法官对敏感案件中舆论监督问题的态度,首先需要证明的是法官使用媒体,并关注网民和媒体对相关司法案件的讨论。

一、法官有使用媒体关注舆论的行为习惯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选择的调查员自身是法官,他们向被调查法官详细解释了问卷中的各种概念,其中包括舆论、舆论监督、媒体报道、网民言论等,因此被调查法官中表示偶尔使用或不使用媒体了解案件新闻的很少,我们可以从表1中看到具体情况。

没有一个法官表示从不关心敏感案件的舆论,大多数被调查法官都表示经常使用媒体了解案件新闻,经常使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媒体的被调查法官人数分别为61位、282位、257位和291位。尽管法官对“经常使用”这一概念各有

表1 表示偶尔使用或不使用媒体了解案件新闻的法官比例

	频 数	有效百分比/(%)
电视	21	4.9
报刊	23	5.6
网络	32	8.5

不同的标准,但通过横向比较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网络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电视和报刊,成为最多法官经常接触的媒体。使用网络了解案件新闻的法官占被调查法官总数的有效比例为79.9%,高出电视的77.1%和报刊的66.8%,并远远超出了广播的18.9%。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尽管法官更经常使用网络,但法官却更多地关注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而非网民对司法案件的讨论。有60.1%的被调查法官表示非常或比较关注网民对司法案件的讨论,70.9%的被调查法官表示非常或比较关注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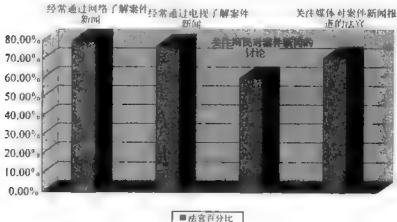


图1 法官媒体使用行为分析

总体而言,没有一个法官表示从不关心敏感案件的舆论,法官关注与司法案件相关的新闻和讨论,他们并不是“闭门判案”对社情民意毫无感知的绝缘体。但这种关注本身是否会影响法官在未决刑事案件中的定罪量刑仍然是未知的。

二、法官有“爱关注、不爱发言”的网络使用习惯

法官经常使用网络,却较少使用网络对外传播信息。表示在网络论坛或新闻跟帖中很频繁或比较频繁发帖的被调查法官仅有 20 位,占法官总数的有效比例仅为 5.4%,有效比例仅为 20.3%的法官表示有自己的网络博客。相对而言,法官乐于通过网络或其他传统媒体了解信息,但却很少发表观点,这可能与法官的职业素养相关。表示自己从不发表网络评论的被调查法官比例为 38.2%,另有 40.1%的法官(都为有效比例,以下我们中的百分比若无注明,也都为有效比例)表示仅仅在网上偶尔发表评论。

司法公开是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改革的方向之一,但本次调查发现,法官与网民公开对话或接受媒体采访的场合并不多见。从不参与和网民公开对话的被调查法官比例为 44%,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被调查法官比例为 48.1%;较少参与公开对话的被调查法官比例为 39.3%,较少接受媒体采访的被调查法官比例为 38.6%。

这样看来接近 90%的法官网络曝光率和传统媒体曝光率都是较低的,而他们接受采访或参与网络公开讨论的内容又不一定和敏感案件相关。因此,可以认为法官群体不太可能在有关敏感案件的问题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

三、如何理解法官对舆论“多关注、少参与”的行为习惯

1. 什么是法官对舆论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我们认为法官对网民言论和媒体报道的关注度可以合并理解为对舆论的关注度,为了更为直观地表现这一新的变量,我们首先将法官针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分别赋予分值,按非常关注到从不关注从高到低赋予 5 至 1 分;然后通过加总,我们将“法官关注网民对司法案件的讨论”与“法官关注新闻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和评论”两个变量加总成为“法官对舆论的关注度”,通过 SPSS 计算,“法官对舆论关注度”的均值得分即 Mean 值为 6.2,这一分值高出平均分 1.2 分。

同理,我们认为“法官参与网络公开对话和讨论”与“法官接受媒体采访”可以合并理解为法官对舆论的参与度。我们同样对法官的答案“机会很多”到“从不参与”,按从高到低的顺序分别赋予 5 至 1 分的分值。通过加总和 SPSS 计算,“法官对舆论的参与度”均值得分为 3.4 分,低于平均分 1.6 分。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认为被调查法官关注围绕司法问题形成的社会舆论,但对参与舆论也就是发表意见却持非常审慎的态度(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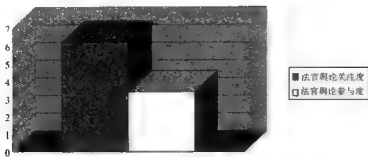


图2 法官的舆论关注度和舆论参与度均值得分比较

2. 法官对舆论“多关注、少参与”的原因探析

法官这种参与舆论的审慎态度,与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颁布的《法官行为规范》颇为吻合。该规定第八十四条指出法官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必须经组织安排或者批准;法官在接受采访时,不发表有损司法公正的言论,不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和有关当事人进行评论,不披露在工作中获得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及其他非公开信息^①。通过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法官所处的法院级别对法官是否接受媒体采访并不构成影响,两个变量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这说明无论是基层人民法院还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们一样遵守在组织安排下接受采访的规定。《法官行为规范》并没有直接涉及法官如何使用网络媒介的条款,本问卷设计的两个问题即“法官是否频繁在网络论坛或新闻跟帖上发表评论”和“法官是否有自己的博客”都没有针对敏感案件甚至司法工作进行提问,但很显然法官对无关案件问题甚至无关整体司法工作问题的新闻都不会轻易表态,对披露信息包括无关案件问题和整体司法工作问题的信息都颇为审慎,更不用说涉及敏感问题的敏感案件信息。

曾有新闻媒体报道,法官是“8小时之外行为”都受约束的群体^②,除了被要求与媒体审慎接触之外,法官与其他社会组织、团体的接触也受到约束。事实上,学界对法官的调查研究难以从《法官行为规范》中找到一定原因,该规定第八十一条是针对法官参与社会组织活动作出的,该条款要求法官对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中介机构等的邀请应当谢绝;对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党、政、军机关、学术团体、群众组织的邀请,经向单位请示获准后

① 法官行为规范[N].人民法院报,2010-12-16(1).

② 刘可.法官8小时以外活动受约束[N].北京日报,2010-12-16(7).

方可参加。本次调查是经由法院组织路径进行的,通过单位统一抽样的方式确定最后的被调查法官样本。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出现了统一填写问卷的法院与法官。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要求法官群体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方面说明司法体系正努力免于权力寻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提示法官群体确实有被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在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而法官在组织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参与和案件无关的舆论表达甚至学术活动,则更进一步说明在中国法官的言行受到公权力的高度重视,法官在舆论表达上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因此可以被证明更偏向职业层面而不是生活层面。法官对舆论表达的审慎态度其实也表明法官对舆论的重视。6.2的高均值得分提示法官群体观察社会以及思考舆论与司法关系的主动性。“多观察而少表达”,法官的角色不是漠不关心的社会旁观者,而是即将对社会行为包括社会舆论做出评价行为的裁判者。

这样的画面似乎能更好地诠释我们观点,一位法官下班回家打开浏览器。他忽然看到一句“恨爹不成刚”,喝了一口茶他正准备在帖子上留言“围观”,但却突然停住了敲击键盘的手指,因为他陡然想起他是法官,无论在法院还是在家里。他搜索了相关案情,在心中默默思考:如果换作在我们法院审判而审判长是我,会作出这样的判决么?

第二节 法官对网民讨论敏感案件原因的认知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多数法官都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冲突问题比较尖锐,涉及社会冲突的案件要比一般司法案件更容易引起网民关注。同时,多数法官还认为网民会出于支持弱势群体的心理动因来参与对敏感案件的讨论。

一、法官眼中的社会冲突、敏感案件和网民

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是自发无组织的,为什么有海量的网民关注一宗与自己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案件?为什么大部分网民的观点会趋向一致,形成法官不得不关注的舆论?在法官看来,这与中国社会目前群体分化和冲突问题日益凸显相关甚密。在当今社会,以身份、资本、地位等带来的社会分层现象客观存在,而底层公众普遍把群体利益差异如贫富差距等归因于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和为富不仁。“官——富——法”常常被视为权力和资本的占有者,同时也构成腐败丛生的利益链条,公众对干部群体、富裕群体以及其他强势群体的不满,常通过上访、静坐甚至较为激烈的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敏感案件之特

殊,就在于当事双方分属不同社会群体,公众关注敏感案件,希望通过舆论监督司法审判,正是群体矛盾长期存在,公众对权力腐败现象强烈不满的表现。

1. 法官认为网民关注敏感案件与社会冲突有关

法官对社情民意有较为清醒的理解。调查结果显示,法官群体能够认识到中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群体分化以及随之带来的群体对立和冲突是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最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原因。

我们设计的问题是,您认为以下类型案件是否容易引起网民讨论。案件类型包括:涉及干群冲突的敏感案件、涉及贫富群体冲突的敏感案件、涉及其他强弱弱势群体冲突的敏感案件。法官对这三个问题的填答率很高,分别为99.5%、98.2%和100%。其中大多数法官都认为此三类敏感案件非常容易或比较容易成为网民讨论的对象,其有效比例分别为80.2%、71.4%和78.5%;而认为这三类案件不太容易或很不容易成为网民讨论对象的法官有效比例仅为2.6%、4.8%和3.4%。

我们为这一组问题设计了对照组问题,案件类型主要包括一般民事案件和一般刑事案件,法官对这两个问题的填答率相对略低,分别为95.8%和95.0%。认为这两类法官非常容易或比较容易成为网民讨论对象的法官有效比例为46.3%和42.8%,远低于涉及社会群体矛盾案件的被调查法官有效比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更多的被调查法官认为涉及干群冲突、贫富群体冲突和其他强弱弱势群体的案件比一般刑事和民事案件更容易引发网民的讨论。这不仅说明了法官群体肯定社会群体冲突是敏感案件网民言论的主要成因,更说明法官对当前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清醒认知。

2. 法官对社会冲突尖锐性的认知

从本次调查的法官样本看来,法官群体对社会群体冲突中的干群冲突更为敏感,最多人数的法官认为涉及干群冲突的案件最容易引发网民讨论,这一观点与很多学者的结论是不谋而合的,比如有学者曾明确地提出“干群冲突普遍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且在—些敏感问题上显示出局部激化的现象。”^①

而国家领导人有关“干部需要树立正确权力观”的讲话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中国干部滥用权力现象已经得到了高层的高度关注。干群冲突较贫富群体

^① 邓春梅,丁林:《中国干群冲突的类别、发展趋势及缓解机制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4。

冲突和其他强弱弱势群体矛盾更容易引起法官的重视,这一点通过均值比较也可以得到证明,“涉及干群冲突的敏感案件是否容易引发网民讨论”一题的均值得分(Mean 值)为 4.19,而“涉及贫富群体冲突的敏感案件”一题和“涉及其他强弱弱势群体冲突”一题的均值得分分别为 3.99 和 4.08(见表 2)。

表 2 涉及社会冲突的敏感案件是否容易引发网民讨论

	涉及干群冲突 的敏感案件	涉及贫富冲突的 敏感案件	涉及其他强弱弱势群体 冲突的敏感案件
N	379	374	381
Minimum	1	1	1
Maximum	5	5	5
Mean	4.19	3.99	4.08
Std. Deviation	.889	.931	.908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法官的舆论关注度与以上三个问题均有相关关系,肯德尔系数值分别为 0.268、0.277、0.285,这可以反映法官关注舆论加强了其对社会矛盾客观存在的认知。事实上,在引发网民广泛讨论的敏感案件中,民意对干部群体、富裕群体的不满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如在杭州飙车案中,网民对肇事者母亲的人肉搜索结果是某企业主、杭州市“政协委员”,在网民看来,政协委员的身份会帮助肇事者进行权力寻租、逃避法律责任。而所谓的政协委员身份在网民看来也是肇事者母亲利用钱权交易交换来的结果,肇事者本人也被贴上“富二代”的标签,其日常品行皆饱受舆论质疑。这里不讨论人肉搜索行为本身的是非对错,我们关注的是人肉搜索背后网民对“权力寻租”、“司法腐败”现象的严重不满。

在更多法官看来涉及其他强弱弱势群体冲突的案件比涉及贫富群体冲突的案件更容易引发网民讨论。而在现实世界中,一些敏感案件体现出的社会冲突的确较为复杂,很难简单地用贫富群体冲突来概括。如三鹿奶粉案件^①,尽管众多

① “三鹿奶粉案件”。2008年7月甘肃省发现多名婴儿同患肾结石,医院怀疑与奶粉质量有关。后经媒体报道,三鹿奶业被曝光在奶粉中掺入过多三聚氰胺导致多名婴儿患病,数名婴儿死亡。2008年12月31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田文华等4名原三鹿集团高级管理人员被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2009年1月22日,三鹿系列刑事案件,分别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九级县人民法院等4个基层法院一审宣判。田文华被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468.7411万元。

研究者包括媒体报道都习惯将三鹿奶粉案称为三鹿奶粉事件,但从法律角度看这的确是一例典型的敏感案件。这一事件得以成为案件,并最终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了各方冲突,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媒体和网民对“结石宝宝”的持续关注。当多数媒体出于各种理由隐瞒奶粉厂家名称的时候,《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首次曝光是三鹿奶粉导致了众多肾结石宝宝的出现。三鹿奶业的负责人由此曝光并最终进入司法程序,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成为公诉对象。这是一起经由媒体报道和网民讨论发现、追踪,并最终成为案件的公共事件,其中包含了极为复杂的社会群体矛盾。三鹿奶粉的官方背景是舆论关注的新闻要素,三鹿奶粉负责人的家产也多为网民讨论,但这并不说明这起案件凸显的矛盾是干群冲突或贫富群体冲突。在中国,企业与消费者在很多时候都处于权利博弈的状态,企业掌握生产资料和完整的商品信息,消费者则只能被动接受企业提供的产品。竞争市场是防止商业腐败的方法,但是当某个行业整体陷入腐败行径的时候,消费者就会完全处于弱势状态。三鹿奶粉案件,较多地体现出消费社会中作为强势的生产者一方与作为弱势的消费者一方的冲突。因此,将这一案件归属为涉及其他强弱势群体冲突的案件似乎更为恰切。

法官认为中国社会群体矛盾客观存在,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认知这种冲突问题的尖锐程度呢?问卷通过考察法官对司法审判社会效果的重视程度,直接用“您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冲突问题是否突出”这样的问题测量法官对社会冲突问题尖锐程度的认知,问题的答案选择取值为“突出”和“不太突出”两项。SPSS 计算发现,共有 377 名法官回答了这一问题,其中 76.1% 的法官即 287 位法官选择了“突出”这一答案,而剩余的 90 名法官则选择“不太突出”这一答案。综上,大多数被调查法官不仅认为社会冲突客观存在,对社会冲突的复杂性和尖锐程度也有相应的认知。

二、法官对网民讨论敏感案件心理动因的认知

权力寻租、司法腐败、权钱交易等问题的客观存在,使中国的群体利益分布出现“马太效应”。权力、资本、地位等资源都一再向干部群体、富裕群体以及其他强势群体集中,普通公众的应得利益受损,而其社会不公感也日渐加深。这是社会群体分化带来的最主要问题,也是群体矛盾产生的根源。

与公众社会不公感日渐加深同时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公民权利意识逐步提升。以拆迁为例,普通公众开始自觉维护合法的私有房产,反对强制拆迁,而媒

体也不再以“钉子户”这样的外号来称呼不配合强拆的普通公众。在司法方面,“使民无讼”一直是中国封建时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为了追求无讼的“治境”,历代统治者都向人们灌输贱讼的价值取向,把敢于诉讼的人说成是刁民,把帮助别人打官司的人斥为“讼棍”。这种“轻民权”的思想,在当今已被法治思想所取代。公众乐于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公众也开始运用舆论监督等方法促进司法公正,防止权力寻租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侵害。因此,一旦当事双方分属不同群体,公众就会自发履行监督司法的职责,以防司法不公的出现。

对以上现象,多数被调查法官表示能够理解,并认为社会不公感和权利意识提升是促动网民讨论敏感案件的心理动因。

1. 法官对网民社会不公感的认知

多数法官认为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是因为他们怀有社会不公感。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促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也日渐凸显。房价上涨、通货膨胀等客观因素导致贫富差距加大;而权力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导致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丛生。普通公众不仅面临着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的巨大压力,还时常感受到某些强势人群对自身公民权乃至生命权的轻视。“我爸是李刚案”,“林嘉祥猥亵幼女案”^①等都是因为当事人对弱势群体出言不逊,才引起公众强烈不满。“有本事你们去告去,我爸是李刚”,2010年10月李启铭在驾车撞到两名大学生并导致一死一伤的结果之后这样对受害者说。随后“我爸是李刚”变成网络流行语,李刚这位河北保定市公安局副局长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向公众公开道歉。在对此案进行评论时,网友写道:“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现象,官二代、富二代为何会如此嚣张?那天堂的少女,掉进地狱里的父母亲,他们要怎么才能活得下去。道歉和钞票,弥补不了破碎的心,病态的心理,是否还会蔓延盛行?”^②

对公众强烈的社会不公感,多数被调查法官有清醒的认知。64.8%的被调查法官亮明观点认为网民之所以讨论敏感案件是因为不公平感的存在,而仅仅

① 林嘉祥猥亵幼女案。林嘉祥,原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纪检组长。2008年10月29日,林嘉祥在深圳南山区新梅园海鲜大酒楼酒醉,强迫一小女孩带其至洗手间,小女孩被吓挣脱。网传林与小女孩父母争吵时,曾出言不逊,称“我拍了小女孩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后公安部门公布,林并未对小女孩进行猥亵。最终,林被免除党内外一切职务。

② 参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4534118.htm>。

只有11.5%的法官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不公平感促使人们在网络上探讨敏感案件”。从这一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法官意识到中国群体分化带来的社会效应,还可以看出法官对网民这一概念的理解,即网民是普通民众而非“强势群体”,网民讨论敏感案件不是因为案件本身有趣好玩,而是因为网民对案件中涉及的社会不公问题有话要说。

2. 法官对网民维护正义的伦理倾向的认知

不到半数的法官认为网民会出于维护正义的目的去讨论敏感案件。

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是否因为他们有维护正义的伦理取向?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明确表示肯定的法官不占绝大多数,为46.9%,但从均值得分3.38上看,法官对“多数网民讨论案件是因为有维护正义的取向”的陈述是持肯定态度的,只是这一态度并不十分突出。我们看到对这一陈述持反对意见的法官人数并不多,只占有效比例的18.4%。使该陈述均值得分高于平均分的选择了“说不清”的132位法官,他们占被调查法官人数的34.7%。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陈述来自学者和官方对舆论监督司法问题的分析综述。2000年代初,围绕一些热点案件,学者们开始讨论舆论监督和司法审判如何统一的问题,司法和舆论统一于公平正义是不少学者的观点。同时最高司法机关负责人也发表观点认为法律和舆论一样,是“弘扬社会公平正义的两大武器”^①。

“正义”一词源自古希腊哲学,罗马法时代理性正义论得到发展,各得其所的分配正义原则得到肯定。探讨过“正义”一词的学者甚众,巨星云集,从梭伦、亚里士多德到斯宾诺莎等等,都对“正义”进行过诠释。虽然他们观点各异,但对于正义“各得其所”的分配原则都没有加以否定。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史上影响重大。罗尔斯认为,现代社会的正义观应包含两大原则:“其一,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其二,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这样安排,使它们:首先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其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②

相对“公平”而言,正义更具概念上的争议性,也更具有法律上的专业性。

① 法律舆论监督携手,弘扬社会公平正义[J].文明与宣传,2003(2).

② 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92.

100多位被调查法官对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是否因为追求正义持“说不清”的态度。这可能源于他们对网民对正义概念是否能完全理解的怀疑,如果一位法官不能肯定网民是否真正理解正义概念,他也就无从判断网民是否出于追求正义的目标来讨论敏感案件。

3. 法官对网民参与政治意识和监督司法意识的认知

多数法官认为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是因为他们参与政治,主动监督司法的意识越来越强。这一陈述的均值得分为3.24,虽然接近平均分但仍然偏向肯定。法官对公民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已经留下印象,并有较清楚的认知。

与这一情况相对应的是,多数学者认为网络促进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更有学者讨论互联网能否成为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在对敏感案件的讨论中,网民表现出的公民权利意识要比一般的网络讨论更强。网民与当事双方一般都没有直接关系,从理论上说他们参与讨论或是“围观”、“打酱油”都不会直接增减自身的权益。但事实上,网民的身份认同,促使其意识到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就是对自身所处群体的支持,对敏感案件的关注,就是对权力寻租的监督。在敏感案件的网络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语:

这时讲“人和事都不能逾越法律,要依法遵法,公民人权高于一切”,根本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邓玉娇这个活生生值得人们尊重的生命,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符号”;

本人谢绝任何跨省、跨市以及本市内追捕行为,如有需要请直接联系楼主、原作者以及网站管理员或法人代表;

如果5月7日晚上被撞的行人不是谭卓,也许他会是张卓、李卓、王卓……是你,是我,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谓的休闲之都杭州不再安全,我们每次过马路买一瓶酱油也许都有生命之忧。这样的杭州,真的适宜我们居住吗?还是只适宜那些有跑车的华族们嬉戏?

对孙志刚事件的恐惧,其实就是对我们自身处境的恐惧。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学者滕彪所说:“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孙志刚,我们无法忽略这个问题。”

.....

这样的网络语境对于法官来说,是监督更是警醒。能够得到网民讨论的敏感案件,表面上看与网民无直接利益关联,但本质上却涉及一个群体的权利诉

求。“潜水”即光看帖不发言是一些网络用户的特点，“特别是当话题与政治有关时，有些人更会选择缄口不言。”^①但是在敏感案件的讨论中，网民的发言并没有太多的政治顾忌，相反其政治诉求有时会相当明确。网民的群体认同感导致了网民对表达权的珍惜。网民考虑的是，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因此，对未决司法案件的讨论事实上就是一种政治参与的过程。舆论对孙志刚案件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政治效果就是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网民围绕孙志刚案的讨论，不仅提出了对司法的要求，更提出了对微观制度层面的改革要求。哈贝马斯认为的公共领域，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公民可以通过合理讨论来树立起自己的政治意志。”^②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为敏感案件搭建起的平台，确实具有了公共领域的特征。在这个平台上，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从业人员在脱去职业外壳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的时候，其高度的政治自觉性更会带动一般网民公民意识的提升。两级传播理论认为，舆论的发展会经过两个阶段，一个是大众媒介向意见领袖传播信息的阶段，一个则是意见领袖向公众传播信息的阶段。在互联网时代，一些意见领袖已经开始了对公众的直接传播，其传播的内容除了客观的信息之外，还有带着价值判断的真正的“意见”。

这里需要得到注意的还有另外两个数据。第一，有 28.8% 的法官并不认为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是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的表现；第二，有 40.2% 的法官否认多数网民和敏感案件中的某种利益有关联。不认为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是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的表现，法官的考虑可能是司法问题不属于政治范畴；而否认多数网民和敏感案件中的某种利益有关联的法官可能并没有考虑到网民的群体认同和利益认同问题。这两点是否会影响到法官可能的司法审判工作，还需要通过更深入的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 第三节 法官对媒体报道敏感案件原因的认知

我们认为网民言论和媒体报道是不同的舆论形式，这一观点得到了被调查法官间接的认同。在法官看来，媒体是不同于网民的舆论主体，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原因与网民讨论敏感案件的原因有相同之处但也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一些法官并不认为媒体会对涉及社会冲突问题的敏感案件进行

① 胡泳：《众声喧哗》[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97。

② 于海：《公共领域的起源和演化——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J]，社会，1999(6)。

报道。

一、法官眼中的社会冲突、敏感案件和媒体

1. 法官认为媒体报道敏感案件与社会冲突有关

多数法官认为媒体报道敏感案件与社会冲突有关。

有 63.4% 的法官认为涉及干群冲突的敏感案件容易引起媒体报道,有 68.6% 的法官认为涉及贫富群体冲突的敏感案件容易引起媒体报道,有 69.7% 的法官认为涉及其他强弱弱势群体矛盾的敏感案件比较容易甚至非常容易获得媒体报道。这一组数据说明,法官中的多数认为媒体乐于报道涉及社会冲突的敏感案件。

2. 法官认为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更为审慎

认为媒体乐于报道敏感案件的法官,明显少于认为网民乐于讨论敏感案件的。认为涉及干群冲突、贫富群体冲突、其他强弱弱势群体冲突非常容易或比较容易引起网民讨论的法官比例分别为 80.2%、71.4% 和 78.5%。

这说明在一些法官的眼中,媒体对报道敏感案件要比网民审慎。这一点,通过均值比较也可以得到验证。涉及干群冲突的敏感案件是否容易引起网民讨论一题的均值得分为 4.07,而涉及干群冲突是否容易引起媒体报道的均值得分为 3.58。涉及贫富冲突的敏感案件,网民得分为 3.99,媒体得分为 3.71,涉及其他强弱弱势群体矛盾的敏感案件,网民得分为 4.07,媒体得分为 3.72。可以看到均值相差最大的是涉及干群冲突的敏感案件,在部分被试法官看来,媒体对涉及干群冲突的敏感案件是持审慎态度的。从交互分析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存在,认为涉及干群冲突的敏感案件非常容易获得媒体报道的 71 名法官中,没有人否认这类案件也容易引起网民讨论。而认为涉及干群冲突的敏感案件非常容易获得网民讨论的 156 名法官中则有 34 名法官认为此类案件不太容易甚至很不容易获得传统媒体报道。

3 法官认为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更为审慎的原因探析

法官对媒体官方背景的认知,可能会导致他们认为媒体报道更审慎。

我们回头审视 63.4%、68.6%、69.7% 这三个数据,就会发现它们存在逐渐递增的特点。认为干群冲突会引发媒体报道的法官要少于认为贫富群体冲突和其他强弱弱势群体冲突会引发媒体报道的法官。干群冲突较贫富群体冲突和其他强弱群体冲突是中国社会更为敏感的社会冲突形态,媒体是否会如网民一样轻易参与讨论,显然引起了一些被调查法官们进行思考。中国的媒体形态极为复

杂,市场化运作、集团化管理、种类齐全、特点各异……但最重要的是作为法人的媒体组织需要接受党和行政的双重管理。可能正是这一点使得一些法官认为媒体报道与网民言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这些法官就可能不会认为网民言论会影响媒体报道。通过以下这组交互分析和相关系数分析,可以看到这个判断得到了验证。

表 3(1) 媒体报道干群冲突案件与网民影响媒体报道的交互分析

		涉及干群冲突的敏感案件容易引起媒体报道					总数
		很不容易	不太容易	说不清	比较容易	非常容易	
网民关注导致媒体报道敏感案件	很不同意		100.0%				100.0%
	不太同意	8.7%	56.5%	17.4%	13.0%	4.3%	100.0%
	说不清		18.4%	31.6%	44.7%	5.3%	100.0%
	比较同意	2.3%	14.8%	16.7%	52.3%	13.9%	100.0%
	非常同意	4.1%	19.4%	3.1%	28.6%	44.9%	100.0%

$$N = 376, X^2 = 99.069, df = 16, p = 0.000$$

从表 3(1)中可以看出很不同意网民讨论会带动媒体报道的法官 100% 认为涉及干群冲突的敏感案件不太容易获得媒体报道,而不太同意网民讨论会带动媒体报道的法官中亦有 65.2% 认为涉及干群冲突的报道很不容易或不太容易获得媒体报道。这部分法官对媒体背景的认知应该是偏官方,而非偏民间的。

表 3(2) 媒体报道干群冲突案件与媒体报道倾向性的交互分析

		涉及干群冲突的敏感案件容易引起媒体报道					总数
		很不容易	不太容易	说不清	比较容易	非常容易	
互联网出现后媒体的批评报道增多	很不同意	66.7%				33.3%	100.0%
	不太同意	6.9%	34.5%	13.8%	37.9%	6.9%	100.0%
	说不清	2.4%	25.3%	26.5%	33.7%	12.0%	100.0%
	比较同意	1.5%	14.6%	13.1%	53.8%	17.1%	100.0%
	非常同意	3.4%	20.3%	3.4%	23.7%	49.2%	100.0%

$$N = 373, X^2 = 110.616, df = 16, p = 0.000$$

表 3(2)说明那些认为互联网出现后媒体的批评报道增多的法官也会倾向认为涉及干群冲突的案件容易引发媒体报道,换句话说对媒体的民间性质持肯

定态度的法官会倾向于认为涉及干群冲突的案件容易引发媒体报道。这与表3(1)形成了相互印证的关系。

表 3(3) 媒体报道干群冲突案件和媒体报道迎合受众特性的交互分析

		涉及干群冲突的敏感案件					总数
		很不容易	不太容易	说不清	比较容易	非常容易	
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是为了迎合受众炒作新闻	很不同意	27.3%	36.4%	9.1%	18.2%	9.1%	100.0%
	不同意	5.0%	5.0%	35.0%	55.0%		100.0%
	不太同意	3.4%	22.5%	18.0%	46.1%	10.1%	100.0%
	比较同意	1.0%	18.8%	13.1%	41.4%	25.7%	100.0%
	非常同意	3.2%	17.5%	9.5%	39.7%	30.2%	100.0%

$$N = 374, X^2 = 54.455, df = 16, p = 0.000$$

表3(3)同样显示,那些认为媒体报道会迎合受众的法官会倾向于认为媒体容易报道受众感兴趣的干群冲突问题。通过以上一组交互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认为媒体报道干群冲突问题更审慎的法官,一般都会对媒体的官方背景更为敏感。所以我们在看到法官对媒体民间性认可的同时,也要看到法官对媒体官办的认知仍然存在。媒体为什么会去报道涉及社会冲突的案件,在这些法官看来也并非是因为媒体和网民一样对社会不公强烈不满。

二、法官对媒体报道敏感案件具体动机的认知

前文已经分析,在大多数法官眼中,网民和媒体是两个不同的舆论主体。有一些法官认为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是因为公众对社会冲突的关心,媒体和公众在观点上具有一致性,媒体报道和公众言论一起构成对司法的舆论监督,而这种监督主要是批评性的。但我们同时看到也有部分法官对媒体的官方背景相当敏感,他们并不认为媒体会和网民一样关注最为敏感的干群冲突问题。那么在多数法官看来,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具体动机究竟是什么呢?

1. 法官对媒体引导舆论动机的认知

不到半数的法官认为媒体是因为引导舆论的动机才去报道敏感案件。

具体频数分布如表4所示。

表4 法官对媒体引导舆论动机的认知

正确引导舆论是否媒体 报道敏感案件重要原因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非常重要	48	12.6	12.7
	重要	140	36.7	37.0
	不太重要	132	34.6	34.9
	不重要	27	7.1	7.1
	不是原因	31	8.1	8.2
	有效样本	378	99.2	100.0

有49.7%的法官认为正确引导舆论是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重要原因,其中认为是非常重要原因的法官有48位。这是一个接近半数但未超过半数的值,大多数法官并不认为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是为了正确引导舆论。但是这个接近半数的值提示,法官群体对媒体的官方背景仍然有着深刻的认知,对“正确引导舆论”这样的官方媒体应当承担起的政治责任同样有着清楚的认知。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出的思想,“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媒体是宣传事业的重要渠道,对于媒体而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成为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重要的政治任务。可以说,正确引导舆论和舆论监督一样都是中国特有的名词,相对舆论监督,正确引导舆论更强调媒体与民意的差异性。在舆论监督的语境下,媒体和民意都是监督的主体,其面对的共同客体是公权力体系及其工作人员。而在舆论引导的语境下,媒体则和公权力站到一起,成为引导的主体,其共同面对的客体是民意。

根据陈力丹的总结,舆论引导主要包括7点内容,其中与民意直接相关的是:“要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群众正确理解这些方针政策”和“舆论中如果出现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地方,各媒体要做好引导工作,将舆论引导到党的精神的轨道上来”。^[1]在大多数法官认为媒体会迎合受众的情况下,仍然有接近半数的法官认为媒体有引导舆论的主动性,这说明存在部分法官意识到媒

[1] 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93。

体报道敏感案件的观点并不等同于民意,某些时候媒体报道即便和民意观点致也是为了更好地引导舆论,而不是纯粹地“迎合受众”。从相关性分析,“迎合受众是否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重要原因”与“正确引导舆论是否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重要原因”呈弱的负相关关系,肯德尔系数值为-0.127,这也就是说那些认为媒体会迎合受众的法官,一般不会认为媒体会出于引导舆论的目的来报道敏感案件。

2. 法官对媒体追求新闻价值动机的认知

大多数法官认为案件本身有新闻价值是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重要原因,如表5所示。

表5 法官对媒体追求新闻价值动机的认知

新闻价值是否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原因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态度	非常重要	90	23.6	23.7
	重要	219	57.5	57.6
	不太重要	48	12.6	12.6
	不重要	12	3.1	3.2
	不是原因	11	2.9	2.9
	有效样本	380	99.7	100.0

在中国“新闻价值”这一概念是由徐宝璜、邵飘萍等著名媒体人从西方引入的。1918年,他们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各自讲述了新闻价值问题。从30年代起,这一概念在中国新闻界得到普遍应用。1957年,新闻价值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遭到批判。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新闻界重新讨论新闻价值问题;并确认按新闻价值来选择新闻事实是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学界一般认为,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满足社会需求的素质的总和,越能满足社会需求的事实其新闻价值就越高。进而言之,一个客观存在或发生的事实,能否成为新闻,然后被传播,应该取决于两点:一是在多大程度上及以怎样的方式与公众的利益相关联,二是能否满足人们的感官需要。

新闻价值来源于受众需求。法官认为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是因为案件本身的新闻价值,也就是说法官能够理解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是出于满足受众需求的考

虑。当然法官对“新闻价值”概念的理解不可能如学者那样精确,为了验证法官对“新闻价值”的理解是否与受众需求相关,本文又使用了另外一个陈述来了解法官对媒体与受众关系的理解。“迎合受众、炒作新闻是否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重要原因”,有68.3%的法官认为是重要原因。需要强调的是“迎合受众”和“炒作新闻”都有一定的负面评价,但是大部分法官还是认为这是重要原因,从这一陈述的频数分布看法官对新闻价值的理解还是符合学界定义的。

3. 法官对媒体监督司法动机的认知

相对舆论引导,更多的法官更认同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是为了舆论监督,但这个多数仍未超过60%,如表6所示。

表6 法官对媒体监督司法动机的认知

监督司法是否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重要原因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非常重要	36	9.4	9.5
	重要	171	44.9	45.0
	不太重要	133	34.9	35.0
	不重要	20	5.2	5.3
	不是原因	20	5.2	5.3
有效样本		380	99.7	100.0

认为媒体有监督司法主动性的法官为54.5%,共计207位。在他们看来,媒体尽管有迎合受众的倾向,但是这种迎合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是在监督司法的主动性下的选择。而在一些法官看来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之间并不矛盾,“正确引导舆论是否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重要原因”和“监督司法是否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重要原因”这两个陈述之间体现出较强的相关性,肯德尔系数值为0.567。

4. 法官对媒体倡导社会公平动机的认知

多数法官认为媒体是出于倡导社会公平的动机去报道敏感案件的。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中国媒体人用于自勉的华语。所谓道义,通俗而言,是锄强扶弱,书面而言,就是公平、正义。与此相呼应的是,西方传媒界以“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同样强调了媒体维护社会公平的社会责任。与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两个带有政治意味的概念相比,更多的法官认同媒体是出于倡导社会公平的角度来报道敏感案件的,这是一种对媒体主动践行社会责

任的认可,如表7所示。

表7 法官对媒体“倡导社会公平”动机的认知

倡导社会公平是否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重要原因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非常重要	36	9.4	9.5
	重要	200	52.5	52.9
	不太重要	104	27.3	27.5
	不重要	18	4.7	4.8
	不是原因	20	5.2	5.3
	有效样本	378	99.2	100.0

相对法官对网民政治自觉性的怀疑,法官更为肯定媒体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法官对网民言论和媒体报道的不同评价说明了法官对舆论本身的清楚认知,这一点,是否会影响法官的具体审判工作,也需要在后面做更深入的探讨。同时,表2-7也提示法官注意到媒体对社会冲突的敏感,敏感案件中存在的强弱群体的权力-权利博弈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综上,法官对媒体报道敏感案件出发点的评价是偏向积极的,引导舆论、监督司法、倡导社会公平,分别是官方、民间和社会发展赋予媒体的责任,在法官看来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正是履行各种责任的表现,而且媒体对履行民间责任和社会发展责任的主动性为更多的法官认可。在大多数法官看来,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具体理由多种多样,但都和社会冲突相关,而且媒体的官方背景,并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媒体关注社会矛盾冲突的倾向性。

本章小结

数据分析说明,社会冲突的客观存在已经影响到了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成因的认知,大多数法官都认为舆论关注敏感案件与社会冲突有关。

在绪论中我们已经说明,以社会冲突为研究语境的第一个原因是,在社会冲突语境下舆论有着特殊的关注点,那就是司法案件在审判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干部对群众、富人对穷人以及其他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侵害;对此大多数法官都有较为清醒的认知。

法官不仅敏锐地感知到涉及干群冲突、贫富冲突的敏感案件非常容易成为

舆论关注的焦点,更进一步意识到了这些案件为什么会引起舆论关注的原因。

首先,法官认为网民会出于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维护正义、积极参与政治以及监督司法的心理动因讨论敏感案件;

其次,多数法官意识到媒体会因为监督司法、倡导社会公平以及满足受众需求的动机来报道敏感案件。

需要注意的是,有部分法官对媒体的官方背景更为敏感,这使得他们认为相对网民,媒体报道敏感案件会更为审慎。

总体而言,大多数被调查法官对司法腐败、权力寻租现象并不避讳,他们认为这些正是社会不公的重要表现。他们意识到媒体和网民希望通过讨论敏感案件,加大司法审判的透明度,从而防止干部对群众、富人对穷人以及其他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侵害。

回到本章第一节对法官媒体适用行为的分析,可以看到多数法官们严守相关规范,对舆论多关注少参与,他们能够区分舆论不同的主体和不同主体不同的话语规则及话语方式。他们的身份感极强,他们的媒体使用习惯体现出法官的职业认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接受了高等教育,学士、硕士的经历赋予他们高度法律专业素养。那么他们将给予因在社会冲突语境下追求司法公正而起的舆论何种评价?他们将如何应对因追求公平而起的舆论?下面我们将继续在社会冲突理论框架下讨论这些问题。



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主体的认知和评价

绪论中已经提到我们关注的舆论包括网民舆论和媒体舆论两类。本章所研究的舆论主体也因此包括两个,一是网民,二是媒体。法官对舆论主体的认知,指的是法官对舆论主体立场的认知;法官对舆论主体的评价,指的是法官对舆论主体综合素养和影响力的评价。

考察法官对舆论主体的认知和评价,具有两层理论意义。第一,它为进一步分析法官应对舆论的行为意向打下基础,方便我们看到法官应对舆论的行为意向与法官对舆论主体的认知和评价是否有相关关系;第二,它有助于我们继续站在社会冲突的理论视角上,分析法官是否能够觉察到社会冲突对于舆论主体立场的影响。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法官认为网民在讨论敏感案件时会带着对司法的不信任,站在当事者中属于弱势群体的一方,给出“罪与非罪”、“罚与不罚”的审判意见,同时网民立场会影响到媒体在报道敏感案件时的立场。对于网民和媒体的综合素养,法官在评价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这表现在法官对媒体综合素养的评价要高于对网民综合素养的评价。

第一节 法官对舆论主体立场的认知

多数法官认为,在敏感案件讨论中,媒体和网民在立场上基本保持了一致,这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和对司法的质疑。

一、法官对网民立场的认知

多数法官认为,在针对敏感案件的讨论中,网民总是同情涉案的弱势群体,并对司法抱有不信任感。

1. 法官对网民支持弱势群体立场的认知

有高达90.2%的被调查法官认为网民在对敏感案件的讨论中一般会同情涉案的弱势群体。在被调查法官看来,网民之所以在讨论中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因为他们将自身看做弱势群体的一员。这就是说,绝大多数法官意识到网民言论维护的是于群冲突中群众一方的权利贫富群体冲突中非富裕群体一方的

权利,其他弱势群体冲突中弱势群体一方的权利。

民意维护弱势群体的指向早在张金柱案时就已非常明确。张金柱案发生在1997年,不仅在当时影响广泛,到今天仍然是众多学者讨论的对象。2001年,针对该案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问法中原——张金柱案启示录》发表,作者的观点是张金柱罪不至死。有趣的是作者证明张金柱罪不至死的一个论据是张金柱案中的被害人之一苏东海是个抛弃妻子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的负心汉。这其中隐含的逻辑是,苏东海并不值得舆论为其叫屈;以此逻辑推导,苏东海如果是个好人,司法对张金柱的量刑才不为过。事实上,苏东海是否道德上的负心汉,与张金柱的定罪量刑毫无关联。苏东海作为公民,其享有的最基本的生命权更不能被任何人随意剥夺。张金柱案执行完毕之后,引发了一场媒体和学界对“舆论审判”的大讨论。但即便是张金柱案,做出终审判决的还是司法机关,公众舆论没有对司法机关的强制力,“舆论审判”说到底仍然是法官审判。公众对司法案件的讨论会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并自发维护其自认为“弱势”的一方,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从此次调查看来,法官们对这样的权利诉求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认知。反观现实中的案例,法官的成熟亦有表征。仅就交通肇事案而言,从张金柱案到宁马撞人案到杭州飙车案到“我爸是李刚”案,民意维护弱势群体的指向从未变化,而司法审判却似乎不断朝向理性化发展,张金柱案之后这些案件的主人公都没有再遭遇相对较重的定罪量刑。

2. 法官对网民质疑司法立场的认知

有66.6%的被调查法官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网民“一般对法官抱有不信任感”。超过半数的被调查法官认为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是因为担心司法腐败,79.4%的法官判断网民一般认为强势人群容易利用非正常手段影响司法。

值得注意的是,对网民的这一观点,法官并未予以否认,相反有73.8%的被调查法官认为某些强势人群确实会利用非正常手段影响司法审判工作。对司法腐败现象,多数被试法官认为客观存在,只有9.4%的法官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某些司法人员确实存在腐败问题”。

仍以杭州飙车案为例,在胡斌服刑入狱之后,有关胡斌有替身的说法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有网民对比了胡斌在肇事现场和在服刑期间的相片,指出受审的胡斌和服刑的胡斌并不是同一人,服刑的不是胡斌本人而是花钱找来的替身。后为澄清真相,相关各方邀请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对正在服刑的胡斌进行了采访,并公布了信息。胡斌之所以被怀疑有替身,其最深层的社会原因是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各种腐败现象的存在使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发出了质疑。通过

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法官都能客观面对司法腐败问题,并检省司法欠缺公信力的原因,这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二、法官对媒体立场的认知

多数法官认为在讨论敏感案件过程中,媒体立场和网民立场是较为一致的;同时媒体立场受到网民立场的影响,这表现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媒体对民意的支持增多,同时对司法的批评报道增多。

1. 法官对媒体支持民意立场的认知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公众的舆论监督基本都由媒体代为进行。媒体被称为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沟通工具,即所谓上下沟通的工具。而互联网出现之后,法官认为媒体承担了更多的下情上传功能,如表1所示。

表1 法官对媒体支持民意立场的认识

互联网出现后,媒体对民意的反映增多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态度	非常同意	83	21.8	21.9
	比较同意	219	57.5	57.8
	说不清	63	16.5	16.6
	不太同意	13	3.4	3.4
	很不同意	1	.3	.3
	有效样本	379	99.5	100.0

在传播学者的研究中,一个普遍的观点是网民对某一事件的持续关注容易导致传统媒介介入报道。对此,绝大多数法官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其比例是被试法官的83.5%,而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的法官只占被试法官的6.3%,持说不清观点的法官占10.3%。法官乐于直接表明观点,与该题的敏感度较低可能相关。有80%的法官认为网民会在讨论中支持媒体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报道,与此相关的是有52.6%的法官认为媒体倾向性会受到网民言论的影响,两者间的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263,这提示法官认为媒体因为网民的群体意识,会做更多的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报道。

2. 法官对媒体质疑司法立场的认知

大多数法官认为网民言论对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

是报道的量上,78.2%的被试法官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互联网出现以后,传统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增多了”;是报道的题材分布上,有68.9%的法官同意或非常同意传统媒体对法院审理过程的批评报道增多了。这两个数据表明法官对互联网出现后舆论传播方式改变的敏感度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再次证明法官倾向于认为媒体与网民言论在观点上可能会持一致性,并且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对司法的监督上,尤其是以批评形式出现的监督上。

1 ► 第二节 法官对舆论主体综合素养的评价

舆论主体的综合素养,包括传播素养和法律知识素养。舆论主体的传播素养指的是舆论主体能够传播可信、理性和客观信息的素养。舆论主体的法律知识素养指的是舆论主体具有完善的法律知识以及恰当运用法律知识的素养。这里的舆论主体仍然包括网民和媒体。

一般来说,“素养”更多地被用于个人。但我们认为在一个“泛传播”^①时代,媒体的“素养”同样需要被重视,媒体是否具有传播可信、理性和客观信息的素养,是否具有完善的法律知识以及恰当运用法律知识的素养,不仅影响着舆论和司法关系的走向,也影响着社会整体的传播生态。

一、法官对网民综合素养的评价

“乌合之众”是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对失去理性的大众群体所做的评价。在转型的中国,公众的权利意识虽然得到提升,但这并不证明公众已经具有了良好的综合素养。一些新媒体研究者曾作出判断:互联网的匿名性会导致人们对自身言论不负责任,中国网络舆论缺乏理性和建设性。对这样的观点,被调查法官并不认同。数据分析显示,法官对网民的传播素养持较高评价,大多数法官认为网民在讨论敏感案件时能够传播真实和理性的信息,让法官不放心的是网民的法律知识素养,多数法官都不认为网民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他们也不认为网民能够结合法律知识对案件的审判结果作出符合法律要求的评论。

1. 法官对网民传播素养的评价

在多数法官看来网民具有较高的传播素养,具体表现在他们认为网民传播的有关敏感案件的信息大多数是可信的,同时也是理性的。但法官对网民了解事件真相的能力却持较低的评价。

① 赵新利.泛传播视角下对传播素养的思考[J].青年记者,2013(4):7.

(1) 法官对网民传播信息可信度的较高评价

对于涉及干群冲突、贫富群体冲突和其他强弱势群体冲突的敏感案件,有超过 70% 的法官认为网民传递的信息有一半或一半以上是可信的。具体有效百分比分布如表 2 所示。

表 2 法官对网民传播信息可信度的评价(%)

		涉及干群冲突 的案件	涉及贫富冲突 的案件	涉及其他群体 冲突的案件
法官对网 民传播信 息可信度 评价的有 效百分比	都可信	.8	.8	1.0
	大部分可信	26.2	24.2	21.3
	一半对一半	47.8	48.9	48.3
	大部分不可信	24.4	25.3	28.1
	都不可信	.8	.8	1.3
	有效样本	381	380	381

(2) 法官对网民传播信息理性度的较高评价

理性是相对感性而言的,指的是人依靠经验、逻辑分析而不是感情倾向来对事物作出判断的智能。网民言论缺乏理性,往往表现在对事物不加细致的分析、使用过激的言辞、容易被人诱导等。众多研究者都发现,在匿名的情形下,网民发言容易流于非理性,使公共讨论跌入情绪的陷阱,并因为极端而显得盲目。相对而言,法官对网民理性程度的评价并不低,有 70% 以上的法官认为半数以上的网民言论是理性的(见表 3)。

表 3 法官对网民传播信息理性度的评价(%)

		涉及干群 冲突的案件	涉及贫富 冲突的案件	涉及其他群体 冲突的案件
法官对网 民传播信 息理性度 评价的有 效百分比	都理性	2.1	1.1	.8
	大部分理性	32.1	30.8	46.5
	一半对一半	39.5	45.7	72.6
	大部分不理性	25.0	21.1	25.6
	都不理性	1.3	1.3	1.8
	有效样本	380	379	380

(3) 法官对网民接近案件真相能力的较低评价

尽管多数法官认为一般情况下网民传播的信息是可信的,但这些信息是否有关案件真相的关键信息,法官是持怀疑态度的。调查显示,有 82.4% 的法官同意甚至非常同意“网民并不了解事件真相。”

多数法官认为网民发布的信息可信和理性,但同时又认为网民缺乏接近案件真相的能力,这提示我们需要注意以下 3 个问题:

第一,法官对敏感案件复杂性的认知。网民发布的信息过半可信,这是仅就网民了解的那部分案情事实而言的。但是案情错综复杂,还存在网民不可能了解的部分。就案件真相,最起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事发当时的细节,当事双方的言行,当事人的作案动机,当事人双方的社会关系、证据证人证词,还有更重要的有没有出现司法腐败问题等。敏感案件的复杂性,不仅仅是法官的认知也是网民本身的认知。从“公民记者”到“公民调查团”,公众试图用各种方法接近案件真相本身。但是司法调查本身的封闭性、专业性,往往使得公民记者抑或公民调查团无功而返。以云南晋宁躲猫猫案为例,由公共知识分子、志愿者和法律专业人士组成公民调查团就有过这样的言论:“无论是网友,还是网友调查委员会,都不可能做到探寻真相。”

第二,法官对了解事实真相的自我高评价。相对学者而言,法官对网民言论是否真实的评价显然更具说服力。法官是对案件事实了解得最为详细的人群,无论是公安机关的调查报告,抑或控辩双方的司法卷宗,包括权力寻租现象是否在具体案件中出现,这些在法官眼前都是一览无遗的。法官之所以能够对网民言论真实性以及网民是否能够了解案件真相作出评价,其前提条件是法官对了解事实真相的高度自我评价。我们无法猜测法官在对网民言论真实性作出评价时拥有的是优越感还是忧虑感,但他们对于自身是掌握事件真相者这一事实无疑是充满自信的。

第三,司法公开的紧迫性。对于网民调查事件真相无功而返的现象,有媒体评论:“从表象上看,网民代公众行使知情权之所以遭遇尴尬,是因为调查团没有相关的法律权力。无权调看录像资料,无权讯问当事人,从哪可以下手调查?”“深层次看,要治愈网民们的‘真相焦虑症’,采取网民调查团这样的形式是远远不够的。它寄望于真正从制度层面上消除那些约束真相传播的因素,一事当前,不遮不捂,借助权威声音、媒介渠道,最快最充分地向公众传递最具说服力的资讯。”^①大多数网

① 刘鹏,网民调查团来了躲猫猫真相还是未能大白[N]. 楚天都市报,2008-2-22(8).

民不了解案件真相,这是 82.4%的法官共同的理解,也是当前司法面对的最紧迫问题。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即便网民对其他案件事实给出了可信的信息,但是对法官而言基于残缺信息而形成的网民言论却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压力。网民对司法的不信任感,可能造成网民对审案法官巨大的质疑声浪。司法越封闭,公众越怀疑,法官压力越大。比如钱云会一案中,就有网民抛出了这样的问题:“是谁不让我们知道不明真相,又指责我们不明真相?”^①而司法越公开,则公众越信任,而法官压力越小。在现有条件下,让缺乏法律知识的第三方介入司法调查其操作办法仍有待探索。正因如此,司法公开就不仅是网民了解案件真相的最好渠道,同时也是减轻法官压力的最佳路径。

2. 法官对网民法律知识素养的较低评价

本次被调查法官学历水平较高,硕士以上学历者就有 119 人,这些给予网民言论可信度和理性度高评价的法官,对网民的法律素养却是持低评价的。61.4%被调查法官比较同意甚至非常同意,网民一般会超越司法审判程序对当事人行为进行定性,而 63.4%的法官认为网民的法律知识素养较低。具体频数分布如表 4 所示。

表 4 法官对网民法律知识素养的评价

网民法律知识素养较低		频 数	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非常同意	60	15.7
	比较同意	178	46.7
	说不清	86	22.6
	不太同意	52	13.6
	很不同意	5	1.3
	有效样本	381	100.0

二、法官对媒体综合素养的评价

调查发现,更多的法官对媒体的传播素养持较高评价,近半数的法官都认为相对于网民传播的信息,媒体传播的信息更为可信、理性,同时媒体具有更强的获取事实真相的能力。但是多数法官对媒体的法律知识素养还是持较低评

① 马泽明 官员为啥总指责群众不明真相[N]. 见 <http://news.qq.com/a/20101229/000236.htm>.

价,在他们看来媒体和网民一样在传递有关敏感案件信息时缺乏法律知识,也不善于运用法律知识对审判结果加以评论。

1. 法官对媒体传播素养的较高评价

在法官看来,媒体在对敏感案件进行报道时维持了较高的传播素养,这表现在媒体传播的信息比网民传播的信息更可信、更理性。

(1) 法官对媒体传播信息可信度的评价

调查显示有近半数的法官认为媒体传播的信息比网民传播的信息更可信。我们用这样一个问题“媒体报道比网民言论更可信”——来考察法官对媒体报道可信度的评价。所得频数分布如表5所示。

表5 法官对媒体传播信息可信度的评价

媒体传播的信息较 网民传播的信息更可信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非常同意	14	3.7	3.7
	比较同意	152	39.9	40.2
	说不清	105	27.6	27.8
	不太同意	89	23.4	23.5
	很不同意	18	4.7	4.8
	有效样本	378	99.2	100.0

对于媒体报道是否比网民言论更可信,有105位法官选择了“说不清”选项,他们的模糊认知使我们不能下断言多数法官都认为媒体报道比网民言论更可信。但是从均值得分上看,该题的得分是3.15,还是偏向肯定的得分,也就是说被调查法官群体对媒体报道比网民言论更可信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个靠近平均分的得分可以做两种解释:

第一,法官对网民言论可信度的评价并不如学界预想的低,从上一节的分析也可以看到有超过70%的法官认为过半数的网民言论是可信的。网民言论和媒体言论同样值得信任,这对于网民言论来说,是一种较高的评价。

第二,媒体应该更为重视报道的可信度。媒体与网民不同,媒体是专门提供信息的组织。在传播学者看来,媒体是“社会雷达”,它必须向社会提供真实可信的信息以使社会据此做出正确的反应。正如我国学者所做的一个通俗的比喻,媒体就像是社会的哨兵,“倘若来了两只老虎,哨兵却报告说只是两匹斑马,不用

大惊小怪,那么后果便不堪设想。”^①

(2) 法官对媒体报道理性度的评价

问题“媒体传播的信息比网民传播的信息更理性”的均值得分是 3.28,这表明对于媒体传播的信息比网民传播的信息更理性这个判断,法官群体是倾向于同意的。

由于法官对网民传播信息的理性度本身持较高的评价,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法官对于媒体传播信息的理性度也是持较高评价的。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来看,媒体传播的信息应当体现更多的理性。但在一些法官看来,媒体记者并没有体现出更高的理性水平。

通过调查发现,与法官对媒体传播信息理性度评价最为相关的是法官对媒体法律知识素养的评价。“媒体传播的信息比网民传播的信息更理性”与“媒体比网民更有法律知识素养”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肯德尔相关系数高达 0.673,呈高度相关关系。通过交叉分类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相关关系的具体存在,如表 6 所示(为了更简洁地展现这种相关关系,将法官态度简化为同意、说不清和不同意三个维度)。

表 6 法官对媒体传播信息的理性度和法律知识素养评价的交互分析

		媒体传播的信息比网民传播的信息更理性			总数
		不同意	说不清	同意	
媒体比网民更有法律知识素养	不同意	71.2%	13.5%	15.4%	100.0%
	说不清	6.4%	63.3%	30.3%	100.0%
	同意	2.9%	8.0%	89.1%	100.0%

$$N = 373, X^2 = 291.309, df = 4, p = 0.000$$

从表 6 中可以看出,同意媒体报道更有法律素养的法官有 89.1% 同意媒体报道更有理性,而不同意媒体报道更有法律素养的法官则有 71.2% 也不同意媒体报道更有理性。

相对而言,认为媒体立场会影响媒体传播理性度的法官要少很多。“媒体比网民更同情弱势群体”和“媒体传播的信息比网民传播的信息更理性”这两个问

① 李彬. 传播学引论(增补版)[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188.

题间也有相关性,但肯德尔系数值为 0.128,明显低于“是否同意媒体报道更有法律素养”和“是否同意媒体报道更有理性”间的相关系数 0.673。

这提示我们法官对“理性”一词的理解,并不是相对于“感性”的概念,而是相对于“法律知识素养”的概念。媒体报道如果希望在法官心目中形成理性的认知,必须加强法律素养而非隐藏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情感倾向。

(3) 法官对媒体接近案件真相能力的评价

相对网民,媒体作为向社会提供信息的专业组织,应该具有强烈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其核心指的是客观中立。要做到客观中立,媒体就必须遵循专业要求,比如深入现场、采访双方当事人,提供“两面理”等等。深入现场、采访双方当事人,而非单方当事人,就是要靠近事实真相,把现场细节、把当事双方甚至多方观点都呈现于公众面前。吴飞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注意挖掘事实真相”^①,相对网民而言,记者具有媒体组织的支持和宪法保护的采访权,靠近事实真相是对记者的职业伦理要求,而非仅仅是采访需要。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过半数的法官认为媒体较网民更容易接近事实真相(见表 7)。

表 7 法官对媒体了解事件真相能力的评价

媒体比网民能更好地 了解事件真相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非常同意	16	4.2	4.2
	比较同意	177	46.5	46.7
	说不清	97	25.5	25.6
	不太同意	79	20.7	20.8
	很不同意	10	2.6	2.6
	有效样本	379	99.5	100.0

需要强调的是,媒体要提供真实的案件信息一方面有赖于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司法公开。2011 年 1 月 24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提出:“人民法院必须高度重视司法公开民主,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实行新闻发布会制度,

① 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0.

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和诉讼档案公开查阅等制度,充分尊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在互联网充分发达的今天,如果司法不公开,则专业的新闻记者也难以接近事件真相。公众既不能通过公民调查团类似的方式获得案件信息,也不能从媒体获得专业的报道,其对司法腐败怀疑的声浪就会给敏感案件的审理带来无形压力,隐藏在敏感案件中的公众不满情绪也难以得到缓解。

2. 法官对媒体法律知识素养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法官不仅认为普通网民缺乏法律素养,对媒体的法律素养也持低评价,如表8所示。

表8 法官对媒体综合素养评价的均值得分

	媒体一般能更好地了解事件真相	媒体传播的信息一般更可信	媒体传播的信息一般更理性	媒体更有法律知识素养
有效样本	373	375	378	373
最低分值	1	1	1	1
最高分值	5	5	5	5
均值	3.30	3.16	3.28	3.09
离散系数	.925	.970	.938	.991

海量的法律条文,复杂的法律适用原则,深刻的法学原理,这是法律专业人士的必备知识。此次被调查法官大多经过了四年的本科法学专业学习,有些还经过了七年直至十年的法律学习经历,再联系他们常年在一线的审判工作经验,很难让他们对非法律专业人士的法律素养做出高评价。

对表8中的四个问题的得分进行均值计算,得分越高,表明法官群体对媒体综合素养的评价越高。具体到每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均值得分最高的问题是“媒体能比网民更好地了解事件真相”,而得分最低的是“媒体比网民更具有法律知识素养”。这表明一些法官在认可媒体报道真实性、客观性的同时,并不认可媒体编辑记者的法律素养高于一般网民,而我们从法官对网民言论法律素养的评价中可以看到均值得分为2.39,小于中间得分3分,偏向于消极评价。而将法官对网民言论法律素养的评价与法官对媒体法律素养的评价进行加总所得的均值则为5.48,小于中间得分6分,仍然偏向于消极一方,从这一点看来,尽管一些法官对舆论的可信度和理性度给予了肯定,但他们不

能认可舆论主体的法律知识素养。而这可能是影响法官应对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

■ 第三节 法官对舆论主体影响力的评价

这一部分,着力于考察法官对既有敏感案件中舆论主体所发挥影响力的评价。这便于我们厘清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法官群体看来,敏感案件审判是否受到了舆论主体的影响?第二,如果法官认为受到了影响,那么他们对这种影响的评价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第三,法官认为舆论主体能够对敏感案件审判产生影响的原因是什么?

一、法官对既有案件审判中网民影响力的评价

我们以“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和云南晋宁“躲猫猫案”为例,考察了法官群体对这三个既有敏感案件中网民影响力的评价。

1. 三个既有敏感案件简况

“邓玉娇案”涉及土群冲突,“杭州飙车案”涉及贫富群体冲突,云南晋宁“躲猫猫案”也涉及土群冲突。这三个案件在传播上的共同点是案件尚未进入司法程序就已经受到了网民关注,传统媒体迅速跟进报道。网民在这三个案件中都透露出对腐败现象、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同时质疑司法机关的可信度和公信力。“邓玉娇案”的被告是弱势群体,而“杭州飙车案”和云南晋宁“躲猫猫案”的被告则皆为网民眼中的“强势群体”。围绕着三个案件的学术探讨也具有共同的特点,即学者们都认为三个原本普通的刑事案件都演变成了公共事件,其原因就在于公众在讨论中带入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赋予案件当事人不同的阶层身份。公众在案件讨论中的身份认同是“草根”、“屁民”,吁求的是公民基本权利包括知情权、表达权、生命权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比如在邓玉娇被以“故意杀人罪”立案的时候,网民就发出了强烈的质疑。“第一个关键词(指导性洗浴)遮蔽了当地史实之真相,模糊了事件开始时的性质;第二个关键词(指抑郁症)转移了公众的视线,成为以后定性事件的伏笔;然后第三个关键词(指故意杀人)算是呼之欲出、不得不出,把邓玉娇弄成精神上有问题的人,彻底把水搅浑。不论怎样,现在邓玉娇被绑在了医院的床上。如果真的有抑郁症这件事存在的话,这么逼她一下,说不定将来更能够坐实其精神不正常的说法。故意杀人罪肯定是判不下来的,但只要这点可

以得到印证,其他关于当地吏治与黑幕就消失在争论的背后了。”^①这种质疑的背后,是公众强烈的阶层认同。“不敢想,如果21岁的烈女邓玉娇‘故意杀人’定性之后,并最终罪名成立获刑,在后邓玉娇时代,我们的妻女亲人,我们的女同胞们,在遭遇权贵猥亵欺辱邪行的时候,该做怎样的应对?是奋力反抗不惜杀伤恶徒自保清白却堕入‘故意杀人’之嫌,还是默默承受以免刑责加身?”^②通过对敏感案件类似舆论的分析,当前公权力遭遇的公众信任危机清晰可见。

2. 法官对既有案件中网民影响强度的评价

绝大部分法官都认为网民对以上三个案件的审判过程影响较大。具体数据如表9所示。

表9 法官对既有案件中网民影响强度的评价(%)

		邓玉娇案	杭州飙车案	躲猫猫案
法官对网民 影响强度评 价的累积百 分比	影响非常大	34.0	37.4	38.3
	影响比较大	82.5	80.9	79.8
	影响不太大	91.0	92.3	91.2
	没有受到影响	92.0	93.9	92.3
	不清楚	100.0	100.0	100.0
	有效样本	377	377	376

绝大多数法官都关注这三个案例的审理过程,表述对这三个案例审理过程不清楚的法官仅分别为30位、23位和29位。关于这三个案例的填答率也较高,仅分别有4位、4位和5位法官选择放弃填答。这些数据再次证明法官群体对案件新闻保持高度关注,并带有专业思考。他们的媒体使用习惯,带有浓郁的职业特点,法官群体具有高度的职业归属感和阶层归属感。

表9的缺陷在于无法考察法官所指的“影响”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即不能回答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第一,网民对敏感案件审理过程的影响究竟是在

① 千斤散人,有一种无力感,让人前行。见 <http://news.21cn.com/today/zhuannan/2009/03/20/6308362.shtml>。

② 张成才,邓玉娇故意杀人的蹊跷之处。见 <http://news.21cn.com/today-zhuannan/2009/03/20/6308243.shtml>。

哪个层面的？网民对案件的讨论仅仅是造成法官心理压力，还是直接影响了审判结果？第二，网民对敏感案件审理过程的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这两个问题会在后文中加以讨论。

3 法官对既有案件审判中网民影响向度的评价

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法官都认为网民对案件的讨论一般只会给主审法官带来心理压力，不会形成对审判结果的实质性影响。也就是说，多数法官认为在敏感案件审判中，网民的影响力停留于隐形的心理向度，而不是显在的实质向度。

有68.2%的被调查法官认为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会带给法官心理压力。我们认为法官的这种心理压力，正是来自“司法公开”、“审判透明”的压力。“公开”是防止司法腐败最为有效的路径之一，在法治国家权力寻租在百姓眼中都是“暗箱操作”的结果。法官的心理压力，在于会否被网民认为与腐败行为连上了关系。可以证明这个推断的是两个相关系数：问题“网民言论会给法官带来心理压力”与问题“网民对法官一般抱有不信任感”的肯德尔相关关系数值为0.228；与“多数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是担心司法腐败”的肯德尔相关关系数值为0.112。法官越认为网民对司法不信任，网民言论就越容易对法官造成心理压力，这意味着法官不愿因言行不恰切而导致网民的不信任感加剧，并怀疑司法腐败的存在。而这样的压力正是学者们所期待的正面压力。

那些认为网民言论会给自身带来心理压力的法官，有很多认为不会在这样的压力下影响具体的审判工作，仅仅有25.9%的法官认为网民言论会直接影响法官的具体审判工作。这一方面说明了法官对自身职务行为的清晰认知，同时也说明了法官对“司法独立”的信仰。“司法独立”是法官职业光荣感之所在，作为仲裁社会行为的“权威”，法官的神圣正来自“司法独立”。只要定罪量刑体现“司法公正”，“司法独立”本就是社会理应赋予司法的权利和权力。能够说明法官自我身份认同的另外一个数据，是那些否认存在对弱势群体司法不公的法官，更倾向于认为网民言论不会影响法官的具体审判工作。两个变量间的肯德尔相关关系数值为0.281。

4 法官对行政权支持下网民影响向度的评价

在多数法官看来，网民如果希望通过讨论案件对司法审判结果产生实质的影响，必须首先获得行政权的支持（见表10）。

表 10 法官对行政权支持下网民影响向度的认知

网民言论受行政领导关注后 会对审判具体工作产生影响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非常同意	50	13.1	13.1
	比较同意	181	47.5	47.5
	说不清	87	22.8	22.8
	不太同意	57	15.0	15.0
	很不同意	6	1.6	1.6
	有效样本	381	100.0	100.0

法官认为行政权支持下网民对案件的讨论会产生对司法审判的实质性影响。从正面意义而言,网民对案件的关注确实可以引起行政权的重视,对敏感案件的舆论监督不仅对司法不公有效,同时也对权力腐败有效。而换个角度思考,如果在敏感案件中司法不公、权力腐败确实存在,而舆论并未引起行政权重视,那么所谓的舆论监督只会成为镜花水月,空中楼阁。司法不独立,腐败难监督,这就是当今公权力面临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以“钱云会案”为例,它经由网民讨论、媒体报道,最终获得温州市政府乃至最高权力机关的重视,案件的最终审判采用了公开审判的形式,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向全国直播了案件的整个审判过程。在中国,司法受到行政权的管理和制约,因此当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受到行政权关注的时候,就能够对司法审判的具体过程包括审判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5. 法官对既有案件审判中网民影响积极度的评价

大多数法官都认为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以及云南晋宁躲猫猫案都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了网民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法官看来是积极的,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法官对既有案件审判结果公正性的评价

既往受网民言论影响的 案件是否公正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90%以上公正	175	45.9	48.5
	80%~90%公正	132	34.6	36.6
	60%~70%公正	36	9.4	10.0
	50%公正	13	3.4	3.6
	大部分不公正	5	1.3	1.4
	有效样本	361	94.8	100.0

近半数的法官认为受到网民言论影响的案件 90% 都是公正的, 而 85% 的被调查法官认为受到网民言论影响的案件 80% 以上是公正的, 这再次表明法官所指的网民对敏感案件之“影响”并非负面的, 司法公开不会导致司法不公。一般情况下, 法官审案不会受到网民言论的直接影响, 而即便受到了影响, 多数审判也都是公正的, 这虽然不足以证明法官对舆论监督的正面评价, 但却可以证明法官作为公权力的代表, 并不认为网民可以通过对案件的讨论左右审判工作。一些学者所担心的“舆论审判”, 事实上是在否认法官的职业素养和在审判中的抗干扰能力。

网民同情弱势群体, 并在言论中强调公民权利, 这种带有感情倾向的舆论监督是否真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会形成“民意审判”。比如在张金柱案中, 所谓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审判, 在不少学者看来这就是“民意审判”导致司法不公的典型表现。对这样的观点, 多数法官并不认同。

绝大多数法官认为网民讨论敏感案件并不会产生所谓的“民意审判”, 更不会导致司法不公。表 12 同样可以论证, 大多数法官认为网民对具体审判工作的“影响”是积极的, 而不是消极的, 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不会导致司法不公。

表 12 法官对既有案件审判中网民影响积极度的评价

网民讨论敏感案件 导致司法不公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非常同意	10	2.6	2.6
	比较同意	71	18.6	18.8
	说不清	89	23.4	23.5
	不太同意	164	43.0	43.4
	很不同意	44	11.5	11.6
	总数	378	99.2	100.0

二、法官对既有案件审判中媒体影响力的评价

更多的法官认为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容易造成对法官的心理压力, 也容易对案件审判的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如果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未能获得媒体呼应, 在部分法官看来, 其影响力会降低。

1. 法官对既有案件审判中媒体影响向度的评价

如表 13 所示,73.2% 的的调查法官都认为媒体报道敏感案件会带给法官群体心理压力,而认为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会给自身带来心理压力的法官占 68.2%。可以看到更多的法官认为媒体对法官的心理影响力高于网民对法官的心理影响力。这样的数据对比提示,媒体监督的有效性可能高于网民监督。心理压力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只要法官定罪量刑恰切,就不会因为心理压力的存在而影响案件的具体审理过程。媒体和网民言论共同带来的心理压力,事实上形成了对法官必须秉公执法的公众提示,同时也能有效防止寻租行为的发生。

表 13 法官对既有案件审判中媒体影响向度的评价

媒体报道 般带给 法官心理压力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非常同意	56	14.7	14.7
	比较同意	222	58.3	58.4
	说不清	67	17.6	17.6
	不太同意	27	7.1	7.1
	很不同意	8	2.1	2.1
	有效样本	380	99.7	100.0

和对网民的影响向度评价类似的是,多数法官也不认为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可以直接影响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

仅有 26.1% 的法官认为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会直接影响到审判工作。问题“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会直接影响法官具体审判工作”与问题“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会直接影响法官具体审判工作”呈相关关系,肯德尔相关系数数值为 0.478。认为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会影响具体审判工作的,也会倾向于认为网民对案件的讨论会影响具体审判工作。但是这两道题目中,都有三分之一强的法官持“说不清”的态度。推导其原因,可能是法官不能确定不同的审判人员在面对不同案件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媒体和网民都不是影响司法审判唯一的社会性因素。这再一次提示“媒体审判”或者“舆论审判”只是一种学术推论。法官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对社会冲突有着充分认知的群体,他们对影响司法元素的考虑是全面和深入的。事实上,在学界“舆论审判”(或称民意审判、媒体审判等)等词语本身从未有过准确的、公认的定义。学者们往往是自己树靶子,自己再打靶。

子。围绕“舆论监督”还是“舆论审判”的学术争议，其实缺少共有平台。比如，批评媒体审判的学者一般都会在论文中采用大篇幅论述失实报道和非理性评论的不良后果，认为这是媒体干扰司法的重要表现。而认为媒体审判其实不存在的学者也不赞同失实报道和非理性评论，但他们论述的重点是，一些真实报道和理性评论在很多时候促进了司法公正，维护了公众对司法的监督权利。总体而言，争议双方学者们讨论的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就是新闻监督需要一方面保障公民权利一方面维护司法权威。研究视角不同，导致争议中的学者只强调了其中的某个方面。但类似“媒体审判践踏法治尊严”的观点，由作者的调查看来与法官的自我评价相差甚远，并缺少实证研究的证据支持^①。

2 法官对行政权支持下媒体影响向度的评价

多数法官认为只有在上级党政领导的关注下，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才会直接影响案件的具体审判工作。这说明，在多数法官看来无论是网民还是媒体都只有在行政赋权的情形下，才会变成实际影响司法的力量。这证明了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假设，在中国无论是舆论监督还是司法审判都依附于行政权而存在；权力结构失衡，而非舆论失范，才是导致舆论监督司法问题重重的根源所在。媒体是比网民更受法官重视的舆论主体，但这种重视只表现在其对法官的心理压力要大于网民言论。即便在被调查法官看来媒体的官方背景赋予了媒体更多的权威性，媒体报道也必须得到官方明确的支持才能对司法产生影响。假如司法不公确实存在，而媒体报道并未得到行政权的重视，那么所谓的舆论监督只会流于形式。媒体和司法都依附于行政权，媒体报道和司法审判可能都在行政权的指令下进行，在这个逻辑层面上，媒体和司法的关系也不应该处于紧张当中。

3. 法官对媒体影响积极度的评价

媒体对司法有影响，那么在法官眼中，这样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调查结果显示，多数法官认为媒体报道对司法审判的影响是积极的。

首先，多数法官都不认为过去媒体和司法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对“过去媒体和司法关系紧张”这个问题，有42%的法官不同意，有36.5%的法官表示说不清，只有20.8%的法官表示同意。这一问题的均值得分是2.79，这说明法官群体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偏向“不同意”的。当然面对媒体和司法间复杂的关系，不少法官选择了无法评价的态度。但毕竟这一偏向“不同意”的均值得分，说明了“媒体和司法关系紧张”这一判断在法官中不占据主流。

^① 胡茵茵：《权利·权力制衡理论范式的形成》，《国际新闻界》，2009（11）。

其次,绝大多数法官都不同意“媒体报道一般会导致司法不公”的说法。认为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会导致司法不公的法官只有 16.9%。需要注意的是,那些认为媒体报道会导致司法不公的法官会更倾向于认为过去媒体和司法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媒体报道一般会导致司法不公”和“过去媒体和司法关系紧张”这两个问题间的肯德尔相关系数值是 0.222。

1.3 本章小结

本章的分析表明,社会冲突问题的客观存在影响到了法官对舆论主体的认知和评价。大多数法官都觉察到在社会冲突语境下网民和媒体的立场是:支持弱势群体和质疑司法。

有高达 90.2% 的被调查法官认为网民在对敏感案件的讨论中一般会同情涉案的弱势群体。同时,法官认为网民的立场已经影响到了媒体立场,这主要表现在互联网产生之后媒体对司法的批评报道增多。

需要注意的是,多数法官对网民和媒体的法律知识素养都持较低的评价。他们认为无论是网民还是媒体都不能从法律专业角度对敏感案件作出恰当的评论。在法官眼中,舆论要想具有更高的理性,就应该具有更高的法律知识素养。

对法官而言,无论是网民舆论还是媒体舆论都不会对案件审判造成实质性影响。网民和媒体想要影响到具体的审判工作,只能求助于行政权的关注和支持。

多数法官认为,在过去网民舆论和媒体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是比较正面的,舆论对敏感案件的关注并不会导致司法不公。

总体而言,法官认为司法审判不会受到舆论的直接影响,而即便受到了影响,多数审判也都是公正的。一些学者所担心的“舆论审判”,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法官的职业素养和在审判中抗干扰的能力。



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 社会功能的评价

学者所构建的舆论与司法相互制衡,也就是私权利与公权力相互制衡的理想模式是否能够得到法官群体的认可?学者对于社会不满情绪需要透过自由表达来加以疏导的观点是否也是法官群体的共识?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考察法官对于舆论监督司法功能以及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评价。

在理论层面上,本章承接前几章的研究视角,继续在社会冲突语境下,考察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社会功能评价有什么样的特点。

第一节 法官对舆论监督司法功能的评价

调查显示,更多的法官认为相对网民舆论,媒体舆论具有更好的监督司法功能。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法官对媒体监督司法功能的信任可能来源于他们对媒体综合素养的信任。在不少法官看来,媒体舆论比网民舆论更容易受到行政权关注,也因此具备了更高的权威性。

一、法官对网民舆论监督司法功能的评价

尽管有超过半数的被调查法官认为在敏感案件审判过程中,网民的舆论监督能够发挥对司法的良好监督作用,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还有近半数的法官并不认为网民舆论能够发挥良好的监督司法功能。

1. 法官对网民舆论监督司法功能的评价

学者们认为司法应该接受舆论监督,是因为权力需要得到制约以及法治社会必须尊重公民权利的思想。但对于被调查法官来说,舆论监督是否有效是需要综合考虑复杂的社会环境来做出评价的,法官作为司法权的握有者是否认为自身需要得到监督还是不确定的。从调查结果看来,多数法官认为在没有行政权支持的情况下,网民舆论不会对司法产生实质性影响。中国的客观现实是,能够通过舆论监督得到行政权关注的案件为数甚少;而强势群体利用非正常手段干预司法的情况却会更多。舆论监督对法官没有强制力,而大多数法官又认为网民言论能对司法发挥良好监督作用(见表1),这实际上提示法官对自身职业

素养的高评价,作为司法权的握有者能够自觉接受监督,并防止司法不公的出现。

表1 法官对网民舆论监督司法功能的评价

网民舆论一般能发挥良好的监督司法功能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态度	非常同意	33	8.7
	比较同意	166	43.6
	说不清	98	25.7
	不太同意	72	18.9
	很不同意	11	2.9
	有效样本	380	99.7

法官对既有案件审判结果的公正评价,一方面提示网民言论对司法审判的正面影响,一方面也提示法官对自身群体能够做出公正判决的自信评价。

2 部分法官质疑网民舆论监督司法功能的原因探析

网民和媒体可以对敏感案件进行讨论和报道的一个重要合法性来源就是能够形成对司法的监督,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那么,部分法官不认可网民舆论监督司法功能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他们不认可网民监督的合法性呢?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答案并非如此。

(1) 部分法官对网民影响力的质疑。法官断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会受到网民言论”的影响,面对这一理论上必须成立的问题,过半数法官认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但从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出,大多数法官认为围绕敏感案件形成的网民言论一般只会给审判工作带来心理影响,而非实质性的影响,即对具体审理过程、审判结果的影响。网民言论要产生影响,最直接的方法是受到行政权重视,但这在现实中发生的几率并不大。因此,在部分法官看来有没必要由网民言论来承担监督司法的重任,可能是一个有待考察的问题。

(2) 部分法官对舆论监督难的认知。在本书第一章中就有分析,大多数法官认为司法腐败问题客观存在,某些强势人群也确实会利用非正常手段影响司法,对于这些问题仅依靠网民讨论少数敏感案件来解决可能性较小。

一些法官对网民言论实施舆论监督有效性的质疑,提示我国监督司法的难

度。我国监督司法的路径包括行政监督、人大监督、内部监督等等,但是司法不公、权力腐败现象却屡禁不止。张金柱案距今已有 15 个年头,我们看到公众对公权力的不信任并未消失反而呈递增之势,公众的不满情绪也未得到有效缓解。另一方面,司法工作人员包括公安机关人员缺乏公民权利意识,因为地位带来的权力而忘却了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诉求和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导致一些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作为仲裁社会冲突、确立社会正义标准的法律,其作用在当代中国显得尤为重要。本书所做的调查揭开了法官面对网民言论时的复杂心态。认为对法官施加舆论压力就可以影响审判的观点,与认为舆论审判可以导致司法不公的观点一样都忽视了法官的主体性和不同法官在处理敏感案件时的不同思路。

需要得到注意的是另外一个数据,就是那些认为司法案件中权力寻租现象确实存在的法官中有近 50% 认为网民言论不会直接影响法官断案,这提示这 140 名被调查法官可能认为舆论监督对权力寻租现象鞭长莫及(见表 2) (“不同意”选项由“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简化合并而成;“同意”选项由“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简化合并而成)。

表 2 法官对网民言论遏制司法腐败有效性的质疑

		网民言论直接影响具体审判			总数
		不同意	说不清	同意	
强势人群	不同意	28	5	3	36
非正常影响司法	说不清	24	26	11	61
	同意	140	58	84	282
有效样本		192	89	98	379

(3) 法官对网民综合素养的质疑。虽然绝大多数法官都认为网民讨论敏感案件不会直接导致司法不公,但这并不代表这些法官都认为网民言论对司法而言是一种良好的监督方式。网民言论的可信度、理性程度、法律知识素养都让一些法官在评价网民舆论时踌躇不前。

前面已有论述,对“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一般缺少法律知识”这一陈述,62% 的法官持同意态度。网民讨论缺少法律知识的支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就难以形成建设性意见,而被法官认为是单纯的对弱势群体的声援。这种声援与防止司法腐败之间的逻辑关联,在法官看来是微弱的。

法官对网民的法律素养持怀疑态度,还有另外一个数据支撑,即不在少数的法官并不认可网民具有维护正义的伦理取向。“正义”一词蕴含的法律含义,在一些法官看来并不能为网民所理解。第二章也已经论述过,有过半数的法官对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是否出于追求正义的目的表示“说不清”甚至“不同意”。与此相关的是,多数学者都认可的“网民言论和司法统一于社会正义”一说,在一些法官看来并不成立(见表3)。

表3 法官对网民舆论正义性的评价

网民言论和司法 统一于社会正义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非常同意	53	13.9	13.9
	比较同意	145	38.1	38.1
	说不清	106	27.8	27.8
	不太同意	67	17.6	17.6
	很不同意	10	2.6	2.6
	有效样本	381	100.0	100.0

无论先贤大儒对正义各有怎样的解释,法律的目标是追求正义却是亘古未变的真理。在拉丁语中,法 Jus 同正义 Justitia 是同一词根。在美国,法官、司法、法庭与正义 Justice,都是同一词^①。拉得布鲁赫、丹宁勋爵等法学家和法学实践者更认为正义的价值超越法律,如果法律违背了正义的要求,就失去了法存在的意义,是为恶法,而公民有权抵抗恶法。被调查法官的学历水平,提示法官群体不可能认为法律的目标并非追求正义。那么让法官不同意民意与法律统一于社会正义的唯一理由就是:法官不认为网民(也即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公众)理解正义、懂得正义、并在敏感案件的讨论中追求正义。另一个调查结果也能为这一结论提供支撑,认为网民有追求正义倾向的法官,更会倾向于认为网民言论与法律统一于社会正义。

法官眼中的网民群体具有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权利意识,但却缺乏必要的法律素养,这同样使得法官对网民的政治自觉性有所怀疑。如果网民的自发讨论并没有监督司法的主动意识,那么即会流于单纯的“泄愤”,而不能形成理性的

① 郭道晖.法理学精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192.

公共意见。

不能否认的是,网民舆论确实不能完全代表民意,围绕敏感案件形成的具有影响力的言论往往是由那些知识“精英”群体发出的,他们由媒体人、学界人士、自由撰稿人以及其他知识精英组成。一般网民可能确实没有这些知识精英所具备的政治自觉性,但是这些知识精英作为网民言论中的意见领袖,已经带动了中国网民或者说普通公众政治自觉性的提高。杭州飙车案中,网民思考的是今天被撞的是谭卓,明天被撞的就可能是张卓、李卓;邓玉娇案中,网民思考的是今天被定罪故意杀人的是邓玉娇,明天被定罪故意杀人的就可能是周玉娇、王玉娇;躲猫猫案中,网民思考的是今天被打身亡的是李荞明,明天就可能是赵荞明、孙荞明。社会分层是中国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公众吁求平等、公正的呼声不再是一种自发的零散的声音,而是自觉的对正义的要求。问卷设计中一道题目的设计是“网民一般和案件中的某种利益有关联”,对这一问题有大多数法官选择了不同意。题目设计的原意是考察法官对网民身份认同的认知,其结果是法官对网民的身份认同不甚敏感。题目自身的有效性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确实说明法官对“利益”一词的理解局限在“直接利益”的理解上,而非“群体利益”的理解上,这表明部分被调查法官对公众的身份认同还不十分敏感。

二、法官对媒体舆论监督司法功能的评价

媒体的监督权源自公众的监督权,新闻的自由权来自公众的知情权,但是当媒体作为一个法人组织对司法工作进行监督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与公众不同的舆论主体。在被调查法官看来,媒体监督司法更可行、更有效。

1. 法官对媒体舆论监督司法功能的评价

多数被调查法官认为,媒体舆论一般能发挥良好的监督司法功能。

“与网民舆论一般能发挥良好的监督司法功能”一题相比,明确表示同意的法官数量较多,同时该题的均值得分也较高为3.48,而前者是3.36。这说明更多的法官认为媒体监督司法的可行性比民意监督司法的可行性更强。

同时,对于“媒体舆论一般会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绝大多数法官表示不同意。仅仅只有16.9%的法官认为媒体报道一般会导致司法不公。

2 法官更信任媒体舆论监督司法功能的原因探析

当一个法官对媒体的综合素养和对媒体关系的评价越高的时候,他对媒体舆论监督司法功能的评价也可能会更高。

(1) 法官对媒体综合素养的评价

与“媒体舆论一般能发挥良好的监督司法功能”有相关关系的有以下几个问题:媒体一般能比网民更好地了解事件真相,肯德尔系数值为0.225;媒体传播的信息一般更为可信,肯德尔系数值为0.139;媒体传播的信息一般更为理性,肯德尔系数值为0.233;媒体传播的信息一般更具有权威性,肯德尔系数值为0.175;媒体更具有法律知识素养,肯德尔系数值为0.196。

法官对媒体能否发挥良好舆论监督作用的评价与法官对媒体综合素养的评价相关,其中相关性最强的是法官更为认可媒体传播信息的理性程度以及法官认为媒体一般能比网民更好地了解事件真相。

尽管,我国既有规制对媒体采访敏感案件有限制,但在特殊情况下,媒体特别是中央机关报、台、通讯社等反而有采访敏感案件的特殊便利,无论是杭州飙车案还是钱云会案,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是权威信息的载体。相关司法机关也都向这些媒体提供丰富的案件信息,包括重要证人、证言、证物等。由此,法官认为媒体比网民言论更利于舆论监督是有现实基础的。

(2) 法官对过去媒体和司法关系的评价

越是认为媒体和司法关系紧张的法官,越倾向于认为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容易导致司法不公。

媒体和司法关系紧张,是在对敏感案件讨论中不少学者认同的观点。导致学者有如此观点的原因,是学者担心媒体监督干扰司法独立,司法机关排斥媒体报道。但是此次调查显示,明确表示过去媒体和司法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法官并不占多数仅为20.9%,但是,明确反对的法官也没有超过半数,有三分之一强的法官仍然选择了“说不清”选项,如表4所示。

表4 法官对过去媒体和司法关系的评价

过去媒体司法关系紧张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非常同意	6	1.6	1.6
	比较同意	73	19.2	19.3
	说不清	139	36.5	36.8
	不太同意	149	39.1	39.4
	很不同意	11	2.9	2.9
	有效样本	378	99.2	100.0

那些倾向于认为过去媒体和司法之间关系紧张的法官也倾向于认为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容易导致司法不公,两个问题间的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222。

通过将“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合并为“同意”,将“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合并为“不同意”制作交互分类表可以更为直观地展示以上的分析。

表5 法官对媒体司法关系的评价及其对媒体报道功能评价的交互分析

		媒体报道致司法不公			总数
		不同意	说不清	同意	
既往媒体 司法关系 紧张	不同意	70.0%	16.3%	13.8%	100.0%
	说不清	55.1%	38.4%	6.5%	100.0%
	同意	39.0%	19.5%	41.6%	100.0%

$$N = 375, X^2 = 62.342, df = 4, p = 0.000$$

通过表5可以看到,不认为过去媒体和司法关系紧张的法官有70%也不同意媒体报道会导致司法不公;而SPSS计算显示,不认为媒体报道会直接影响司法工作的法官中,有77%不同意媒体报道会导致司法不公。这说明大多数法官对审判应当以法律准绳,以事实为依据有较深的认同,并且认为不应将“司法不公”的原因加之于媒体报道。

1.2 第二节 法官对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评价

通过法官对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成因和特点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官群体认为媒体是不同于网民的舆论主体,媒体报道具有反映民意的特点,但相对网民传播的信息而言,更可信、更理性、更具有权威性。那么法官对于媒体舆论和网民舆论能否缓解社会冲突的判断是否也会不同?如果是,这种不同又意味着什么?

一、法官对网民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评价

是否同意“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被调查法官群体赋予这一问题的均值得分是3.02,偏向肯定得分,也就是说被调查法官作为一个整体认为网民讨论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这个得分虽然偏向肯定,但是与平均分3分只相差0.02分,在整张问卷中是均值得分最接近于中间分3分的得分。可以说,这是一个最让法官“说不清”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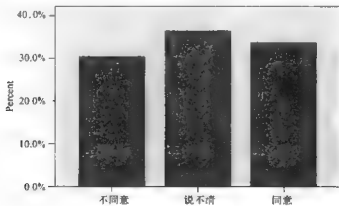
1 法官对网民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质疑

有 33.6% 的法官认为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有 36.2% 的法官认为自己无法判断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是否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如表 6 所示。

表 6 法官对网民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评价

网民讨论敏感案件 有利缓解社会冲突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非常同意	20	5.2	5.2
	比较同意	108	28.3	28.3
	说不清	138	36.2	36.2
	不太同意	91	23.9	23.9
	很不同意	24	6.3	6.3
	有效样本	381	100.0	100.0

如果我们将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合并为同意选项,而很不同意和不太同意合并为不同意选项,就能看到在同意和不同意这两端意见之间持保留态度的法官占被试法官总数的 1/3 强。将以上数据制作为条形图,能更直观地看到“说不清”的大多数的存在(见图 1)。



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

图 1 法官对网民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评价

一个较为典型的敏感案件——钱云会案，似乎能够解释法官对“网民言论能否缓解社会冲突”的疑虑。网民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是钱云会案的一个特点。钱云会的家人、钱云会所在村的村民、数以万计关心钱云会案的网民都对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心存怀疑。钱云会是浙江温州乐清蒲岐镇寨桥村人，2010年12月25日，钱云会被发现亡故于超载工程车车轮下。当天下午1点钟左右，网上出现了《蒲岐一苦难的村长 为民办事的好村长 今早被杀》的首帖，文章称，死者是寨桥村的村长，早上的车祸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而是一起有策划、有组织的谋杀案。帖子一出，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大网站纷纷转载。仅25日一天，天涯、猫扑、百度快照及温州当地网站“703804”等访问量高达28万人次，跟帖近2000条。很多网友对死者的死状表示不解，甚至有人画出示意图来分析钱云会的死因^①。钱云会于2005年当选村主任，曾因土地纠纷问题带领村民上访，并在上访过程中，先后3次被投入看守所。这一背景，是钱云会案在传播过程中网民着重讨论的细节。寨桥村村民和公众都怀疑钱云会之死与土地纠纷有关。

12月27日，乐清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认定钱云会案为交通事故案，但这一结果无法令网民信服。网民围绕案件提出几大疑问：第一，事发现场的摄像头为什么没有存储当时的监控录像？为什么事发当时工程车逆行？现场为什么没有刹车痕迹？第二，为什么寨桥村村民不被允许接受采访，媒体报道受限？第三，为什么钱云会的尸体被迅速转移，事故现场为什么不受保护？第四，为什么会盛传钱云会是被四个人架起放在工程车后面然后被碾死的？第五，钱云会生前最后一个电话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与钱云会之死是否有关？此时，关注钱云会案的一些著名媒体人、学界人士、律师、知名民间人士等自发组成“公民调查团”前往乐清进行调查。12月28日凌晨1点钟，温州市委召开专题会议，决定由温州市公安局直接介入调查处理，并按刑事命案和交通事故两套程序分别展开调查、侦查。12月29日，温州市政府新闻办在乐清召开新闻发布会，就钱云会被掩身亡一事进行了通报。温州市公安局明确表示，村民钱成宇并未对“谋杀行为”进行直接目击。经调查已经排除谋杀可能，认定为交通事故案件。但由于对细节问题解释不清，网民对钱云会是否谋杀致死仍有怀疑。2011年1月14日，温州警方获得钱云会事发时佩戴的具有微录功能的手表，该手表记录

^① 温州钱云会案始末，政府遮掩致事态发酵，见 <http://news.163.com/10/1231/04/6P74QR300001124j.html>。

下了事故发生时工程车的刹车声。2011年1月30日,温州警方向媒体公布了手表等证物。钱云会案至此尘埃落定。

两次新闻发布会,四条处理决定,乐清市政府、温州市政府介入案件调查直至最后的物证——手表出现,公权力历时一个多月方才取信于民。值得强调的是这一起被认定的普通交通肇事案件曾一度引发警方与村民的对峙和冲突,多名村民被刑拘。这起案件的背后是乐清市扯不清理还乱的土地纠纷问题,村民累积已久的对政府不合理征地的不满和质疑,是钱云会案引发大讨论甚至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的根源。

围绕钱云会案的网民讨论延时一个多月,在微博、各大门户网站、虚拟社区上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议程。网民对钱云会是否被谋杀质疑声四起,这与杭州飙车案审理结束后对胡斌是否为替身的讨论颇有相似之处。“胡斌有替身”、“钱云会系谋杀”,这些网民的质疑颇有“传言”之像,在一些政府官员口中,更可能被称为“谣言”。或许,正是类似事件导致法官无法确认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究竟会缓解社会冲突还是引发社会冲突。法官对网民言论的特点和成因理解越深入,可能就越容易担心网民言论会使原本潜藏在社会心理中的社会冲突演变为社会行为上的社会冲突。

2. 部分法官质疑网民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法官质疑网民舆论缓解社会冲突的功能?从相关性上分析,部分法官对网民综合素养与网民讨论敏感案件的心理动因“不放心”是其中一个原因。

(1) 部分法官对网民综合素养的质疑。首先来看与“网民舆论能否缓解社会冲突”这一问题变量相关的问题变量和肯德尔相关系数值:①“针对涉及干群冲突敏感案件的网民舆论是否可信”,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283;②“针对涉及贫富群体冲突敏感案件的网民舆论是否可信”,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294;③“针对涉及其他弱势群体冲突敏感案件的网络舆论是否可信”,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293;④“针对涉及干群冲突敏感案件的网民言论是否理性”,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386;⑤“针对涉及贫富群体冲突敏感案件的网民言论是否理性”,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273;⑥“针对涉及其他弱势群体冲突敏感案件的网络言论是否理性”,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305;⑦“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一般缺乏法律知识”,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177。

这里以相关性最强的变量做一个交互分析(见表7)。

表7 法官对网民传播素养和网民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评价的交互分析

		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					总数
		很不同意	不太同意	说不清	比较同意	非常同意	
在涉及干 群冲突案 件讨论中 网民传播 的信息是 否理性	都不理性	40.0%	60.0%				100.0%
	大部分不理性	9.5%	49.5%	25.3%	14.7%	1.1%	100.0%
	一半对一半	6.0%	30.7%	39.3%	20.0%	4.0%	100.0%
	大部分理性		9.8%	42.6%	36.9%	10.7%	100.0%
	都理性			37.5%	12.5%	50.0%	100.0%

$$N = 381, \chi^2 = 110.543, df = 16, p = 0.000$$

认为在涉及干群冲突案件讨论中网民传播的信息都理性的法官有62.5%同意网民讨论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而认为网民舆论都不理性的法官则100%否认网民讨论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认为网民言论大部分理性的法官中有47.6%的法官同意网民讨论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有42.6%的法官选择“说不清”,还有9.8%的法官不认为网民讨论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这也就是说,法官对网民理性程度的评价越高,就越倾向于认为网民讨论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对网民理性程度评价高的法官却不清楚网民言论是否真的能够缓解社会冲突,他们的不确定态度乃至否定态度是造成“网民言论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这一问题均值得分最靠近3分的主要原因。

(2) 部分法官对网民讨论敏感案件心理动因的认知。数据分析显示,法官对网民讨论敏感案件心理动因的认知与他们对网民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评价相关。具体相关关系如下,与“网民舆论能否缓解社会冲突”这一问题相关的问题如下:①多数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是担心司法腐败,肯德尔系数值为0.137;②不公平感促使人们在网络上探讨敏感案件,肯德尔系数值为0.150;③多数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是因为他们具有维护正义的伦理取向,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216;④多数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215。

法官对网民讨论敏感案件心理动因的认知越清晰,就对网民言论可以缓解社会冲突的评价越积极。比如当法官认为网民是在不公平感的驱使下讨论未决时,会倾向于认为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但这部分法官的人

数并不占明显的多数,在不少认为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是因为不公平感的法官看来,网民讨论究竟能否缓解社会冲突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他们用“说不清”选项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再以相关性最强的变量做一个交互分析,分析这种来自法官的疑惑和思考呈现何种的状态。表8对法官态度做了合并简化处理。

表8 法官对网民心理动因的认知及其对网民舆论社会功能评价的交互分析

		网民言论缓解社会冲突			总数
		不同意	说不清	同意	
网民有政治参与的心理动因	不同意	44.0%	31.2%	24.8%	100.0%
	说不清	23.0%	56.0%	21.0%	100.0%
	同意	25.9%	27.6%	46.5%	100.0%

$$N = 379, \chi^2 = 40.346, df = 4, p = 0.000$$

认为多数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是因为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的法官,有接近半数同意网民讨论可以缓解社会冲突,有27.6%的法官选择“说不清”。而那些并不认为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的法官,虽然有44%选择了网民讨论不会缓解社会冲突,但仍然有31.2%的法官选择了“说不清”选项。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强,对缓解社会冲突来说究竟有利有弊?很多被调查法官难以作出判断。事实上,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究竟强不强,对于一些法官来说本身就是说不清的,这部分法官中的56%对网民言论是否可以缓解社会冲突更是难以把握。

二、法官对媒体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评价

在舆论能否缓解社会冲突这一问题上,多数法官对网民舆论“不放心”,但对媒体舆论则抱有一定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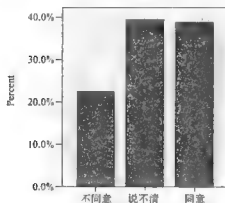
1 法官对媒体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肯定

“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问题的均值得分为3.16,这说明有更多的法官认为媒体报道比网民讨论敏感案件更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具体频数分布如表9所示。

表9 法官对媒体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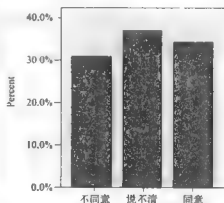
媒体报道敏感案件 有利缓解社会冲突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非常同意	13	3.4	3.4
	比较同意	133	34.9	35.0
	说不清	149	39.1	39.2
	不太同意	70	18.4	18.4
	很不同意	15	3.9	3.9
	有效样本	380	99.7	100.0

我们将持“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观点的法官合并为持“同意”观点的法官,再将持“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观点的法官合并为持“不同意”观点的法官,得到百分比分布条形图。图2为法官对媒体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评价;图3为法官对网民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评价。



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

图2



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

图3

将图2与图3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图的区别在于选择不同意选项的法官百分比,不同意网民言论可以缓解社会冲突明显多于不同意媒体报道可以缓解社会冲突的法官。这也再一次说明,法官对媒体缓解社会冲突的功能有更高的认同感。需要注意的是仍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法官对媒体是否能缓解社会冲突持“说不清”的态度,这与法官对媒体报道特点、报道成因以及监督司法有

效性的理解是否相关呢?

2. 法官更为肯定媒体舆论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原因

在多数法官看来,媒体是不同于网民的舆论主体,具有专业、权威、可信等特点,正是由于对媒体综合素养抱有更高的信心,使法官倾向于认可媒体舆论对社会冲突的缓解功能。

(1) 法官对媒体综合素养的肯定。法官对媒体的综合素养越是肯定,就越倾向于认为媒体报道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具体相关问题是:①“媒体更容易接近事件真相”,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291;②“媒体传播的信息更为可信”,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234;③“媒体传播的信息更为理性”,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215;④“媒体传播的信息更有法律素养”,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247;⑤“媒体传播的信息更有权威性”,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307。

(2) 法官对媒体报道敏感案件具体动机的认知。法官对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动机是“引导舆论”、“监督司法”、“倡导社会公平”的认知越明确,越倾向于认为媒体报道可以缓解社会冲突。具体相关问题是:①“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是为了引导舆论”,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312;②“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是为了监督司法”,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283;③“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是为了倡导社会公平”,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303。

如果法官认可媒体报道敏感案件并不是为了迎合受众,或者炒作新闻,那么其认可媒体缓解社会冲突的功能的可能性就越大。以相关性最强的一个变量做交互分析,可以发现同意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是为了引导舆论的法官中有50.5%认为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而不同意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是主动引导舆论行为的法官中则有55.2%反对媒体报道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

(3) 法官对媒体舆论监督司法功能的积极评价。法官越是认为媒体舆论能够发挥良好的监督司法功能,就越倾向于认为媒体报道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这说明那些不排斥媒体监督司法,并认为司法需要监督的法官,越认为媒体报道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

综上所述,法官判断媒体报道是否可以缓解社会冲突的原因在于法官对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认知,对媒体综合素养以及媒体监督司法功能的积极评价。之所以仍然有近三分之一的被调查法官对媒体能否缓解社会冲突持“说不清”观点,是因为他们对媒体报道的可信度、理性程度、权威性及其报道敏感案件的出发点抱有怀疑。但一个较为清楚的现象是,相比网民言论而言,法官更认同媒体监督司法的功能和缓解社会冲突的功能,这源于他们对媒体报道客观性和权威

性的认知。法官之所以更为认可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是因为中国媒体特殊的公权力背景。媒体可以在公权力的支持下采访报道敏感案件,因此相比普通公众更具有接近案件真相的能力。媒体与司法一样,都接受行政权的统一管理,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以及媒体与司法的关系都是行政权可以进行调控的对象。部分被调查法官正处于对媒体与公权力特殊关系的认知,才做出了运用媒体报道来平衡敏感案件中权利-权力博弈的思考。

1.3 第三节 法官对舆论“联系社会”功能的评价

联系社会(correlation of the different parts of society in responding to environment)指的是人类的传播将社会的各个部分整合为有机整体,以应对环境的变化。施拉姆引用德弗勒的观点认为传播有助于解释群体规范,实现社会控制,分配社会责任,协调各种力量,表达各种愿望(expectation),并最终使社会整体系统正常运行……缺少了传播对各种影响力(influence)的交换,人类社会就会崩溃^①。

一、法官对网民舆论“联系社会”功能的评价

互联网催生了大批自媒体的产生,人们不再需要使用媒体来传递自己的声音。网民舆论本身就可以被看成民意的一部分。执政党看到的民意,就不再是经过媒体建构的那个民意,而是直接的、明确的民意。

1. 如何理解中国语境下网民舆论的“联系社会”功能

网民舆论使执政党能够看到一种直接的、明确的民意,并因此可以实时评估社会需求和社会风险。基于此,我们认为网民舆论“联系社会”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下情上传”的功能。

根据著名社会冲突论者科塞的观点,社会冲突的解决需要一种安全阀机制,当社会不满情绪得到宣泄,就可能避免更大烈度和强度的社会冲突的发生。在中国,网民舆论承载了很多对现有社会不公现象的批评。因此,网民舆论也可能具备一种“社会宣泄”的功能。

为了便于法官的理解,我们用以下两个问题来考察法官对网民舆论“联系社会”功能的评价:第一个,“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让执政党更加了解民情民

^① Schramm. *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 (second edi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27.

意”；第二个，“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有利于宣泄社会不满情绪”。

2. 法官对网民舆论“联系社会”功能的评价

大多数法官对网民舆论“联系社会”功能都持较高的评价。64.8%的法官认为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有利于执政党了解民情民意，66.1%的法官认为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有利于宣泄社会不满情绪。总体而言，法官能够肯定网民舆论“联系社会”的功能。

3 法官对网民舆论“联系社会”功能评价的影响

相关性分析显示，那些认为网民对敏感案件讨论有利于执政党了解民情民意的法官，其中更大多数也认为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这就是说，法官对网民舆论“下情上传”功能越是认可，就越倾向于认为网民舆论具有缓解社会冲突的功能。

但是，法官对网民舆论“宣泄社会情绪”功能的理解与西方学者的理解并不相同。西方学者齐美尔、舒尔茨等人有关社会冲突的观点以及中国古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思想，其中都隐含着—个内在的逻辑链：社会不公导致社会不满，社会不满需要得到表达，掌权者通过了解民众表达出的不满，来调整社会政策以消解社会冲突。但在法官群体看来社会情绪得到宣泄，并不意味着社会冲突能够得到缓解。问题“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有利于宣泄社会情绪”与问题“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之间没有相关性。

二、法官对媒体舆论“联系社会”功能的评价

在中国，媒体“联系社会”的功能并不被公众所熟悉，更从未在官方文件中出现。但这不代表中国媒体不能发挥“联系环境”的功能。

1 如何理解中国语境下媒体舆论的“联系社会”功能

所谓的“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种对社会的联系；而所谓的“引导舆论”，则是在辅助公权力规范社会行为，实现社会控制，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语境下媒体的“联系社会”功能，可以被理解为—种“上下沟通”的功能。

为了便于法官理解，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媒体的“联系社会”的功能描述为“媒体报道有利于执政党了解民情民意”和“媒体报道一般能发挥良好的舆论引导功能”。前者在中国学术语境和政治语境中是—种对媒体“下情上传”功能的描述，但如果站在经典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立场来看待“下情上传”，就是媒体为执政者也就是公权力来联系社会，向上传递民意，对下沟通政策；后者在中国学术语境和政治语境中是—种特殊的媒体功能，但如果站在经典传播学

经验学派的立场来看待“舆论引导”，也可以解释为媒体帮助政府来联系社会，实现上情下达。

2. 法官对媒体“联系社会”功能的评价

大部分的被调查法官认为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有利于执政党了解民情民意，并有利于正确引导舆论。前者代表着法官对媒体“下情上传”功能的认可，后者则代表着法官对媒体“上情下达”功能的认可。具体频数分布如表 10 和表 11 所示。

表 10 法官对媒体“下情上传”功能的评价

媒体报道敏感案件 有利执政党了解民意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非常同意	29	7.6	7.6
	比较同意	195	51.2	51.3
	说不清	110	28.9	28.9
	不太同意	32	8.4	8.4
	很不同意	14	3.7	3.7
	有效样本	380	99.7	100.0

表 11 法官对媒体“上情下达”功能的评价

媒体报道敏感案件 有利正确引导舆论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非常同意	18	4.7	4.8
	比较同意	171	44.9	45.5
	说不清	127	33.3	33.8
	不太同意	53	13.9	14.1
	很不同意	7	1.8	1.9
	有效样本	376	98.7	100.0

总体而言，法官群体对媒体发挥“上下沟通”作用是认可的；但通过表格也可以看到认可媒体能反映民意的法官要多于认可媒体能引导舆论的法官，也就是说认同媒体“下情上传”功能的法官要多于认同媒体“上情下达”的法官。有过半数的法官对媒体能否发挥引导舆论功能持“说不清”的态度。

3 影响法官对媒体“联系社会”功能评价的原因

首先,那些不认为媒体是因为引导舆论而报道敏感案件的法官,大多数都“说不清”或“不同意”媒体舆论能否发挥引导舆论的社会功能。认为正确引导舆论并非媒体报道敏感案件重要原因的法官有189位,其中131位即69.3%不认为媒体报道有利于引导舆论,具体而言持否定态度的为46位,持“说不清”态度的为85位。认为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重要原因就是引导舆论的法官有187位,其中131位即70%“比较同意”甚至“非常同意”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有利引导舆论。

其次,那些否认网民立场会影响媒体立场的法官,会倾向于认同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有利于引导舆论。“很不同意”和“不太同意”网民立场会影响媒体立场的被调查法官有55位,其中“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有利引导舆论的有40位,占72.7%。

以上数据说明,被调查法官之所以对媒体能否引导舆论持质疑态度,其原因就在于其对媒体报道立场的认知。如果法官认为媒体立场与网民一致,就会倾向于认为媒体难以实现“上情下达”的传播功能。从逻辑上推论,是否认同媒体的公权力背景,仍然是法官认同媒体“上情下达”功能的主要原因。

4. 法官对媒体“联系社会”功能评价的影响

倾向于认同媒体“联系社会”功能,尤其是认同媒体“上情下达”功能的法官,会倾向于认同媒体报道能够缓解社会冲突的观点。“媒体报道敏感案件有利于执政党了解民情民意”和“媒体报道有利于引导舆论”这两个陈述都与“媒体报道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肯德尔相关系数值分别为0.339和0.497。从系数值来看,“媒体报道有利于引导舆论”与“媒体报道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的相关性更强,透过交互分析来看相关性的具体呈现(见表12)。

表12 法官对媒体舆论“联系社会”功能与
缓解社会冲突功能的评价交互分析

		媒体舆论有利缓解社会冲突			总数
		不同意	说不清	同意	
媒体舆论 有正确 引导舆论	不同意	66.7%(40)	21.7%(13)	11.7%(7)	100.0%(60)
	说不清	18.9%(24)	67.7%(86)	13.4%(17)	100.0%(127)
	同意	11.1%(21)	25.9%(49)	63.0%(119)	100.0%(189)

$$N = 376, X^2 = 164.845, df = 4, p = 0.000$$

既同意媒体舆论有利引导舆论又同意媒体舆论有利缓解社会冲突的法官为 119 位,占被调查法官有效比例的 31.6%。而对两个观点都持反对意见的法官仅为 40 位,占被调查法官有效比例的 10.6%。

法官对媒体“联系社会”的功能越认可,就越信任媒体对社会冲突的缓解能力。媒体作为民意的代言人,可以通过理性、客观的报道方式使公权力了解公众的权利吁求;同时又可以作为公权力的“喉舌”,将公权力的作为报道给公众,消除现阶段公众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从而缓解社会冲突。

本章小结

法官对网民舆论有信任之困,对行政权支持下的舆论有信任依赖,这是本章最重要的分析发现。

本章的分析表明,在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对网民舆论社会功能的评价和对媒体舆论社会功能的评价出现了差异。更多的法官相信媒体具有监督司法、缓解社会冲突以及联系社会的功能。一位法官如果倾向于肯定媒体具有官方背景,就倾向于肯定媒体缓解社会冲突以及“联系社会”的功能。

数据分析还显示,法官对网民综合素养、影响力的评价,影响到了法官对网民舆论社会功能的评价。一旦法官认为网民缺乏良好的传播素养和法律知识素养,就倾向于认为网民舆论无法承担起监督司法、缓解社会冲突以及联系社会的重要社会功能。

综合看来,法官对于舆论的社会功能,特别是网民舆论的社会功能出现了信任之困,他们无法肯定舆论对敏感案件的关注是否能起到监督司法、缓解社会冲突以及联系社会的功能。但是,不少法官对于行政权以及行政权管辖下的媒体舆论有着信任依赖,一旦法官认为媒体是出于引导舆论的官方目的来报道敏感案件,他们就会倾向于肯定媒体舆论的社会功能。

法官的信任之困和信任依赖,体现了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社会功能评价的特点。



法官应对敏感案件 舆论的行为意向

在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会如何应对敏感案件舆论?这是本章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从调查结果看,多数被调查法官非常重视审判的社会效果,并认为法官有通过司法审判梳理司法公信力、缓解社会冲突的责任和义务。如果采纳舆论意见可以缓解社会冲突,多数法官都愿意在司法审判中采纳舆论意见。对数据的分析显示,法官的信任之困和信任依赖,影响到了法官应对敏感案件舆论的行为意向。多数法官在同等条件下,更愿意采纳媒体意见而不是网民意见。在理论层面上,本章的分析再次证明了社会冲突因素对法官舆论态度的影响,因为多数法官都认为需要将“缓解社会冲突”作为一个重要的应对敏感案件的行为依据。

第一节 法官重视敏感案件审判的社会效果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法官都重视敏感案件审判的社会效果。而他们重视审判社会效果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司法审判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冲突的解决、社会价值判断体系的建立以及司法公信力的重建。

一、法官重视敏感案件审判的社会效果

1. 何为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

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是对应于司法审判法律效果的概念。学者对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内涵多有讨论和争议。但总体而言,学者和司法工作人员都能认可的是,司法审判的法律效果是指“通过严格适用法律来发挥依法审判的作用和效果”,而社会效果则是“通过审判活动来实现社会的秩序、公正、效益等基本价值的效果”;对于大多数法官而言,“法律效果是法院审判对法律规范和立法精神所体现的立法正义的实践程度,也就是是否严格依据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审判,社会效果是法院审判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实质影响。”^①

理想状态下,司法审判只要实现了法律效果,就能实现社会效果。因为人类

^① 张伟强:《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法官应追求什么》[J],《法律方法》,2009,8: 225

社会选择法治的原因,就是法律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正义,法律能够裁决纠纷,正确分配冲突各方利益,保证社会运行的公正、公平。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人的理性有限及语言的有限,法律不可能捕获现实世界的所有复杂情形。因此当法律面对事实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法律模糊(有多种解释)、法律空缺(无相关规则)及法律与正义严重冲突的现象”^①,单纯强调司法审判的法律效果,并不一定能实现社会正义的最终目标。另外,司法审判本身不仅是单纯的法律责任的判断,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可能造成一系列社会影响的司法决策。因此,保证司法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中国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强调的工作原则。多数法官也能在司法过程中统筹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有机的平衡。

2. 被调查法官重视敏感案件审判的社会效果

绝大部分被调查法官对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都很重视。有318位即84.1%被调查法官认为对敏感案件的审判需要考虑到社会效果,社会效果非常重要。具体频数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法官重视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

司法审判是否需要考虑社会效果		频数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需要,社会效果非常重要	318	84.1
	不太需要,社会效果不太重要	55	14.6
	不需要,社会效果完全不重要	5	1.3
	有效样本	378	100.0

无论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特点、成因和社会功能持何种态度,大多数法官都认为审理敏感案件时,社会效果是需要被考虑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整张问卷中,能使80%以上法官持同样观点的陈述并不多。其中“网民一般同情涉案的弱势群体”、“网民一般对法官抱有不信任感”和“涉及干群冲突的案件容易引起网民讨论”是令被调查法官最为同意的三个陈述,对两个陈述持同意观点的法官分别占被调查法官总数的90.3%、87.1%和80.2%。

以上数据表明绝大多数法官对当前社会冲突尖锐程度以及司法必须面对尖锐社会冲突的清醒认知。在学者看来,“人们如何认识社会冲突,一定程度上就

① 张伟强. 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法官应追求什么[J]. 法律方法, 2009, 8: 225

构成了如何看待和安排法律的根据。法律内容、功能负载和目标指向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法律所在的该社会阶段关于社会冲突的理论和时间。同时,关于法律的定位、设计、安排也塑造、影响着社会冲突的发展样态。”^①对此,被调查法官也有着类似的认知。被调查法官对为什么需要重视敏感案件审判的社会效果,作出了自身的解释。其主要逻辑也是,法律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最基本手段,不仅要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断,更要从现实层面上保护合法权益的获得和保证法定义务的履行。

二、法官重视司法审判社会效果的原因

多数法官都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冲突问题突出。认为目前社会冲突问题并不是非常突出的法官仅有20位,占被调查法官总数的5.3%。

事实上,从前文的分析也已经看出法官认为公众之所以讨论敏感案件的原因,就在于当前社会积累了过多的不公平感。

1. 法官倾向于在司法范围内缓解社会冲突

公众对权力腐败的不满,表现在敏感案件中就是对司法机关的严重不信任。2010年年底发生的钱云会案就是典型的例证,公众始终怀疑钱云会案并非简单的交通事故案件。由学者、记者以及其他各方人士组成的公民调查团在作出钱云会案只是交通肇事案的结论之后,同样受到了公众的质疑。钱云会案的公开审理,是在2011年农历春节前一天。司法机关急于在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前使钱云会案尘埃落定,正说明司法机关以及行政部门对公众不满情绪的清晰认知。“从1993年至2003年10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由1994年的1万起猛增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5倍之多。《瞭望》新闻周刊也披露,群体性事件持续上升,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则超过9万起。而从近几年的媒体报道中看,群体性事件的上升势头并未得到有效缓解,仍然保持着多发态势。”^②所谓群体性事件,指的是“部分社会成员为解决同一要求和达到各自利益,在不满情绪驱使下产生的聚众性对立行为。这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特殊表现形式。行为人通常由自发到有组织的串连起来,并以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能够给党委和政府造成巨大压力,如请愿、示威、游行、静坐、罢工、罢课等形式,迫使党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尽快解决问题。对已出现的矛盾在初始阶段得不到有效

① 赵树坤. 社会冲突与法律控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29.

② 林琳. 群体性事件: 审视与反思[J]. 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2010(6).

处置和解决,致使对立情绪增加,行为激化,达到临界点后就会发展成超越法律约束的群体性越轨行为。”^①

社会矛盾突出如果不加以解决,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就可能导致科塞所说的“爆炸性”变革。这显然是法官群体所不乐意看到的。对于大多数法官而言,重视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是为了缓解社会冲突,使敏感案件中涉及的社会冲突问题能在司法范围内得以解决。

2 法官认为注重审判的社会效果有利缓解社会冲突

有 287 位被调查法官认为,处理好敏感案件的社会效果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同时被调查法官群体对法官职业责任感的认知非常强烈,只有 26 位被调查对象认为法官没有解决社会冲突的义务;另仅有 30 位法官认为审判的社会效果可以由宣传部门或其他机关协调解决。

对于如何处理敏感案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关系的问题,有 99 位法官认为有时重视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会影响法律效果,但多数法官——62.6%的被调查法官都认为重视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与重视法律效果并不矛盾。而这也是他们为什么选择应该重视敏感案件审判社会效果的重要原因。

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归根结底而言是指司法审判的结果能够为社会多数公众所接受。在正常情况下,只要司法做到公平公正,屏蔽权力寻租,就应该同时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为什么在法官看来敏感案件审判的社会效果较一般案件更为重要,是因为敏感案件涉及当前中国敏感的阶层冲突问题。能在司法范围内解决敏感案件,弥合公众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是法官的职责所在。前文已经分析,多数被调查法官群体认为受到网民言论影响的敏感案件的结果 80%以上是公正的,这也说明被调查法官群体中多数认为重视敏感案件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并不矛盾的观点,在逻辑上是顺理成章的。

分析“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钱云会案”等典型的敏感案件,司法审判要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前提就是取信于民,而取信于民最好的方式则是司法公开。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是极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当公众的质疑得到回应、司法审判过程完全公开,一些伴随敏感案件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才能得以平息。另一方面,司法审判要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其关键是重视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并防止强势群体利用权力寻租逃避法律责任。明代海瑞曾就诉讼原则做出这样的论述:“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

① 卢建江,曹大勇.群体性事件的透析与防处对策[J].公安论坛,1996(4)

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界威逼,无所不为。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这样的论述被现代学者阐释为法律上的"海瑞定理",包括公平定理和差别定理。所谓的差别定理就是在经济资产的两可案件中,无法明晰的产权应配置给经济资产缺乏的人。进一步抽象而言,在涉及权利无法转让的两可案件中,司法应选择社会损失最小的判决^①。这也就是说,即便从法律功利主义出发,司法重视社会效果,保护弱势群体利益,防止权力寻租都不仅能够达成追求"正义"的理想,也能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边际效益最大化。法官选择重视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其目的是为了缓解社会冲突,其中就包含一个国家公权力必然的功利选择:避免社会因发生"爆炸性"变革而损失巨大的资源。

3 法官期望通过司法审判确立社会正义的价值判断体系

57.1%的被调查法官认为,司法审判会影响社会整体的价值判断。同时分别仅有30位和38位被调查法官认为司法案件的审判一般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对法官的要求不能过高。

敏感案件不仅事关当事双方的利益冲突,更事关当事双方所属阶层的利益冲突。如果司法机关不能在审判过程中体现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不仅会加深普通公众的相对剥夺感,更会使公众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去寻找权力寻租的机会,导致社会资源不断集中,社会无法实现扁平化,社会冲突一触即发。2011年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显示,两成多的城市居民以公务员作为职业的首选。"这一结果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公务员群体的艳羡,工作稳定、收入高、社会保障充足、有更多踏入仕途的机会。但同时,也应意识到人们将工作目标定位于安稳地获得优厚报酬,缺乏锻炼能力、施展才华、成就事业、利泽整个社会的考虑。这会影响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②

如果公务员阶层、富裕阶层以及其他强势阶层在司法审判中始终占据有利地位,那么社会公众就会倾向认为司法对弱势群体的救济极为有限,所谓权利救济指的是在权利受到侵害后采取的补救措施的总称,它既表现为对权利的保护也表现为对侵害者的惩罚^③。在司法对权利救济不力的情况下,公众会转而寻求其他权利实现的路径,这就包括:其一,公众通过寻租活动得到强势人群的支

① 苏力《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6).

② 李瑞英《中国社科院发布2011年社会蓝皮书》,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2/16/20/191190_78790190.shtml

③ 陈焱光《公民权利救济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2.

持；其一，公众通过群体性事件等方式来反映对社会的不满。

在社会冲突论者看来，社会冲突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正功能，尽管这与结构功能主义论者的观点相距甚远；但从根本目的来看社会冲突论者并不是要塑造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而是希望通过不断社会冲突，来使社会保持进步，使社会在不断变化中寻求最理想的资源分配方式。司法审判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正视冲突并解决冲突的过程，被调查的多数法官期待通过良好的审判社会效果，来为整个社会树立正义的价值判断，这与西方冲突论学者的观点并无根本上的差异。

4. 法官期待司法机关重建公信力

有225位即59.7%的被调查法官提出：重视审判的社会效果是因为司法机关需要树立良好形象，取信于民。仅有67位被调查法官认为公众尤其是网民对案件缺乏专业知识，没有必要盲目迎合公众。以上数据可以说明，取信于民，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多数被调查法官强调审判社会效果的重要原因。87.1%的被调查法官认为公众一般对司法抱有不信任感，因此期望提升司法公信力，在逻辑上而言这也是这些法官一种自然的选择。

2009年8月，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的沈德咏在全国法院法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专题研讨班讲话时提出：“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①司法需要取信于民的思想，可见是中国司法体系从上到下的共识。有学者认为：“民众对司法不信任的根本原因，集中体现于‘三不’问题，即司法不公、司法不廉与司法不力”，“社会效果的要求，也是法律本身的要求，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依法办案本身就是对社会效果的尊重。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和大小，是确定犯罪是否成立、刑法处理轻重的关键。讲法律效果，本身也是讲社会效果”。^②

被调查法官们的选择与学者的观点相互呼应，说明了当今社会司法取得公信力与重视社会效果以及法律效果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第二节 法官应对敏感案件舆论的行为意向

84.1%的被调查法官都认为应当重视敏感案件审判的社会效果，而社会效果良好，一般都需要审判结果令社会公众满意。既然围绕敏感案件的舆论已经清楚表达了公众的权利吁求，那么法官会否因为对社会效果的重视，而在未来的

① 司法要追求看得见的公正，见 <http://news.163.com/09/0819/14/5H3B9CR60001124J.html>。

② 龙宗智，重建民众对司法的信任感，当前司法的难题及应对[N]（OL）南方周末，2010-7-15，见 <http://www.infzm.com/content/47673>。

审判过程中考虑到网民意见和媒体意见呢?中国社会冲突问题并不局限于一地一事,就过往受到舆论热烈讨论的敏感案件而言,它们的发生地分布在全国各个省份,直接面对激烈社会冲突的就是基层的一线法官。本次被调查的法官中,在未来也很有可能面对舆论的考验,他们对自身行为的预测正可以帮助人们分析未来司法与舆论关系的走向。

一、法官应对网民舆论的行为意向

问卷使用以下几个问题,考察被调查法官是否会在未来可能的司法审判中考虑网民的意见:采纳网民意见可以缓解社会冲突的情况;网民意见缺乏法律知识,但符合法律精神的情况;网民意见不理性,但能体现正义追求的情况;网民意见受到上级领导机关重视的情况。

问卷为这四个问题设计的答案包括“一定会考虑”,赋予分值5;“很有可能考虑”,赋予分值4;“可能考虑”,赋予分值3;“不太可能考虑”,赋予分值2;“一定不考虑”,赋予分值1。四个问题的均值得分分别为3.52、3.24、2.95和3.40,可以说均值得分都比较靠近平均分3分。这是因为很少有法官对问题中的情况表示“一定考虑”,过三分之一的法官都以“可能考虑”来回答上述问题,同时极少的法官对问题中反映的情况表示“一定不考虑”。

1. 缓解社会冲突是法官最重要的行为依据

最多的法官表示在“采纳网民意见可以缓解社会冲突”时,“一定考虑”和“很有可能考虑”采纳网民意见(见表2)。

表2 网民意见可以缓解社会冲突情况下法官的行为意向

网民意见可以缓解社会冲突		频数	有效百分比
法官 行为 意向	一定考虑	56	15.0
	很有可能考虑	117	31.3
	可能考虑	166	44.4
	不太可能考虑	34	9.1
	一定不考虑	1	.3
	有效样本	374	100.0

前文已经叙述,即使从法律功能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角度考虑,司法审判通过灵活性原则也会对公众的权利吁求做出回应,这也是多数法官之所以强调司法

审判社会效果的重要原因。但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法官们的反应仍然是非常审慎的。即便是采纳网民意见能够缓解社会冲突,绝大多数法官都不愿表示一定考虑。司法审判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行为,尽管缓解社会冲突是绝大多数法官都期望达成的社会效果,但如何将网民的意见适用于具体的法律事实仍然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通过频数分布表也可以看到,坚定地排斥网民意见的法官为数极少,这使该题的均值得分较高。总体而言,绝大多数法官都表示在网民意见可以缓解社会冲突的情况下,会对其加以考虑。

通过 SPSS 相关分析,法官的文化程度、所处法院级别以及任职年限都不与法官是否考虑网民意见相关。这提示在当前的环境中,法官的综合媒体素养尚未得到系统的培训。另一个可以佐证这一结论的数据是,在面对“所在法院有没有设立专门的舆论应对机制”时,同一个法院的法官回答往往是相反的,即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这一情况普遍分布在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高院,只有最高院的5位被调查法官全部选择了“有”。从逻辑上分析法官对法院有没有设立“舆论应对机制”答案相互矛盾的原因有二:首先,法官对舆论应对机制有不同的理解;其次,法官对何为舆论应对机制不清楚;第三,法官不了解法院有没有设立所谓的“舆论应对机制”。单纯从问卷设计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可能缺乏相应的效度,但是它却能反映当前法官的综合媒体素养尚未得到系统的培训,相关法院也尚未建立健全为全体法官所熟悉和了解的舆论应对机制。从已发生的案例看来,敏感案件经网络和媒体曝光后,司法机关的反应往往比较迟缓,直到敏感案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影响的时候,司法机关才开始相关的信息公开工作,以回应公众和媒体质疑。因此,我们认为法院的舆论应对机制,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例行的信息公开制度。我们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法官都会经常使用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了解新闻信息,同时他们又具备良好的学历背景。他们对敏感案件舆论的特点、成因和社会功能都形成了自我认知。简单地说,法官对舆论的了解是法院建立舆论应对机制,建立例行信息公开制度的良好基础。司法机关如果能在公众发出质疑之前适当公开相关信息做到取信于民,其后续工作就更为主动,同时也可以有效防止司法腐败和权力寻租的发生。

司法系统本身没有建立完善的舆论应对机制,法官必须依靠个人判断力对具体案件作出相应判决,这对任何一个法官来说都是挑战,因此法官在面对网民意见时采取审慎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2. 法官在审判中考虑网民意见的其他行为依据

法官在“网民意见不理性,但却能体现正义追求”的前提下,对其意见可能的

采纳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网民意见单纯追求正义情况下法官的行为意向

网民意见不理性， 却能体现正义追求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行为 意向	一定考虑	23	6.0	6.2
	很有可能考虑	65	17.1	17.6
	可能考虑	163	42.8	44.1
	不太可能考虑	108	28.3	29.2
	一定不考虑	11	2.9	3.0
	有效样本	370	97.1	100.0

通过表5-3可以看到有119位法官表示在未来可能的审判中不予考虑不理性的网民意见，即使网民意见能够体现正义追求。SPSS 计算说明，法官作出这样的选择与自身学历、职务和所处法院级别都没有相关关系。人数较多的法官对不理性的网民意见说不的原因，可能在于首先法官认为仅凭正义追求就对某个法律事实作出评判是不符合复杂现实要求的；其次，网民的非理性言论带有浓郁的情感色彩，与审判“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要求甚远。相对而言，法官更容易接受的是与法律精神符合的网民意见，即便这种意见缺乏法律知识。

我们看到一定考虑和很有可能考虑符合法律精神网民意见的法官有135位，比一定考虑和很有可能考虑非理性网民意见的法官多57位；同时表示不予考虑符合法律精神网民意见的法官则仅有66位（见表4）。

表4 网民意见单纯符合法律精神情况下的法官行为意向

网民意见缺乏法律知识， 但符合法律精神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行为 意向	一定考虑	26	6.8	7.0
	很有可能考虑	109	28.6	29.5
	可能考虑	168	44.1	45.5
	不太可能考虑	60	15.7	16.3
	一定不考虑	6	1.6	1.6
	有效样本	369	96.9	100.0

综合两个陈述的法官选择结果，可以得出以下推论：首先在法官看来正义追求不等同于法律精神，其次，缺少法律知识不等同于非理性；第三，缺少法律知

识不等同于缺少法律精神。在多数西方法学家看来,正义(justice)是法律追求的最高目标,法律精神就是维护正义。那么为什么被调查法官会认为正义追求不等同于法律精神呢?在已进入法治化进程的中国,法官不可能认为不正义的法律是良法;所以法官认为正义不等同于法律精神的原因,从逻辑上只有一个:法律精神包含正义追求,但不仅仅包含正义追求,法律维护正义的方式与道德等维护正义的方式不同。非理性的网民言论有可能是追求正义的,但其诉求的方式可能超出了法律的范围,因此法官才会对非理性的网民言论持较为排斥的态度。从逻辑上倒推,法官认为理性本身也是法律精神的一部分。

网民缺少具体法律知识是社会常态,从调查结果来看,法官也并不要求普通公众掌握复杂细致的法律条文;法律精神才是多数法官认为公众在讨论敏感案件时必备的素质,这包括追求正义,也包括理性,包括不以道德的标准来看待司法审判。这样的分析结果,提示法官对法律专业化的高度认同,但也提示法官对理想的公众言论的高要求。

3. 受到行政权支持的网民意见容易为法官接受

前文已经分析,大多数法官都认为网民意见只有在受到上级领导重视的情况下才会影响司法。与此相对应的是多数法官都表示自己也将考虑那些受到上级领导重视的网民意见。两个陈述之间呈相关关系,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0.274(见表5)。

表5 网民意见受行政权关注的情况下法官的行为意向

网民意见受行政权关注		频数	有效百分比
法官 行为 意向	一定考虑	51	13.8
	很有可能考虑	106	28.6
	可能考虑	161	43.5
	不太可能考虑	45	12.2
	一定不考虑	7	1.9
	有效样本	370	100.0

两个陈述的相关关系和上表的频数分布显示,法官并不讳言中国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同时也不讳言未来在本职工作中也将选择尊重行政权的意愿。从以往案例分析,获得行政权关注的案件,都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涉案弱势一方的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同时网民也欢迎行政权关注敏感案件。从积极意义而言,普通公众对敏感案件的讨论能够引起行政权关注,并进而

发挥监督司法、促进权利救济的作用。但换一个角度,如果普通公众对敏感案件的讨论未能引起行政权关注,其对司法的监督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而从法官的角度而言,当司法独立只是相对于普通公众而存在,其权威性和公信力也会受到影响。司法的社会功能是仲裁者,在私权利与公权力发生冲突时也应如此。但是就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司法很难对公权力进行制衡,因此也就很难在私权利需要时给予其必要的救济。在普通公众而言,行政权、司法权更同为公权力的代表,司法不公往往是滥用行政权的结果。当敏感案件中当事一方是干部阶层、富裕阶层和其他强势阶层成员时,公众就会质疑其是否会采取权力寻租手段干预司法。

法官们选择考虑受到行政权重视的网民意见,再一次提示在中国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依附关系,也再一次提示缺少行政权的支持,公众对敏感案件进行讨论很难在操作层面上影响法官办案,过去是,未来也还将是。

二、法官应对媒体舆论的行为意向

问卷提出五种情况,考察被调查法官未来会如何应对媒体舆论:媒体意见代表大多数民众意见的情况;媒体传递上级党政机关意见的情况;采纳媒体意见可以缓解社会冲突的情况;媒体意见缺乏法律知识,但符合法律精神的情况;媒体意见只遵循道德标准,但能体现正义追求的情况。

1. 法官较为重视舆论合力

当媒体意见代表大多数民众意见,多数法官表示会在未来可能的案件审理中考虑媒体意见。我们将媒体和公众视为不同的舆论主体,因此当媒体意见和公众意见趋向一致时,我们认为会产生一种集合的力量,在此将其称为舆论合力,它对司法的监督力量要强于单纯以公众为主体的舆论和单纯以媒体为主体的舆论(见表6)。

表6 媒体意见代表多数民众意见情况下法官的行为意向

媒体意见代表多数民众意见		频数	有效百分比
法官 行为 意向	一定考虑	51	11.9
	很有可能考虑	106	35.8
	可能考虑	161	45.4
	不太可能考虑	45	6.1
	一定不考虑	7	.8
	有效样本	377	1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被调查法官群体较为重视舆论合力,这一陈述的均值得分
为 3.52,高于“媒体意见缺乏法律知识,但符合法律精神的情况”和“媒体意见只
遵循道德标准,但能体现正义追求的情况”的得分,这说明,当公众和媒体都对某
一敏感案件产生关注的时候,法官会对这一案件的审理更为重视。从以往案例
来看,当公众和媒体都对某一敏感案件产生关注的时候,这一案件一般都会产生
全国性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行政机关都会对该案件作出反应,因此法官
对舆论合力表示重视,在逻辑上是顺理成章的。

前文已经论述,考察法官是否会在未来可能案件中考虑媒体意见的问题,与
考察法官会否考虑网民意见的问题是互相对应的。这些问题之间呈现出两两正
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倾向于考虑网民意见的也会倾向于考虑媒体意见。

第一对两两相关的变量是:媒体意见能够缓解社会冲突的情况和网民意见
能够缓解社会冲突的情况,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 0.455;第二对两两相关的变量
是:媒体意见受到上级党政机关重视的情况和网民意见受到上级党政机关重视
的情况,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 0.530;第三对两两相关的变量是:媒体意见缺乏
法律知识但符合法律精神的情况和网民意见缺乏法律知识但符合法律精神的情
况,肯德尔相关系数值为 0.545;第四对两两相关的变量是媒体意见只遵循道德
标准但能体现正义追求的情况和网民意见不理性,但能体现正义追求的情况,肯
德尔相关系数值为 0.515。这些两两相关的关系,提示在法官看来媒体对敏感
案件的意见和公众对敏感案件的意见同属于舆论意见,媒体和公众都有监督司
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2. 多数法官更重视媒体意见而非网民意见

上述几对相关变量还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对变量之间都存在一个
均值差异。这个差异的指向是:倾向于考虑网民意见的法官会倾向于考虑媒体
意见;但倾向于考虑媒体意见的法官却不一定倾向于考虑网民意见。这通过四
对变量间的均值比较可以看出端倪。第一对,媒体意见均值得分为 3.64,网民
意见均值得分为 3.52;第二对,媒体意见均值得分为 3.55,网民意见均值得分为
3.40;第三对,媒体意见为 3.18;第四对,媒体均值得分为 2.99,网民意见均值得
分为 2.95。除了第三对,媒体意见得分低于网民意见得分之外,其他三对都是
媒体意见得分高于网民意见得分。这提示两个现象的存在,第一更多的法官重
视媒体意见,第二更多的法官对媒体意见的要求更高。

(1) 多数法官更重视媒体意见 第一对和第二对变量的均值差异,提示
更多的法官将在未来可能的审判中更重视媒体意见,我们通过简化后的交

互分析表来更直观地呈现这一问题,所谓简化指的是将持“很可能考虑”和“一定考虑”观点的法官群体合并为持“很可能考虑”观点的法官群体;将“不太可能考虑”和“一定不考虑”的法官合并为“不太可能考虑”的法官群体(见表7)。

表7 法官采纳媒体意见与采纳网民意见行为倾向的相关分析

		采纳网民意见可以缓解社会冲突的情况			总数
		不太可能考虑	可能考虑	很有可能考虑	
采纳媒体意见 可以缓解社会 冲突的情况	不太可能考虑	44.4%	11.1%	44.4%	100.0%
	可能考虑	14.4%	64.7%	20.9%	100.0%
	很可能考虑	2.5%	31.8%	65.7%	100.0%

$$N = 372, X^2 = 101.253, df = 4, p = 0.000$$

在网民意见和媒体意见都可能缓解社会冲突的情况下,很有可能考虑网民意见的法官有76.7%选择很有可能考虑媒体意见;而很有可能考虑媒体意见的法官则只有60%选择很有可能考虑网民意见。在同样可以缓解社会冲突的前提下,更多的法官选择考虑媒体意见而非网民意见,而缓解社会冲突是法官最期望达成的审判社会效果。结合前文几章的分析,已经看到法官认为在过去的审判过程中媒体意见较网民意见更受同行的重视,而通过上述分析,未来法官群体仍然会偏向于重视媒体意见而非单纯的网民意见。换句话说,网民意见在受到媒体重视并加以表达之后,对法官的影响将得到增强。

(2) 在行政权干预下,多数法官同样更重视媒体意见。在网民意见和媒体意见都受到上级党政机关重视的情况下,更多的法官会考虑媒体意见而非网民意见。

交互分析显示在网民意见和媒体意见都受到上级党政机关重视的情况下,很有可能考虑网民意见的法官有77.4%选择很有可能考虑媒体意见;而很有可能考虑媒体意见的法官则只有64.9%选择很有可能考虑网民意见。

前文分析,媒体的官方背景可能造成了法官对媒体权威性的认可。但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媒体作为一种组织,其发出的言论本身具有个人言论所不能具有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体现为对法官的影响力。以下描述可以解释媒体意见和网民意见在法官心目中不同的分量:一位普通公众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对某个敏感案件的质疑,法官通常不会注意;但当这篇博客被某个媒体发现并发表,则可能会引起法官的重视。这一方面说明互联网并非人们所

想象的那样让每个人都能成为“记者”，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前中国，组织仍然是比个人更能发挥社会作用的行动者。这提示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存在，如果权力寻租发生，私权利不能通过正常司法路径获得保护，又不能通过媒体组织对司法进行监督，单凭个人的努力就无法或很难对抗司法不公。

3 更多的法官对媒体法律素养的要求高于对网民的要求

四对相关关系中，唯一一对媒体意见均值得分低于网民意见均值得分的是“意见缺乏法律知识，但却符合法律精神”。作者认为这一对相关关系中，媒体意见得分低于网民意见得分，不是因为法官在整体上更重视网民意见，而是法官在整体上对媒体表达的要求要高于对网民表达的要求。

第二章中已有分析，多数法官都认为敏感案件舆论中媒体传播的信息比网民传播的信息更可信、更理性。法官能够接受普通公众不了解法律知识，但却可能难以接受媒体报道缺乏法律知识。

交互分析显示，在媒体意见和网民意见同样缺乏法律知识，但符合法律精神的条件下，很有可能考虑媒体意见的法官有 73.5% 也很有可能考虑网民意见；但很有可能考虑网民意见的法官中只有 61.9% 很有可能考虑媒体的意见。

上文已经分析，多数法官都更为重视媒体意见。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法官也会对媒体意见有更高的期许。从客观情况而言，媒体具有专业采访的记者队伍，不仅能够深入敏感案件的现场揭示事实真相；也能够求助法律专业人士揭示敏感案件的相关法律问题。我国司法审判无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媒体如果在向社会提供事实时缺乏法律知识，就有可能误导公众对司法问题的理解，从而导致司法与公众之间不必要的矛盾冲突。

1.3 第三节 法官对舆论管理的建议

结论中已经论述，一直以来，中国相关政策法规都不鼓励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敏感案件。可以说，既有规制对媒体舆论的管理是较为严格的。对此，接受调查的法官群体认为应该适当放宽对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限制，但对网民讨论敏感案件适当加强限制。

一、法官对舆论管理的建议

1. 法官有对网民舆论加强限制的管理建议

大部分法官认为应该适当限制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具体频数分布如表 8 所示。

表8 法官对限制网民言论的态度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无所谓	44	11.5
	完全无需限制	97	25.5
	应该适当限制	206	54.1
	应该完全限制	10	2.6
	总 数	357	93.7
			100.0

仅有极少数的法官认为需要对网民言论完全加以限制,相对而言,认为需要对网民言论进行适当限制的法官占被调查法官的大多数,同时还有 27.2% 的法官认为完全无需限制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可以说,部分被调查法官对公民的言论表达自由是持充分肯定态度的,但是,总体而言法官仍然对完全开放公众的自由讨论心存疑虑。

2 法官有对媒体舆论加强限制的管理建议

多数法官认为在新媒体出现后,应该适当放宽对媒体报道的限制,甚至完全放开对媒体报道的限制(见表9)。

表9 法官对新媒体出现后限制媒体报道的态度

互联网出现后应如何管理 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无所谓	42	11.0
	完全无需限制	50	13.1
	适当放宽限制	176	46.2
	更为严格地限制	98	25.8
	有效样本	366	96.1
			100.0

媒体不报道,网民会报道,媒体不评论,网民会评论,媒体作为同时担负监督司法和引导舆论职责的社会角色,如果不能接近司法,不能接近真相,不能批评腐败,就不能完成平衡权利 权力制衡的重任。

二、法官提出舆论管理建议的原因探析

法官将媒体和网民看做不同的舆论主体,并认为应适当放宽媒体对敏感案

件的报道,同时加强网民对敏感案件讨论的限制。法官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舆论管理建议?

1. 法官建议放宽媒体舆论限制的原因探析

数据显示,与“新媒体出现后应如何管理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这一问题相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肯德尔相关系数值 0.106;“媒体是影响司法审判最重要的因素”,肯德尔相关系数值 -0.152;“网民讨论和司法审判统一于社会正义”,肯德尔相关系数值 0.106。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法官建议放宽媒体管理的原因可能包括:

(1) 法官对媒体舆论社会功能的评价

如果法官对媒体舆论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特别是缓解社会冲突的功能,抱有信心时,就可能会建议放宽对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限制。

(2) 法官对媒体影响司法强度的评价

法官越是认为媒体是影响司法的重要因素,就越可能要求限制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如果法官认为媒体并非影响司法的最重要因素,就不太可能建议放宽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

(3) 法官对网民讨论敏感案件动机的认知

如果法官认为网民讨论敏感案件的动机是出于维护社会正义,他也会倾向于提出放宽对媒体限制的建议。从逻辑上分析,这部分法官也应该倾向于不对网民讨论敏感案件作出限制。

2 法官建议加强网民舆论限制的原因探析

数据显示,与“应该如何管理网民对敏感案件讨论”这一问题相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多数网民不了解事件真相”,肯德尔相关系数值 0.127;“网民缺乏法律知识”,肯德尔相关系数值 0.127;“网民舆论会直接影响法官的具体审判工作”,肯德尔相关系数值 0.131。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法官建议加强网民舆论管理的原因可能包括:

(1) 法官对网民综合素养的评价

那些同意网民很难了解事件真相的法官和那些同意网民缺乏法律知识素养的法官,其中大部分也认为应该适当限制,甚至完全限制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

(2) 法官对网民舆论影响向度的评价

那些同意网民舆论会直接影响法官具体审判工作的法官,其中大部分认为

应该适当限制,甚至完全限制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这也就是说,越是认为网民舆论会给司法审判造成实质性影响的法官就越倾向于认为要限制网民对敏感案件的讨论。

本章小结

在社会冲突语境下,大多数被调查法官都将“缓解社会冲突”作为未来应对敏感案件的行为依据。本章的分析证明了社会冲突因素对法官舆论态度的影响。

在大多数法官看来,重视审判的社会效果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树立司法机关的良好形象以及建立社会正义的价值判断体系。

相对网民意见,法官更为重视媒体意见。在同等条件下,更多的法官选择接受媒体意见,而不是网民意见。在法官群体看来,如果网民和媒体的意见能够得到行政权的支持,那么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就会大大增加。

对于未来的舆论管理,多数法官建议适当放宽对媒体舆论的限制,同时适当增强对网民舆论的限制,这与法官将媒体和网民看成不同的舆论主体,并对媒体舆论和网民舆论有不同的评价有关。

法官的自我身份认同可能也是导致法官不愿接受网民意见,而更愿意接受媒体意见的原因。前文已经分析,法官认为对司法影响最大的因素并非舆论,舆论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网民言论都只能在心理层面上影响法官审案。而舆论若要在实际层面上影响司法审判,其前提是获得行政权的关注。法官并不讳言在中国司法权依附于行政权的现状。法官也并没有将司法看做整个公权力体系之外的另一种权力机关。法官的自我身份认同不仅是职业上的,同时也是行政归属意识上的。媒体作为一种和公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舆论主体,令法官有更多的舆论安全感,在同等条件下,法官宁取媒体意见而非网民意见,这与法官认同媒体的行政属性相关。

中国的审判制度是法官同时负责事实的甄别和对事实进行法律适用,这一制度在赋予司法权威的同时,也将公众阻隔于司法之外。中国的司法独立,在更大意义上是相对于公众的,而非相对于行政权的。



法官在社会冲突中的 “信任之困”及应对

通过考察在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成因的认知、对舆论主体的认知和评价,对舆论社会功能的评价以及应对舆论的行为意向,我们认为可以用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来概括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特征。“信任之困”,是指法官对舆论的信任出现了困难,法官既难以完全信任舆论主体的传播素养和法律知识素养,也难以完全信任舆论所具有的监督司法和缓解社会冲突的社会功能。法官的“信任之困”,给未来舆论和司法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问题。从社会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出发,我们认为法官可以重新认识社会冲突的正功能,通过司法公开重建舆论和司法间的互信,从而消除“信任之困”带来的问题。

一、法官在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

法官对舆论和司法关系的泛政治化认知,使法官极为关注社会冲突的解决问题。法官意识到舆论对敏感案件的关注与日益严峻的社会冲突问题相关,因此,只要采纳舆论意见能够缓解社会冲突,多数法官都倾向于在司法审判中采纳舆论意见;但是,由于法官对舆论缓解社会冲突的功能并不信任,他们在未来的司法审判中采纳舆论意见的可能性并不大。同时,法官群体对舆论主体特别是网民的法律知识素养也不信任,这使得他们要求加强对网民舆论的管理,用以保证司法审判的相对封闭性。

(一) 法官的“信任之困”

法官的“信任之困”主要表现在对网民舆论的信任之困上,在网民舆论和媒体舆论之间,法官对媒体综合素养以及媒体舆论所发挥的社会功能都有较高的评价。

1. 对舆论主体综合素养的“信任之困”

通过分析法官对舆论主体的认知和评价,就可以发现,法官对舆论主体特别是网民的综合素养不能完全信任。有 82.4% 的法官不能相信网民了解有关敏感案件的真相,有 62.5% 的法官认为网民缺乏法律知识素养。

通过相关性分析还能看到,法官对网民综合素养的信任之困有可能影响到

了法官的舆论管理建议。那些不相信网民能够了解事件真相的法官,多数倾向于适当加强对网民舆论的限制。

2. 对舆论社会功能的“信任之困”

第五章分析了法官对舆论社会功能的评价,多数法官对舆论是否能够发挥缓解社会冲突的功能持怀疑态度。有三分之一的法官都表示他们“说不清”舆论是否具有缓解社会冲突的作用。

从相关性分析中,我们也已经了解到导致法官对舆论社会功能产生“信任之困”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舆论主体讨论敏感案件的动机以及舆论主体综合素养的“信任之困”。只有那些认为舆论主体是因为维护社会正义、倡导社会公平、担心司法腐败而讨论敏感案件的法官,以及那些认为舆论主体具有较高传播素养和法律知识素养的法官,其中大部分才会倾向于肯定舆论具有“缓解社会冲突”的功能。

3. 法官的“信任偏向”和“信任依赖”

法官的信任偏向是指在网民舆论和媒体舆论之间,更多的法官偏向于信任媒体舆论。法官的信任依赖是指当舆论获得了行政权的关注和支持,就能获得多数法官的信任。

(1) 法官的“信任偏向”

法官对媒体舆论的信任偏向,主要表现在更多的法官信任媒体的综合素养和媒体舆论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这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都有详细论述。同时,更多的法官也认为总体而言,相比较于网民舆论,媒体舆论是对司法影响更大的因素。由于在前文没有对这一点做详细论述,这里将频数分布表列出(见表1和表2)。

表1 法官对媒体舆论司法影响力的评价

媒体舆论是否影响司法的重要因素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	27	7.1	7.2
	比较有影响的因素之一	217	57.0	58.0
	有影响但影响不大的因素之一	105	27.6	28.1
	影响极小的因素之一	25	6.6	6.7
	有效样本	374	98.2	100.0

表2 法官对网民舆论司法影响力的评价

网民舆论是否影响司法的重要因素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法官 态度	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	14	3.7	3.7
	比较有影响的因素之一	175	45.9	46.7
	有影响但影响不大的因素之一	157	41.2	41.9
	影响极小的因素之一	29	7.6	7.7
	有效样本	375	98.4	100.0

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法官在相同条件下,愿意在未来可能的审判中考虑媒体意见而非网民意见。尽管互联网可能真的已经形成了一个人人可以参与的公共领域,但这一公共领域如果不通过媒体,就很难形成对司法的影响力。

(2) 法官的“信任依赖”

无论是网民舆论还是媒体舆论,只要获得了行政权的关注和支持,就能够对司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是多数法官的认知。

法官对于行政权的信任依赖,其实也体现在法官对媒体舆论的信任偏向当中。在不少法官看来,媒体具有网民所不具有官方背景,媒体更容易受到行政管理特性,使法官认为媒体所发布的信息是更具有权威性的,也因此是更为值得信任的。

法官的信任偏向和信任依赖,提示了我国的舆论和司法互动是在一种特殊的权力结构中进行的,行政权对舆论和司法关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 社会冲突与法官的信任之困

当私力救济作为一种普遍性社会现象从人类文明史中消失后,诉讼便成为遏制和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有了法律的评价,一些严重的社会冲突就能得到控制和消除。然而不是所有的社会冲突都能置于法律评价之下,那些源于社会结构失调产生的深层次社会冲突比如贫富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官民群体间的心理冲突,理应依靠政治这一专司分配权力和财富的系统去解决。在理想状态下,司法系统不应承担政治系统的角色,法官也不应承担解决深层次社会冲突的角色,但是现实情况下,法官却自觉承担起了解决社会冲突的重担。在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面临着泛政治化的角色挑战,他们对舆论社会功能的评价也有了独特的标准。在这样的标准下,法官的“信任之困”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 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面临着特殊挑战

敏感案件从表面上看只涉及个体冲突,但深层次上却涉及群体冲突。当前中国社会的分层问题日渐凸显,公众的相对剥夺感加深,其阶层归属意识也向下偏移。而分配不公、权力腐败等问题,更使公众产生对强势阶层以及权力机关的不满。敏感案件的当事双方分属不同群体,公众一般会关注强势群体有没有使用权力寻租导致司法对弱势阶层的不公。

因此,法官在解决个体间冲突作出法律评价的同时,也是在对群体间冲突作出间接评价。在不少公众看来,司法对诉讼中弱势一方的救济,也代表司法对其所在群体权利的认定和尊重。相反,如果司法对敏感案件的处理不当,一个普通的敏感案件就会引起社会不满,从而诱发群体性事件,案件中的个体冲突转化为社会中的阶层冲突。

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的审判工作面对着特殊的挑战,那就是在解决个体冲突的同时,要避免社会群体冲突的发生。正是这样的挑战,使法官的自我角色定位出现了泛政治化的特点。多数法官都认为司法体系应挑起缓解社会阶层冲突的重担。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到,多数法官不仅将自己当成单个案件中个人冲突的解决者,更将自己视为深层次社会冲突的解决者,自觉承担起了政治官员的职责。

2 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舆论态度的泛政治化特点

在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不仅对自我的角色认知出现了泛政治化的特点,法官对舆论的态度也出现了泛政治化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法官对舆论社会功能的评价标准和应对舆论的行为意向都出现了泛政治化的特点。

前文的数据分析已经充分说明,法官在社会冲突问题严峻的背景下,非常重视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如果采纳舆论意见可以缓解社会冲突,他们也愿意在未来的审判中采纳舆论意见。这也就是说,舆论能否缓解社会冲突成了不少法官应对舆论的重要行为依据和行为标准。对这些法官来说,评价舆论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就是舆论能否缓解社会冲突。

3. 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信任之困”可能带来的问题

在一般语境下,法官对舆论的“信任之困”可能不会带来诸多问题;但在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对舆论的“信任之困”则可能会导致司法公开困难以及舆论和司法关系复杂化与紧张化等问题。

(1) 深度的司法公开难以实现

司法公开的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让司法与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等行为绝

缘。我们所指的深度公开,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司法的主动公开,第二层意义是司法公开内容要深化到司法规则、司法程序和审判结果。司法深度公开意味着舆论和司法间的关系从“监督、被监督”走向“监督和要求监督”,从“影响、被影响”走向“接近和给予接近便利”。从数据分析来看,这样的司法深度公开在较长时间内还难以实现。尽管媒体报道在未来可能获得较过去稍宽松的司法环境,但这只会是司法被动公开的结果。

尽管多数法官都认为在采纳舆论意见可以缓解社会冲突的前提下,在审判中就很有可能采纳舆论意见;但事实上法官对舆论缓解社会冲突的功能是不信任的,在法官对自我角色认知泛政治化的情况下,当一个法官无法明确允许舆论讨论司法案件是否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就可能是放弃主动公开和深化的内容公开。

(2) 舆论和司法关系复杂化与紧张化

法官对舆论“信任之困”和对行政权的“信任依赖”提示,在社会冲突语境下舆论和司法关系可能复杂化和紧张化。

因为对舆论主体综合素养以及舆论社会功能的不信任,在舆论未能引起行政权关注的时候,法官难以采取主动的司法公开,与舆论形成互动。舆论一旦引起了行政权关注,法官则会采纳舆论意见。

这样的过程,一方面会拖延司法应对舆论的时间,使舆论对司法的批评意见不断累积,造成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紧张化;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司法自身应对舆论的能动性,使舆论只能通过不断吸引行政权注意来影响司法,造成舆论和司法关系的复杂化。

同时,法官的信任偏向还提示,法官对网民也就是普通公众的法律素养和接近事件真相的能力“信任之困”尤为突出,法官因此强调需要对网民舆论进行适当的限制。这样一种思路,体现了以“堵”为主的舆论管理思路,也可能导致社会不满的累积,并最终造成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紧张化。

二、走出“信任之困”的舆论应对路径

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自觉承担起了缓解社会冲突的角色重担,他们担心舆论对司法案件的讨论会激发社会不满,无益于社会冲突的解决;他们担心舆论主体对案件真相不了解,对法律知识不熟悉,从而造成对司法审判的不当干预。但在当前,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发展,使社会的信息流通大大增强,对舆论采取简单的“加强限制”应对方法,无助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走出“信任

之困”，避免由“信任之困”带来的社会问题，需要采取新的舆论应对路径。

（一）敞开司法之门，提升舆论主体的综合素养

法官的“信任之困”，首先表现在舆论主体，特别是网民综合素养的“信任之困”。不少法官因为这样的信任之困，提出了以“堵”为主的舆论管理建议，那就是适当加强对网民舆论的管理。但事实上，除了“堵”，还可以通过开拓司法参与路径来提升舆论主体的综合素养，从而消解法官的“信任之困”。

1. 无须神化的法律和正义

法律的神圣来自其正义的追求，但法律和正义并非凡人不可触摸的神话。相反，法律和正义就是为凡人而铺设的通往理想社会的路径。多数被调查法官对舆论主体的法律知识素养，特别是其中的正义追求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更直接影响到了法官对舆论监督有效性和舆论监督能否缓解社会冲突的判断。

事实上，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在人无法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公正。法律是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中创造的维护正义的方法，法律真知的来源不是概念、理论的演绎，而是法律的实践和社会现实^①。在众多实行陪审团制度的国家中，未受过法律训练的普通公众而非法官才是判定被告人有罪无罪的裁决者。

在拉丁语中，法 *Jus* 同正义 *Justitia* 是同一词根。在美国，法官、司法、法庭与正义 *Justice*，都是同一词^②。拉得布鲁赫、丹宁勋爵等法学家和法学实践者更认为正义的价值超越法律，如果法律违背了正义的要求，就失去了法存在的意义，是为恶法，而公民有权抵抗恶法。

调查显示，多数被调查法官否认网民言论和法律同义于社会正义。被调查法官的学历水平，提示法官群体不可能认为法律的目标并非追求正义。那么让法官不同意民意与法律统一于社会正义的唯一理由就是：法官不认为公众理解正义、懂得正义、并在敏感案件的讨论中追求正义。

不能否认的是，网民舆论确实不能完全代表民意，围绕敏感案件形成的具有影响力的言论往往是由那些知识“精英”群体发出的，他们由媒体人、学界人士、自由撰稿人以及其他知识精英组成。一般网民可能确实没有这些知识精英所具备的政治自觉性，但是这些知识精英作为网民言论中的意见领袖，已经带动了中国网民或者说普通公众政治自觉性的提高。杭州飙车案中，网民思考的是今天被撞的是谭卓，明天被撞的就可能是张卓、李卓；邓玉娇案中，网民思考的是今天

① 苏力：《司法过程的性质——译者前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

② 郭道晖：《法理学精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192。

被定罪故意杀人的是邓玉娇，明天被定罪故意杀人的就可能是周玉娇、王玉娇；躲猫猫案中，网民思考的是今天被打身亡的是李养明，明天就可能是赵养明、孙养明。社会分层是中国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公众吁求平等、公正的呼声不再是一种自发的零散的声音，而是自觉的对正义的要求。

神话法律和正义，只会将舆论主体隔绝在司法大门之外，司法面临的难题——从解决个体冲突到解决社会冲突，就难以找到真正的答案。因此，在未来不再神化法律和正义，为舆论主体参与司法提供更多机会，是消除法官“信任之困”的路径之一。

2. 香港司法审判“陪审团”制度的启示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政策实施，表现在司法上就是香港采取“陪审团制度”。在香港，陪审团由普通市民组成，责任是根据案情作出事实的裁决；法官则负责向陪审团解释相关的法律，比如某种行为是否违法，向陪审团解释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并指出陪审团所需裁决的事实。法官负责法律问题，事实方面的裁决便交由陪审团决定。“这个制度一方面让社会人士来决定被告的行为是否可以接受，亦避免法官不食人间烟火以致判决完全和社会脱节”，“陪审团制度是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并透过公众参与执行公义而增加这程序的认受性。因此，这原则在基本法中亦受到确定。”^①

同时，香港司法审判实行“五比二”通过制，即“五比二”是刑事控罪中裁定是否罪成的最低比数。假如陪审团的意见是四比二，法院便得解散陪审团另组新的陪审团重审案件。当然，若有其他控罪成立，控方可能不会坚持重审。虽然四比二也是一个明显的多数意见，但因刑事案件涉及人身自由，香港司法审判要求最少有五比二的多数意见才能裁定罪名成立^②。

香港的司法实践提示，普通公众具有对被告人裁定有罪无罪的能力，同时法官与陪审团成员之间是互不干涉，但却相互信任的关系。尽管内地与香港的文化有一定的差异，公众受教育水平也各有不同，但这并不必然说明两地公众在充分理解法律条文的前提下，对案件的审判能力有高下之别。陪审团制度的基础是司法对公众的信任，并且置“正义”或称“社会良心”的价值于法律条文之上。香港及其他实行陪审团制度的地区对司法独立的维护，主要是预防陪审员而不是法官受到外在意见的干扰，其路径也并非禁止其他公众或媒体对敏感案件的

① 陈文敏. 法政敏感[M]. 香港：香港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22.

② 陈文敏. 法政敏感[M]. 香港：香港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21.

讨论和报道,而是避免陪审员和法官在审案前过度地接触媒体和舆论。

陪审团制度提示,公众具有判断某行为罪与非罪的能力。当然中国内地公众的司法素养有待提高,但公众对敏感案件进行讨论也并不需要被完全禁止,普通公众所代表的社会良心和正义是司法追求的核心价值。

3. 完善中国司法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的现象,使一些学者提出了废止人民陪审员制的观点,但迄今为止人民陪审员制度一直存在。从地位上说,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具有同“合议庭”法官同等的司法审判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一条规定:“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享有同等权利。”他们既可以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也可以对适用法律作出裁定。庭审中,陪审员可以与法官并肩坐在审判席向证人和当事人发问。这在香港等实行陪审团制度的地区和国家也不多见。

但中国的司法实践提示,目前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多作为一种“民主”的象征物,在刑事案件中对当事人作出“罪与非罪”裁定的都是具有职业资格的法官。陪审员与法官并肩问坐在更大意义上是理论层面的理想画面,而非真实的司法场景。1981年,就有法官指出人民陪审员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临开庭将陪审员请来,审判员向其简单地介绍一下案情,随即就开庭。陪审员既没参加调查,又没亲自阅卷,不真正了解案情,在审判庭上不便发问。二是平时对陪审员培养、训练不够,陪审员的政策、法律水平较差。有的放弃权利,充当‘演员’,听从审判员的‘编导’,有的虽能大胆发问,敢于提出个人的意见,但往往又不符合法律规定,说些‘外行话’,甚至闹出笑话。三是先内定后开庭,合议庭空有其名。开庭前,案件已在审判委员会上讨论并提出了意见,合议庭评议案件时,审判长只能设法使陪审员同意早已决定了的处理意见。这样,造成陪审员陪而不审,不能真正发挥作用。”^①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一直没能得到有效解决。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不为公众所了解和熟悉,中国内地的人民陪审员由各级人人任命,与香港等地随机抽取陪审员的制度不同。在香港,担任陪审员审理案件是居民的一项法律权利,也是一项法律义务。“原则上,任何年满21周岁至65周岁,精神健全、品行良好的香港居民都有可能担任陪审员,但盲、聋或无行为能力的人士以及语言程度不足的人士例外。此外,部分公职人员和特殊行业人士豁免担任陪审员,这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或立法会议员、太平绅

^① 那清江,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的现象应该改变[J],人民司法,1981(3)。

士、法官、律政人员、纪律部队人员、律师、外交人员、医生和神职人员等。符合条件的香港居民事先会收到高等法院司法常务官寄出的一份陪审员传票，内容大致为：某居民，现传召你在某年某月某日前往高等法院原诉法庭出任陪审员。你每天均须出席，直至法庭解除你的职责为止。传票一旦发出即具有法律效力。依据香港法律，任何被传召的陪审员无故缺席，或未经法官准许中途退席，即属于犯罪。”^①可以说，在香港陪审团制度是公众行使司法权也是了解司法、熟悉司法的重要途径；但在内地，公众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所知甚少，或者说知道有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公众为数就甚少，了解、熟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就更少。举例而言，在对敏感案件的讨论中，公众多要求案件公开审判，媒体报道庭审过程，但提及“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言论尚未被作者发现。

一般而言，陪审制度并非没有缺点，司法成本过大是其中一点。因此，不少采用陪审团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陪审员一般只出现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而非一般民事和刑事案件中。回到作者讨论的敏感案件，多数并非疑案、难案，而是涉及阶层矛盾的案件，其重大性不在于适用法律的难度，而在于适用法律能否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人民陪审员制度，使一批具有公信力的普通公众进入法庭，对消除法官的“信任之困”，缓解社会冲突应具有积极作用。

（二）积极回应质疑，实现“权利-权力制衡”关系

尽管公众对司法权以及行政权的不信任累积已久，其对敏感案件的讨论会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是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司法权以及行政权都需适应质疑的存在。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是司法首先信任舆论，通过积极回应舆论的质疑，建立一种以追求互信为目的的互动关系。

1. 积极回应舆论的质疑

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往往表现为对司法腐败问题的批评。多数法官都认为网民和媒体不了解案件真相，舆论对司法的批评往往建立在质疑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法官需要积极回应舆论质疑，在尊重公众质疑的基础上辨明事实，为建立互信的舆论和司法关系打下基础。

多数法官都意识到在敏感案件的讨论中，网民和媒体会站在当事者中弱势一方的立场上，质疑司法会否产生腐败，形成对强势群体的利益庇护。在围绕未决敏感案件形成的舆论中，可以经常看到网民以“屁民”自嘲，用“恨爹不成刚”式

^① 洪更强：香港的陪审员，见人民法院报官方网站 <http://old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75724>。

的戏谑表明对司法腐败问题的不满态度。很多时候,网民和媒体并不能给出司法腐败问题是否存在的明确证据,但他们通过对司法过程和审判结果的讨论表达出对司法腐败问题的不满。

这种不满表达,会对当事法官形成心理上的压力,但法官不能因此要求封闭舆论对敏感案件的讨论,而是需要增强与舆论间的互动,以事实来证明司法过程和审判结果的公正性。

2. 尊重公众的监督权

从托克维尔的“民主国家诞生更多的诗篇”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从弥尔顿“观点的自由市场”到丹宁勋爵的“公正高于一切”,这些论述都在指向在一个理想社会,一个公民权利得到最大实现和尊重的社会。事实上,这样的价值判断不仅来自这些闪耀人类历史的思想者,更来自现实中普通的个人。

公众的监督权是宪法性权利,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公权力机关都应该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如果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理念仍然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表现,而公权力机关主动接受监督则是现代国家必备之特色。

3. 帮助实现舆论和司法间的“权利-权力制衡”关系

“权利-权力制衡”,是学者们有关理想的舆论和司法关系的描述。“权利-权力制衡”强调舆论对司法的监督,认为公权力需要得到监督才能避免腐败和寻租现象的发生,从而保证司法公正。当然,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并不是不受约束的,我国已经有相关法规对媒体报道司法案件的行为进行了限制。

在社会冲突语境下,舆论和司法间的“权利-权力制衡”显得尤为重要。舆论对司法案件尤其是敏感案件的讨论,可以帮助法官和行政官员更好地了解民情民意,了解舆论和司法关系在哪里出了问题,并能及时加以修缮。

法官通过积极回应舆论质疑,尊重公众对司法的监督权,有利于这种“权利-权力制衡”关系的形成。

(三) 放宽管理,完善舆论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在科塞等社会冲突论者看来,社会冲突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正功能。通过社会冲突,社会可以不断审视自身的问题,在不断变化中寻求最理想的资源分配方式。司法审判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正视冲突并解决冲突的过程,被调查的多数法官期待通过良好的审判社会效果,来为整个社会树立正义的价值判断,这与西方冲突论学者的观点并无根本上的差异。

1. 舆论:一种“社会安全阀”

科塞认为,冲突对发生于其中的关系并不总是反功能,冲突经常是为维护这

种关系所必需的。如果没有发泄互相之间敌意和发表不同意见的渠道,群体成员就会感到不堪重负。

(1) 舆论提供宣泄社会不满的渠道

科塞提出,社会系统往往为人们提供排泄敌对情绪和进攻性情绪的制度,即安全阀制度。当相互独立的利益或相互敌对的情绪受到压制的时候,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把敌对情绪从真正的根源中转移出来,从其他渠道发泄。压制冲突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相互关系的终结。没有安全阀制度或安全制度不完备的社会结构都是僵化的社会结构,因而也是潜伏危机的社会结构。

按照法官的理解,是深层次的社会冲突问题导致一些并非疑案难案的敏感案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公众通过对敏感案件的讨论,可以宣泄对司法腐败、权力寻租等社会问题的不满。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间的敌意,可以通过舆论得到释放。从科塞的理论出发,正可以将舆论看成当前中国的一种有效的安全阀制度。

(2) 舆论提供对权利的救济渠道

“所谓权利救济指的是在权利受到侵害后采取的补救措施的总称。现代复杂的社会里,公民要享有和行使充分的宪法和法律权利,就必须有便利、高效、经济和完备的救济手段和机制。只有每一个公民,无论贫贱与富贵、聪慧与愚钝、显达与卑微,都能充分利用救济资源和手段来保护自己权利的享有和实现,一个以宪法为基准的法治社会才能最终实现,舍此别无他途。”^①

法律救济是公民权利救济中最有效的路径,但在司法对权利救济不力的情况下,公众会转而寻求其他权利实现的路径,这就包括:其一,公众通过寻租活动得到强势人群的支持;其二,公众通过群体性事件等方式来反映对社会的不满。在第二种情况下,阶层矛盾激化,“行为人通常由自发到有组织的串连起来,并以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能够给党委和政府造成巨大压力,如请愿、示威、游行、静坐、罢工、罢课等形式,迫使党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尽快解决问题。对已出现的矛盾在初始阶段得不到有效处置和解决,致使对立情绪增加,行为激化,达到临界点后就会发展成超越法律约束的群体性越轨行为”^②,当这样的情况出现,政府解决冲突的成本就会急剧上升。

法官接受舆论的质疑,并与舆论主动互动,能够防止第二种情况的发生。有

① 陈焱光,《公民权利救济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

② 卢进宝,曹大勇,《群体性事件的透析与防处对策》[J],公安论坛,1996(4).

了舆论的支持和帮助,身在诉讼中的弱者将有可能免于权力腐败对自身权利的侵害。社会冲突在司法范围内得以解决,政府通过调整相关政策弥合群体间差异,冲突解决的成本将大大降低。

2. 放宽管理,完善舆论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放宽舆论管理,是公权力向私权利释放的信号,它意味着公权力期望透过司法公开的方式取信于民,使公众相信司法不公、权力腐败等行为可以得到有效监督;同时,它也意味着网民和媒体对敏感案件的讨论得到了合法性的保障,公众的社会不满情绪也能因此找到宣泄出口,社会冲突得以在司法范围内加以解决。

(1) 放宽对媒体舆论的限制

前文已经论及,中国对媒体报道敏感案件的管理是较为严格的。概括而言,既有媒体规制的主要内涵是媒体对一般刑事案件“不结案不报道,不结案不评论”;对重大案件“不批准不报道,不批准不评论”。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网民可以自行设定新闻议程的背景下,既有媒体规制已经被突破了。我们认为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采取渐进式改革的路径,来放宽媒体对敏感案件的报道。

刑事案件报道与评论的既有规制,核心在于媒体和司法关系。《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曾经指出,“表达自由是每一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媒体有职责和权利收集情况,向公众传达信息,并在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之前提下,对司法活动进行评价,包括对庭审前、庭审中和庭审后的案件。”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高飞教授据此指出:“未决案一样可以评论的,无论在哪个国家,公民和媒体可以在审判前、中、后三个时段都可以对案件进行报道和评论。”^①

从未来的方向来看,《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或许是改革刑事案件报道与评论既有规则的准绳。但是,考虑到我们的国情和现实,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只有采取渐进式改革路径,逐步修改既有规制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内容。首先是依照信息公开的法规体系,从实践上先行修改、废止行政机关部分不合时宜的规范性文件 and 内容条款。其次,是防止既有规制中部分不合时宜的内容成为新的不合时宜的规制的来源和依据^②。

(2) 对网民舆论设定宽松的管理政策

目前,我国尚没有设定对网民讨论敏感案件的法律规制。但是,根据法官的

① 见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143124/147550/9336987.html>.

② 胡茜茜. 新媒体环境下刑事案件报道与评论既有规制的改革[J]. 当代传播, 2010(8).

建议来看,对网民舆论加以适当管理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政策导向。

我们认为,相对于媒体舆论而言,网民舆论受到的管理应该更为宽松。首先,网民不是专业的信息传播机构,无须承担媒体这样的专业信息传播机构所要承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其次,网民舆论可以成为比媒体舆论更恰当的“社会安全阀”,网民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可以较为自由地表达观点和情绪,也因此可以更好地充当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出口。

我们最后用图1来展示打开司法之门,完善舆论社会安全阀功能之后的理想的舆论和司法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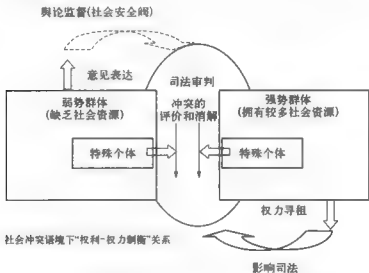


图1 理想的舆论和司法关系模型

社会冲突语境下,法官面临着对舆论的“信任之困”,对此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打开司法之门,给予公众参与司法的机会,同时法官可以通过积极地回应舆论质疑来增强舆论主体和法官间的互动和互信。在舆论管理上,则要避免过于严格的限制措施,以疏通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通道,加强舆论的社会安全阀功能,降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几率。



参考文献

- A. N. Oppenheim. 问卷设计、访谈及态度测量[M]. 吕以荣,译. 台北: 六合出版社,2002.
- 艾肯. 态度与行为: 理论测量与研究[M]. 何清华,等,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 巴雷特,等. 媒介研究的进路[M]. 汪凯,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4.
- 陈力丹. 自由与责任: 国际社会新闻自律研究[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 陈焱光. 公民权利救济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丹宁. 法律的训诫[M]. 杨百葵,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9.
- 戴维·冈特利特. 网络研究: 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M]. 彭兰,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4.
- 丁柏铨. 执政党与大众传媒——基于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 杜骏飞. 网络传播概论[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 风笑天.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 范进学. 权利政治论: 一种宪政民主理论的阐释[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 高尔基. 不合时宜的思想[M]. 朱希渝,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 顾培东. 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4.
- 郭志刚.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 软件应用[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郭忠华,刘训练.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 赫纳森,等. 如何测量态度[M]. 李培青,等,译. 上海: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9.
- 何·皮特. 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 ——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M]. 林韵然,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贺卫方. 运送正义的方式[M]. 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2002.
- 贺卫方. 司法的理念和制度[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 胡泳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基恩 媒体与民主[M]. 卻继红，刘士军，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吉尔摩等 大众传播法判例[M]. 荣宁，等，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 贾春增 外国社会学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 杰克·奈特 制度与社会冲突[M]. 周伟林，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津巴多，等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M]. 邓羽，等，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 卡多佐 司法过程的性质[M]. 苏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康为民 传媒与司法[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 科塞，等 社会冲突的功能[M]. 孙立平，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拉尔夫·达仁道夫 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M]. 林荣远，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李金慧，武建敏 媒介与司法：一种理论的视角[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 李培林，等 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李英明 马克思社会冲突论[M].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0.
- 梁迎修 法官自由裁量权[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 刘子富 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 刘建明 舆论传播[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 李彬 传播学引论[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 林喆 权利的法哲学：黑格尔法权哲学研究[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 刘富起 分权与制衡论评[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
- 刘涛雄 社会冲突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框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 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M·J·C·维尔 宪政与分权[M]. 苏力，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马骋 传媒权利与认同[M]. 合肥：黄山书社，2009.
- 苗有水，刘树德 在大家要案的背后——媒体关注与司法审判的对白[M].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米勒,等.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M].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 密尔 论自由[M].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弥尔顿 论出版自由[M].吴之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米尔斯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杨小东,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 彭兰.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前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让·卢比金内,皮埃尔·库尔·萨利,米歇尔·瓦卡卢利斯.新阶级斗争[M].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苏成雪 传媒与公民知情权[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 孙旭培.新闻侵权与诉讼[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
- 孙旭培.中国传媒的活动空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
- 孙旭培.新闻传播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汪明亮.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 王强华,魏永征.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 魏德士.法律学[M].丁晓春,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 魏永征.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魏永征.新闻法新论[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
- 魏永征,张鸿霞.大众传播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 魏永征,吴元栋.新闻官司:典型案例通讯报告选[M].上海:百家出版社,1993.
- 魏永征,张咏华,林琳.西方传媒的法制、管理和自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向佐群.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 小哈里·卡尔文.美国的言论自由[M].李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 杨海坤,章志远.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 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尤英夫.大众传播法[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 于咏华.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论[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4.
- 翟学伟. 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张杰. 西方分权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英法美三国为例[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 张继良, 等. 公民权利与宪政历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赵树坤. 社会冲突与法律控制: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律秩序检讨[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 赵振江. 分权制度和分权理论[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 郑保卫. 新闻法制学概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 郑杭生, 等.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周晓虹. 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周晓虹. 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周永坤. 规范权力: 权力的法理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 A. Lawrence Lowell. *Public Opinion and Popular Government*. Longmans, Green, 1913.
- David L. Hebert. *Freedom of the Press*. Greenhaven Press, 2005.
- Duncan Langford. *Internet Ethics*. Macmillan, 2000.
- Earl Barbic.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Ely, John Hart. *Democracy and Distrust: 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Freedom House (U. S.). *Freedom of the Press a Global Survey of Media Independence*. Freedom House (U. S.), 2003.
- Gutmann, Amy.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Howard Rosenberg, Charles S. Feldman. *No Time To Think The Menace of Media Speed and the 24-hour News Cycle*.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8.
- Metcalfe, Slade R. *Rights and Liabilities of Publishers, Broadcasters, and Reporters*. Shepard's / McGraw-Hill, 2002.

- Richard Falk, Hilal Elver and Lisa Hajjar. *Human Rights : 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 Routledge, 2008.
- Shizhu Liu *Structural Potential of Attitud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Smartt. *Media Law for Journalists* SAGE, 2006.
- Vivian, John. *The Media of Mass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W. Phillips Davis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role of the information media in the advancement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Praeger Publishers, 1974.
- Wilbur Schramm, William E Porter *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Safire, William *Freedom* [M] Doubleday, 1987
- Willis, William James *The Media Effert · How the News Influences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Praeger, 2007



人名和关键词索引

(按汉语拼音音译排列)

A

艾尔·巴比(Earl Babbie) 6

安全阀(Safety Valve) 25, 26, 88, 119 - 122

C

陈力丹 21, 50, 123

陈诚亮 17, 18

D

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 24, 26, 27, 31

邓玉娇案 4 - 6, 12, 14, 66, 67, 69, 78, 96, 115, 135

第四权(The Fourth Estate) 20

躲猫猫案 14, 60, 66, 67, 69, 78, 116, 135

F

法律效果 3, 93, 94, 96, 98, 138

风笑天 13, 14, 123, 125, 141

G

干群冲突 5, 8, 40 - 42, 47 - 49, 53, 55, 59, 66, 83, 84, 94, 131, 132, 135

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 45, 46, 112

H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45, 46

杭州飙车案 2, 5, 6, 14, 35, 41, 56, 66, 67, 69, 78, 79, 83, 96, 115

贺卫方 20, 21, 31, 123

胡绩伟 18

K

科塞(Lewis A. Coser) 24 - 27, 31, 32, 88, 96, 119, 120, 124

L

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 13, 14

李培林 7, 28, 124

联系社会(Correlation of the Different Parts of Society) 12, 88 - 92

M

马克思(Karl Hennrich Marx) 24 - 26, 31, 32, 50, 119, 124

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 24, 27, 31, 125

敏感案件 1, 6 - 8, 10, 12, 14, 17, 29, 33, 35 - 60, 62, 65 - 100, 102 - 111, 113, 115 - 121, 129

P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27, 30

批评报道 48, 57, 58, 73, 133

贫富冲突 5, 8, 41, 47, 53, 59

评价(Evaluation) 1, 4, 5, 10-12, 25, 39,
52-55, 58-82, 84-92, 108-113, 121

Q

齐美尔(Georg Simmel) 25, 26, 89
钱云会案 14, 69, 79, 82, 83, 95, 96
强势群体 5, 35, 39, 42, 44, 53, 54, 66, 74,
96, 113, 118, 120
权利-权力制衡 3, 7, 17, 18, 20-24, 29-
34, 72, 107, 118, 119
群体性事件 6, 29, 30, 39, 76, 83, 95, 96,
98, 113, 120, 122

R

认知(Cognition) 10-12, 22, 30, 32, 35,
39-53, 55-57, 60, 62, 64, 68, 69, 71, 73,
75, 78, 84, 85, 87, 88, 91, 94-96, 100,
108, 110, 112-114
弱势群体 5, 35, 39-43, 45, 47, 53-57,
59, 63, 64, 66, 68, 70, 73, 76, 77, 83, 94,
96, 97, 120, 131-136

S

社会冲突(Social Conflicts) 1, 4-8, 10-
12, 17, 23-35, 39-42, 46, 47, 49, 53-
55, 71, 73, 74, 76, 80-89, 91-100, 103-
105, 108-116, 118-124, 126, 134-140
社会效果 3, 21, 42, 93-98, 100, 102, 105,
109, 113, 118, 119, 137, 138
司法独立(Judicial Independence) 19-22,
33, 68, 79, 103, 109, 116, 140
司法腐败(Judicial Corruption) 5, 13, 22,
27, 41, 42, 54, 56, 57, 60, 65, 68, 75, 76,
84, 100, 111, 118 120, 133

司法公正(Judicial Justice) 3, 7, 20, 31, 38,
43, 54, 68, 72, 113, 119
孙旭培 21, 31, 125

T

态度(Attitude) 1, 3, 5-8, 10-14, 17, 22,
24, 30, 33, 35, 37-39, 44, 45, 47, 49-53,
57, 60-64, 69-72, 75-77, 79, 81, 84-
86, 90, 91, 93, 94, 100, 102, 107, 109-
113, 115, 119, 123, 124, 129, 140, 141
童兵 17, 18

W

韦伯(Max Weber) 25, 26
魏永征 18, 125
“我爸是李刚”案 56

X

信任之困 1, 10, 92, 93, 100, 110-116,
118, 122, 140
行为意向(Behavior Intension) 5, 10-12,
55, 93, 98-103, 110, 113
寻租(Rent-seeking) 5, 35, 39, 41-43,
45, 54, 60, 68, 71, 76, 96, 97, 100, 103,
106, 113, 119, 120

Y

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 3, 7, 9, 17,
21, 23, 30, 31, 33, 125
于建嵘 26, 29, 32
舆论和司法关系 1-4, 6, 12, 14, 17, 22-
24, 27, 29, 32-35, 58, 110, 112-114,
118, 119, 122, 140
舆论监督 3, 4, 7-9, 11, 13, 14, 17-21,

23, 30, 31, 33, 35, 40, 43, 44, 49, 50, 52,
57, 69, 70, 72, 74 - 76, 78, 79, 87, 115, 125

Z

张金柱案 2, 4, 5, 14, 23, 35, 56, 70, 76

正义(Justice) 19, 44, 45, 52, 54, 76 - 78,
84, 93, 94, 97 - 104, 108, 109, 111, 115 -
117, 119, 123, 124, 133, 134, 138, 139
周晓虹 24, 28, 30, 126, 141



法官对网络民意的 态度调查问卷^①

问卷编号

城市编号

尊敬的法官：

您好！

为了了解新媒体条件下，法官如何认识舆论对未决案件的传播现象，探索舆论与司法良性互动的路径，我们在北京、上海等直辖市，杭州等十个省会城市，以及其他地级城市开展这项调查。调查不用填写姓名，答案也没有对错之分。请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每题的答案中选择一个打圈（如没有特别说明，每题都只需要选择一个答案）；如果是使用电脑填答，请在相应的格子中写一个“是”，替代画圈。这项调查纯属学术活动，不涉及任何行政部门与机密。

衷心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南京大学“传媒与司法”课题组

负责人：胡茵茵博士

电子邮件：njhuhh@hotmail.com 地址：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10093)

20××年×月×日

一、填表人基本信息

1. 您的性别：(1) 男

(2) 女

2. 您的年龄：_____ (周岁)

3. 您的文化程度：

(1) 专科及以下

(2) 本科

(3) 硕士

(4) 博士

4. 您担任法官工作的时间：

(1) 5 年以下

(2) 5~10 年

(3) 10~15 年

(4) 15~20 年

(5) 20 年以上

^① 为了减少问卷的敏感性，提高问卷填答的信度，问卷用“未决案件”取代“敏感案件”测试法官对舆论的态度。

5. 您所属法院是：

- (1) 高级人民法院 (2) 中级人民法院
(3) 基层人民法院 (4) 最高人民法院

6. 您所在审判庭是：

- (1) 刑事法庭 (2) 民事法庭
(3) 经济法庭 (4) 行政法庭
(5) 其他

7. 您目前的职务是：

- (1) 助理审判员 (2) 审判员
(3) 庭长、副庭长 (4) 审委会委员

二、填表人媒介使用情况

8. 您平时经常使用下列大众媒体了解案件新闻么？请根据自己的情况在相应的格子中画圈（如果采用电脑填答，请在相应的格子中写一个“是”，替代画圈。以下同）。

	经常	比较经常	一般	偶尔	从不
广播					
电视					
报刊					
网络					

9. 您每周上网时间大约是：

- (1) 5 小时以下 (2) 5~10 小时
(3) 10~20 小时 (4) 20~30 小时
(5) 30~40 小时 (6) 40 小时以上

10. 您会频繁在网络论坛或新闻跟帖中发表评论么？

- (1) 很频繁 (2) 比较频繁
(3) 一般 (4) 偶尔发表
(5) 从不发表

11. 您有自己的博客么？

- (1) 有 (2) 没有

12. 您关注网民对司法案件的讨论么?

- (1) 非常关注 (2) 比较关注
(3) 一般 (4) 偶尔关注
(5) 从不关注

13. 您关注新闻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和评论么?

- (1) 非常关注 (2) 比较关注
(3) 一般 (4) 偶尔关注
(5) 从不关注

14. 您就司法问题参与和网民的公开对话和讨论的场合多么?

- (1) 很多 (2) 比较多
(3) 一般 (4) 不多
(5) 从不

15. 您就司法问题接受媒体采访的场合多么?

- (1) 很多 (2) 比较多
(3) 一般 (4) 不多
(5) 从不

16. 您所在法院有没有设立专门的舆情应对机制?

- (1) 有 (2) 没有

17. 您认为以下几类未决司法案件是否容易引起网民的关注和讨论? 请根据您的情况在相应的格子中画圈(如果采用电脑填答,请在相应的格子中写一个“是”,替代画圈。下同)。

	非常容易	比较容易	说不清	不太容易	很不容易
涉及干群冲突的未决案件					
涉及贫富群体冲突的未决案件					
涉及其他强、弱勢群体冲突的未决案件					
不涉及以上三类冲突的一般民事案件					
不涉及以上三类冲突的一般刑事案件					

18. 您觉得针对下列几类未决案件的网民言论是否可信?

	都可信	大部分可信	一半对一半	大部分不可信	都不可信
涉及干群冲突的未决案件					
涉及贫富群体冲突的未决案件					
涉及其他强、弱势群体冲突的未决案件					

19. 您认为针对下列几类未决案件的网民言论是否理性?

	都理性	大部分理性	一半对一半	大部分不理性	都不理性
涉及干群冲突的未决案件					
涉及贫富群体冲突的未决案件					
涉及其他强、弱势群体冲突的未决案件					

20. 对那些针对以上几类未决案例案件发表言论的网民,有人提出以下观点和看法,您是否赞同?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说不清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多数网民并不了解案件的真相					
网民一般会超越司法审判程序对当事人行为进行定性					
网民对当事人行为的定性一般缺乏法律知识					
网民一般认为强势人群容易利用非正常手段影响司法审判					
网民一般同情涉案的弱势群体					
网民一般对法官抱有不信任感					
多数网民讨论未决案件是因为猎奇					

续表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说不清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多数网民讨论未决案件是担心司法腐败					
不公平感促使人们在网络上探讨未决案件					
多数网民讨论未决案件是因为他们具有维护正义的伦理取向					
多数网民讨论未决案件是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的表现					
多数网民讨论未决案件是因为他们与其中涉及的某种利益有关联性					

21. 以下有关网络民意与传统媒体的观点,您是否赞同?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说不清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受到网民关注的未决热点案件一般会导致传统媒体介入报道					
网民一般会在讨论中支持传统媒体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报道					
传统媒体对未决案件的报道倾向一般容易受到网民观点的左右					
互联网出现后,传统媒体对未决案件的报道增多了					
互联网出现后,传统媒体对法院审理过程的批评报道增多了					
互联网出现后,传统媒体对民意的反映增多了					
互联网出现后,传统媒体的客观性下降					
互联网出现后,传统媒体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力更大了					

22 以下是一些对司法工作、网络民意和社会环境的观点和看法,您同意么?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说不清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某些强势人群确实会利用非正常手段影响司法审判工作					
某些司法人员确实存在腐败问题					
过去一些涉及社会冲突的案件确实存在对弱势群体不公的审判					
法官审案只以法律为准绳,不会受到网民言论的影响					
网民言论一般会给法官带来心理压力					
网民言论一般会直接影响法官的具体审判工作					
网民言论如果受到法院上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并加以批示,才会直接影响法官的具体审判工作					
网民言论一般能起到对司法工作的良好监督作用					
网民言论一般会直接导致司法不公					
网民讨论和司法审判从最终目的上都是为了社会正义,是相互统一的					
网民讨论有利于执政党了解民情民意					
网民讨论有利于宣泄社会情绪					
网民讨论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					

23 在您看来,发生在2009年下列司法案件的审理过程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网民言论的影响?

	影响非常大	影响比较大	不太大	没有受到影响	不清楚
湖北巴东邓玉娇案					
杭州5.7飙车案					
云南晋宁躲猫猫案					

24. 据您所知,以往涉及社会冲突的案件因为受到网民言论影响,是否其中大部分审判结果都是公正的?

- (1) 90%以上是公正的 (2) 80%~90%是公正的
 (3) 60%~70%是公正的 (4) 50%是公正的
 (5) 大部分是不公正的

25. 您认为是否应该限制网民对以上几类涉及社会冲突未决案件的讨论?

- (1) 应该完全限制 (2) 应该适当限制
 (3) 完全无需限制 (4) 无所谓

26. 您认为以下几类未决司法案件是否容易获得传统媒体报道?

	非常容易	比较容易	说不清	不太容易	很不容易
涉及干群冲突的未决案件					
涉及贫富群体冲突的未决案件					
涉及其他强、弱势群体冲突的未决案件					

27. 相比较网民言论,以下有关传统媒体对涉及社会冲突类未决案件报道的观点和看法,您是否同意?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说不清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传统媒体一般能更好地了解事件真相					
传统媒体报道一般更为可信					
传统媒体报道一般更为理性					
传统媒体报道一般更具有法律专业素养					
传统媒体报道一般更具有权威性					

续 表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说不清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传统媒体报道一般更同情弱势群体					
传统媒体报道一般更容易引起法官重视					
传统媒体报道更容易受到管理和限制					
过去,传统媒体与司法审判之间的关系多数是紧张的					

28. 您认为传统媒体之所以报道涉及社会冲突的未决案件,以下哪些原因发挥着重要作用?

	非常重要	重要	不太重要	不重要	不是原因
司法案件本身具有新闻价值					
迎合受众兴趣,炒作新闻					
为了正确引导舆论					
为了监督司法					
为了倡导社会公平					
不了解相关法规对媒体报道的限制					

29 下列有关司法过程、媒体报道和社会环境的观点和看法,您是否同意?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说不清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法官审案不会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					
媒体报道一般会给法官带来心理压力					
媒体报道一般会直接影响法官的具体审判工作					

续表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说不清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媒体报道一般只有受到法院上级领导重视和批示,才会影响法官的具体审判工作					
媒体报道一般能起到对司法工作的良好监督作用					
媒体报道一般会直接导致司法不公					
传统媒体报道有利于执政党了解民情民意					
传统媒体报道有利于正确引导舆论					
传统媒体报道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					
传统媒体报道会激化社会冲突					

30 您认为在互联网发展迅速,网民能首先对未决案件发起讨论的今天,对未决案件的媒体报道是否应该如以往那样严格限制?

- (1) 应该较以往更为严格地限制
- (2) 应该适当放宽限制
- (3) 完全无需限制
- (4) 无所谓

31 您认为法官在针对以上几类案件的审案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社会效果么?

- (1) 需要,社会效果非常重要(请至 31-1 题)
- (2) 不太需要,社会效果不是非常重要(请至 31-2 题)
- (3) 不需要,社会效果完全不重要(请至 31-3 题)

31-1 您认为社会效果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可多选,回答完毕,请至 32 题)

A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等领导同志都曾强调过法官需要重视审判的社会效果

- B 目前社会矛盾突出,处理好特殊案件的社会效果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
- C 重视社会效果与重视法律效果并不矛盾
- D 法官对案件的审判会影响社会整体的价值判断
- E 要树立司法系统的良好形象,取得民众的信任

31-2 您认为社会效果不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可多选,回答完毕,请至 32 题)

- A 有时重社会效果,会影响法律效果
- B 司法案件的审判一般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影响
- C 目前社会冲突问题并不是非常突出
- D 对法官的要求不能过多

31-3 您认为社会效果完全不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可多选,回答完毕,请至 32 题)

- A 公众尤其是网民对案件审判缺乏专业知识,没有必要盲目迎合公众
- B 法官没有义务解决社会冲突问题
- C 一味追求审判的社会效果一定会对审判的法律效果产生消极影响
- D 审判的社会效果可以由宣传部门或其他机关协调解决

32. 如果您在审理的案件,受到了网民讨论,您一定会在什么情况下考虑到网民的意见?

	一定会考虑	很有可能会考虑	可能会考虑	不太可能考虑	一定不考虑
采纳网民意见可以缓解社会冲突的情况					
网民意见缺乏法律知识,但符合法律精神的情况					
网民意见不理性,但能体现正义追求的情况					
网民意见受到上级领导机关重视的情况					

33. 如果您在审理的案件,受到了传统媒体的报道,您会在审判时考虑到媒体的意见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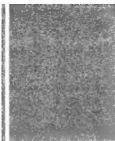
	一定会考虑	很有可能会考虑	可能会考虑	不太可能考虑	一定不考虑
媒体意见代表大多数民众意见的情况					
媒体意见传递上级党政机关意见的情况					
采纳媒体意见可以缓解社会冲突情况					
媒体意见缺乏法律知识,但符合法律精神的情况					
媒体意见只遵循道德标准,但能体现正义追求的情况					

34. 您认为在影响法官审案的非法律因素中,网民意见的影响力是怎样的?

- (1) 属于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
- (2) 属于比较有影响的因素之一
- (3) 属于有影响,但影响不大的因素之一
- (4) 属于影响力极小的因素之一

35. 您认为在影响法官审案的非法律因素中,传统媒体报道的影响力是怎样的?

- (1) 属于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
- (2) 属于比较有影响的因素之一
- (3) 属于有影响,但影响不大的因素之一
- (4) 属于影响力极小的因素之一



后 记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地探求科学,是因为他想知道上帝是怎么建筑这个世界的。而科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是不断地探求宇宙中那些大大小小的真相。自从明白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于探求真相,我很怀疑自己是否担得起“学术工作者”这个职业称谓。怀疑归怀疑,努力却不能因此而放弃。不管有多微不足道,不管真相是否可以探得求得,总要去做点什么,哪怕只有一点点。

这本薄薄的勉强可以算作学术专著的小书,就是微不足道的我,在探求真相的学术工作中,努力接近真相的一点点工作成果。当我得出“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这个结论的时候,我希望我在探求舆论与司法关系的道路上,距离真相,近了一小步。

本书希望探求的真相,归根结底,就是现实社会语境下的舆论和司法关系。无论舆论对司法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司法为什么会受到舆论的影响?有哪些因素促使法官接受或排斥舆论的意见?我的研究结论告诉我,当前严峻的社会冲突问题,影响到了法官对舆论的态度,并影响到未来的舆论和司法关系。所谓的“信任之困”,是社会冲突语境下的“信任之困”,多数法官并不认为舆论具有消除社会冲突的建设性作用。尽管当前司法公开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但“信任之困”的客观存在,仍会使未来的舆论和司法关系面临一个个具体案例带来的考验。

无论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站在生活的角度,每个人都希望看到司法独立、舆论理性、社会公平的理想场景。将“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呈现出来,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司法独立、舆论理性、社会公平的达成,其关键不在于消除舆论对司法的影响,而在于重建公众和公权力之间的相互信任。

我不确信,这些旨在探求舆论与司法关系真相的研究结论,到底有没有逼近真相?无论距离真相还有多远,我都要感谢那些帮助我探求真相的人们:

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先生,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丁老师是论文的指导者,也是本书出版的促成者。

感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陈友华教授、周晓虹教授、风笑天教授，他们对我的指点，常予我豁然开朗之感。

感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夏文蓉副教授、王蕾副教授、胡翼青副教授、郑欣教授、陈堂发教授、丁和根教授和杜骏飞教授，从他们的帮助中，我获益良多。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黄强强先生，尽职尽责，更不断给我宽容给我鼓励。

感谢所有协助我发放、回收问卷的调查员，他们无私的付出和努力对本书来说至关重要；感谢填写问卷的法官，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便无法获得可信有效的数据和资料。

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一直以来的体贴照顾，让我有信心一直向前走。

因为托生在这个虽然问题丛生但生机勃勃的社会，舆论和司法的关系研究充满了学术张力。我会继续在这片微观的学术领地上探求真相，答谢关心我鼓励我的师长、朋友、家人，继续努力尝试去尽一个学术工作者的本分。